

北京文博

BEIJING WENBO



2

1997

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 主办



北京龙泉务窑址简介

龙泉务窑址位于北京西郊门头沟区西北5公里许，龙泉镇龙泉务村北。这里三面环山，永定河水由北而南，经窑址东侧蜿蜒而过。村西南的曹家地、村东北的军庄乡盛产煤炭，村北的灰峪、西南的对子槐山产坩子土，这些便利的自然条件为创建窑场提供了物质基础。龙泉务窑是一座具有代表性的北方辽代瓷窑遗址，现为市级文物埋藏区重点保护单位。遗址东西长230米、南北宽120米，总面积约27600平方米。发掘面积为1200平方米。共揭示作坊2处，窑址13座，各种炕、灶等遗迹10余处。出土各类器物8000余件，其产品以盘、碗、碟、钵为主，其次有罐、壶、盂、盒、洗、炉、水缸、枕等生活用品。小型玩具有狮、羊、猴、狗、马、铃及围棋子、象棋子、瓷砚等文玩。三彩器有碗、炉、碟、佛像及砖、瓦当、吻兽等琉璃建筑构件。釉色以白釉为主，酱釉、黑釉、茶叶末釉及三彩釉次之。初步探明了瓷窑从辽至金历史发展脉络，为研究辽金时期北方瓷窑及陶瓷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

(黄秀纯文、图)



三彩菩萨像：高32厘米，坐姿，面目慈祥。胎质细密。头束高髻，身披绿釉袈裟和白色璎珞，上肢双手已残，定印不清。

白釉折肩罐

高13.5厘米，口径9.6厘米，足径7.6厘米。矮颈、敛口、折肩、腹下垂、圈足，腹壁剔刻树叶纹。白釉微黄有泪痕，局部釉内含气泡，虽细润亦显粗糙。



陶水管：长42.5厘米，口径43.5~33厘米。黄褐色粗砂胎。质地坚硬。圆形，上粗下细，上端折沿，平雕几何形图案。

白瓷小猴

高5厘米。座姿，双目圆瞪，勾手攀起；另一只蹲姿，双手下垂扶膝，二目天吊，眼角下垂，显示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器物虽小，造型憨态可掬。



白釉点彩炉

高9.5厘米，口径13.2厘米，足径7.5厘米，敞折沿、深腹、弧壁、束腰高圈足。通体白釉略显灰白。腹及足部雕塑小梅花纹，花芯点褐彩，造型稳重端庄。

违法必纠·执法必严

——记北京元代土城违法建设事件的查处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迈向文明的标志，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固化形式。而城墙、街巷、宫殿、坛庙等，又是城市的鲜明而有特色的象征。

北京城的历史源远流长，它最早的一个源头大概就是商周蓟城。经历了秦汉直到隋唐，它一直是北中国的一个军事重镇。但是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崛起，它在全国政治、军事上的地位也日益提高。辽在此建南京城，作为它的五京之一，金在辽南京城址上建中都，城市规模也愈益扩大。而700多年前的元大都城的建成，奠定了今天北京城的基础。所以，元大都是北京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北京首次正式作为统一中国的首都。

元大都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因此又称土城。在夯土中使用“永定柱”（竖柱）和“纤木”（横木），即我国传统的板筑技术，以加固城墙。城基宽达24m，与高、宽的比例是3:2:1。城墙外有又宽又深的护城河。大都城墙全长约28600m。明初，缩减北城，因而大都城的北墙和东西两面墙的北段均被废弃。几百年来，风吹雨打，朝代更替，这段土城墙竟然躲过了天灾人祸，奇迹般的保留下来，作为历史的见证，作为元大都屈指可数的几个地面遗存被人们所珍视。今天，现存的元土城地跨海淀、朝阳两区，延续长度约12公里，包括元大都的北城墙和西城墙的北段遗址，城墙外围还留有护城河的遗迹。它是规模最大、最能反映元大都城市规模、布局、方位的重要历史遗迹。它所蕴藏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仅属于北京，属于中国，而且也属于世界。1957年这里被公布为北京市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市文物局又公布了元土城包括护城河在内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从而以法的形式确立了对它的保护。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去年底，位于海淀区花园路3号土城保护范围内的市园林绿

化一大队三中队与北京希秦文化传播广告公司私自签定协议，未经市文物局、市规划局、市建委、市园林局批准，擅自在保护范围——元土城与护城河之间进行违章建房，时值北京市民正在为修复明代北京城墙开展轰轰烈烈的捐砖捐钱活动，一修一毁，形成鲜明对比。为此，市文物局、园林局赶赴现场，责令建设单位立即停工，限期拆除全部违法建筑。但是，建设单位在事隔一个月后又私自开工，并扩大建设面积。该工程由9幢2层楼房组成，面积达2800余平方米，全部建在土城保护范围内。3月5日，海淀区规划局向建设单位



□ 元大都北城墙现状



□ 元大都北城墙及护城河

发送“停工通知书”，可建设单位仍继续施工。4月3日，市规划局、文物局、园林局召开现场办公会，进一步制止违法建设。市规划局当时就向园林局绿化一大队三中队发送了“停工通知书”，并于4月7日向这两家违法建设单位发送了“拆除通知书”。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对此事非常重视，亲临元土城视察，北京市人大政协代表连续三次组织委员来到违法现场，强烈要求政府职能部门对这种目无国法、破坏文物的事件必须严肃执法，决不能姑息迁就。我们要从保护祖国历史文化、维护法律的高度来认识此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北京市城市规划条例》明文规定，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进行建设的责任单位、责任人员可作行政处分。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通过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也对文物保护中出现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加强了处罚力度，拓展了惩罚范围。在以法治国的今天，在首都北京还会出现这种违法行为，实在让人深思。现在事情虽已得到了解决，违章建筑也已拆除，但我们从中应该总结出经验教训，以防今后类似事件的发生。

（徐佩仁图 晓赫文）



□ 元大都北城墙水关遗址



□ 元大都北城墙与护城河之间盖起的违章建筑



□ 元大都西城墙北段的蓐门烟树碑

违法必纠·执法必严

——记北京元代土城违法建设事件的查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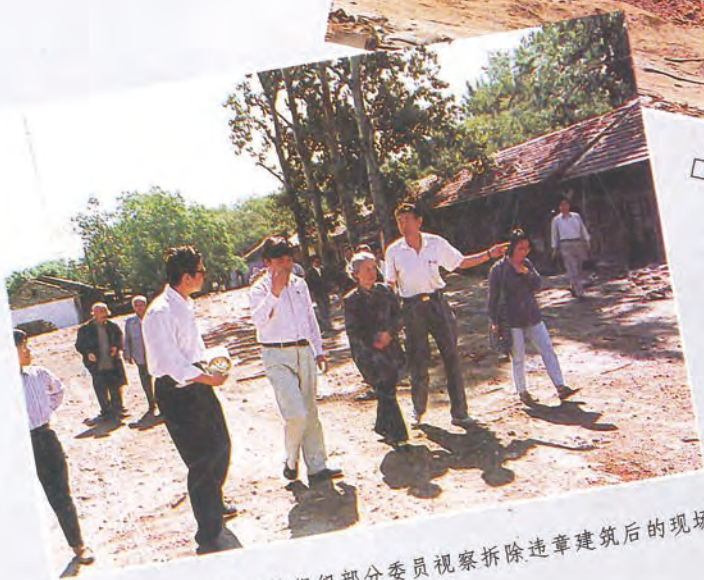
□ 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视察违章建筑现场



□ 正在拆除中的违章建筑



□ 被拦腰切断的元土城墙



□ 北京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视察拆除违章建筑后的现场

北京文博

样初题

目 录

(1997年第2期)(总第八期)

市长论坛

发挥北京文化古都优势,促进现代国际城市发展

——在“第一届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市长论坛”上的讲话

..... 张百发(5)

燕史研究

由铜器铭“匱”说到“匱”、“燕”有别 曲英杰(8)

燕毫与蓟城的再探讨 陈 平(15)

关于西周“蓟”国的思考 葛建军(27)

专题探索

关于北京市民办博物馆申办成立的经过

及相关问题的思考 刘超英(31)

支持私人博物馆的建设 胡 骏(35)

私立博物馆的梦想与实践 马未都(37)

博物馆学

调整博物馆管理结构的对策思考 单霁翔(41)

北京地区博物馆现状的调查报告 于丽萍(44)

古都风貌

整理文化遗产 服务现代城市

——《宣南鸿雪图志》序 吴良镛(57)

关于北京城市建设指导思想的几点思考 孙 玲(61)

文物工作者在旧城改造中不能无所作为 董绍鹏(65)

地上文物

《圆明园》遗址的大墙、园门、沿墙水闸勘察设计的

报告 侯兆年(69)

百家争鸣

也谈《重建龙泉大历禅寺之碑》的年代 言 之(79)

文物修复

北京文物修复的起源与发展 贾文忠(82)

文物鉴赏

北京地区出土的元代青白瓷 刘秀中(84)

文物流通

北京第一次文物国际拍卖 王金鲁(87)

资料信息

市文物局资料信息中心藏北京地区出土墓志

拓片目录(五) (89)

北京市文物局 1997 年第一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

..... 王辅宇(96)

封面、封底:彩绘坐佛:1983 年 6 月,出土于龙泉务村北水塔基下。

高 57.5cm,身披赤色袈裟,头梳螺形发髻,釉彩斑驳,上肢已残。该器疑是上釉后待烧时致残的半成品。

封二、彩插一:北京龙泉务窑址简介

彩插二、三、四:违法必纠,执法必严

——记北京元代土城违法建设事件的查处

封三:北京新增七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续一)

《北京文博》编辑委员会

顾问:侯仁之、单士元、苏秉琦 主任:宿白 副主任:单霁翔、廖静文、王世仁、曹子西、齐心、马希桂、秦公

编委会委员:王丹江、王光镐、孔繁峙、刘建业、成大生、张宁、张展、陈平、陈旭、季华、荣大为、赵迅、赵其昌、

郑广荣、晋宏逵、徐明、韩永、葛英会、傅公钱

主编:张展 编辑部主任:陈晓苏 本期责编:陈晓苏、魏伯涛、张岩 美术编辑:张秀玲

主办单位: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 编辑出版:北京市文物局资料信息中心《北京文博》编辑部

协办单位:首都博物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公司、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

BEIJING WEN BO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NO. 2, 1997

Contents

MAYORS' FORUM

Give Play to the Superiority of Beijing as an Ancient Cultural Cit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t as a Moder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Speech at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Forum of the Mayors of China Historic Cities" by Zhang Baifa (5)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YAN STATE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匱 and 燕 in the Light of the Bronze Inscription "匱"
..... by Qū Yingjie (8)

Re-exploration of Yanbo and Ji City by Chen Ping (15)

A Consideration of the "Ji" State of Western Zhou by Ge Jianjun (27)

DISCUSSIONS ON SPECIAL SUBJECTS

Courses of the Application for Establishment and the Founding of Private Museums in Beijing City and Consideration of Related Problems by Liu Chaoying (31)

SA Proposal for Supporting Private Museums by Hu Jun (35)

The Private Museum; Dream and Practice by Ma Weidu (37)

MUSEOLOGY

A Consideration of Measures to Transform the Managing Structure of Museums
..... by Shan Jixiang (41)

Investigat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useums in the Beijing Area
..... by Yū Liping (44)

VIEWS OF ANCIENT CITIES

Preserve Cultural Heritages, Serve Modern Cities; Preface to the *Album of Ancient Monuments to the South of the Xuanwu-men Gate* by Wu Liangyong (57)

Some Problems on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Beijing Urban Construction
..... by Sun Ling (61)

Cultural Relics Workers' Task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Old Cities by Dong Shaopeng(65)

SURFACE CULTURAL RELICS

Report on the Survey and Reconstruction Design of the Outer Walls, Gates and Waterlocks along the Walls on the Site of the Yuanmingyuan Palace
..... by Hou Zhaonian(69)

ACADEMIC CONTENTION

Also on the Date of the *Stele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Longquan Buddhist Temple of the Dali Reign*
..... by Yan Zhi(79)

RESTO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Restoration by Jia Wenzhong(82)

APPRECI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Yuan Misty Blue Porcelain Unearthed in the Beijing Area by Liu Xiuzhong(84)

CULTURAL RELICS CIRCULATION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uction of Cultural Relics Held in Beijing by Wang Jinlu(87)

DATA AND INFORMATION

Catalogue of the Epitaph Rubbings from the Beijing Area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aterial and Information Centr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Affairs(V)..... (89)

Chronicl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 Events at th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Affairs (1st Season, 1997) by Wang Fuyü(96)

EDITORIAL BOARD OF THE BEIJING WEN BO

Advisors: Hou Renzhi, Shan Shiyuan, Su Bingqi

Chairman: Su Bai

Vice-chairmans:

Shan Jixiang, Liao Jinwen, Wang Shiren, Cao Zizi, Qi Xin, Ma Xigui, Qin Gong

Members:

Wang Danjiang, Wang Guanghao, Kong Fanshi, Liu Jianye, Cheng Dasheng, Zhang Ning, Zhang Zhan, Chen Ping, Chen Xu, Ji Hua, Rong Dawei, Zhao Xun, Zhao Qichang, Zheng Guangrong, Jin Hongkui, Xu Ming, Han Yong, Ge Yinghui, Fu Gongyue

Editor-in-chief: Zhang Zhan

Director of Editorial Department: Chen Xiaosu

Managing Editors of this issue: Chen Xiaosu, Wei Botao, Zhang Yan

Artistic Editor: Zhang Xiuling

The journal is sponsored by th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Affairs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the Capital museum, Beijing Municipal Company of Cultural Relics, Beijing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Beijing Municipal Institute of Ancient Buildings.

It is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Beijing Wen Bo*, Information and Data Centr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Affairs.

发挥北京文化古都优势

促进现代国际城市发展

——在“第一届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市长论坛”上的讲话

张 百 发

(一)

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也是一座具有3000余年建城史的文明古都和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如何妥善处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把北京建设成为反映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中国首都独特风貌的现代国际大都市,这是我们在整个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面临的一项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委、市政府在首都城市现代化建设中,对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始终给予了高度重视,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并初步形成了符合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特性的管理模式。

第一,进一步完善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规划。在1993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专门列出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一章。在修订工作

中,我们按照国家建设部关于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要求,进一步明确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内容,除了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之外,还详细划定了如国子监街、南锣鼓巷、什刹海、琉璃厂等一批具有传统风貌、民族和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同时,对新的建设如何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作了具体的规定,强调要从整体上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色,特别是要保护好历代建设所形成的城市中轴线、“凸”字形城廓、相互贯通的河湖水系、经纬分明的棋盘式街道以及传统的城市色彩和空间特点,市中心区和重点文物保护区周围的各项建筑,都要求由内向外分层次严格控制建筑高度,切实保护特殊的通视走廊、街道对景、城市广场和古树名木,从10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第二,进一步加强了有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立法和执法监督工作。自80年代以来,北京市先后制定了《北京市文物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和五批、265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规定,颁布执行了《北京市文物建筑修缮工程管理办法》等一批法规和规章。与此同时,逐步加大了这方面的执法监督工作,严肃查处违反城市规划和文物保护法规的事件,使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落到了实处。

第三,进一步加大了北京古都风貌保护工作的力度。一是1990年,北京市政府公布25处文物古迹密集、最能反映和代表北京古都风貌的地区为重点历史文化保护区,对保护区内新建项目进行严格控制,同时,在国子监街等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开展了与整体环境不协调的建筑物和临时建筑物的拆除、整治工作;二是在新公布的56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中,重点增加了一些价值较高的近代、现代建筑物,及有北京特色的商业老字号和纪念地,以此来反映出城市发展的连续性;三是在城市危旧房改造过程中,首都规划建设部门先后批复了

五批涉及6个城区的42个危改片,共211项需要保护的文物建筑名单,并根据这些文物建筑的价值,制定了原址保护、易地迁建、收存构件等相应措施,要求开发建设和施工单位配合文物部门严格执行;四是对近年来市区新建项目,按照体现“时代精神、民族传统、地方特色”的要求,进行了规划、设计和建设。

通过以上工作,北京市的文物资源和古都风貌得到了进一步保护,不仅较好地维护了北京应有的城市风貌,而且也使文物资源的合理利用,成为北京市重要的新经济增长点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证。现在,文物旅游已成为北京旅游业的重要支柱。1996年,全市文物修缮经费7000万元,而故宫、十三陵、八达岭8处文物景点的门票收入就已经达到6亿元,相应的宾馆饭店也提高了收入。一些文物古迹,如:湖广会馆、好园、畅观楼、乐家花园等,被合理地利用起来,开办为剧场、茶馆、宾馆、俱乐部,使文物古迹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潜能得以发挥。另外,北京城区的一些文物古迹也带动了周围地区地价的升值。丰富的文物资源,成为北京市城市发展的重要财富。

(二)

我们研究历史文化名城,应该说,最终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在保证历史文化名城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使北京这样一座颇具特色的特大型城市逐步跨入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行列。城市归根结底是为市民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只有不断地建设和完善,不断地进行自身的新陈代谢,才能满足城市居民不断增长的生存和发展需求,才不会被历史淘汰。这些年来,市委、市政府在中央和全国各个方面的指导和帮助下,从北京的实际出发,通过总结和吸取世界大城市发展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把北京建设成第一流水平的历史文化名城和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奋斗目标,并开展了一系

列的工作。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调整城市结构和布局，实现城市建设的两个战略转移。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北京城市的大布局，尤其是市区布局已基本形成。针对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需要，今后北京城市布局要按照市区、卫星城、中心镇和一般建制镇四级城镇体系进行布局，对全市 16800 平方公里面积，实行“一万六千八、城乡一起抓”的方针，充分发挥辖地广阔的优势，建立完善的城镇体系，改变人口和产业过于集中在市区的状况；对 1040 平方公里规划市区，坚持按“分散集团式”原则进行布局，市区中心地区和环绕周围的 10 个边缘集团之间，通过绿化隔离带和农田隔开，使之相互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共同组成市区，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达到逐步减少市区人口、增加城市绿化用地、改善城市环境质量的目的，以此来保证和促进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经济功能的有效发挥。为此，我们在城市开发建设中提出并实行两个战略转移，即城市建设重点逐步从市区向远郊地区转移，市区建设的重点从外延扩展向调整改造转移。

第二，加强城市规划工作。继 1993 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对社会公布后，自 1995 年起，以 62 平方公里旧城区、240 平方公里市区绿化隔离地区、10 片市区边缘集团和近期重点建设地区为重点，加强了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制定，使城市规划有更强指导性、可操作性。

第三，加强城市整体设计的研究。北京是具有较好的城市整体设计传统的城市。明清北京旧城就是一项举世闻名的杰作，它的主题思想明确，整体性强，自然景观与人工建筑结合巧妙，城市空间尺度安排合理。这是今天进行城市整体设计的历史基础。今后北京城的规划建设，不仅要城市的土地利用、建筑高度和体量、建筑色彩及

造型、道路交通、园林绿化、市政工程等进行深入的综合研究，而且更要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建筑师、规划师们不能只考虑一个单体建筑、一片小区的设计，要研究它们与城市整体的关系，乃至与周边省、市的关系。

第四，加强城市综合管理工作。北京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城市，随着人口增加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情况越来越复杂，对城市综合管理工作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目前，我们的城市管理水平还很不适应，特别是在人口、能源、交通、环境等方面的管理相当薄弱，严重制约着城市的发展。解决这些问题，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的方针，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加强城市管理，严格依法治市。当前，一是要加强北京流动人口的管理，把流动人口管理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严格控制总量，做到有序流动；二是进一步完善交通法规，加强城市交通管理，缓解交通严重拥堵状况；三是加强城市防灾管理，确保首都安全；四是完善市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和郊区“三级政府三级管理”的体制，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在城市管理工作中，要运用现代的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同时，要充分发挥城市综合协调部门的作用，综合运用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规划、建设、管理城市，使城市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达到经济、社会、环境三者的统一。

北京，作为一个城市已走过 3000 余年的历史，并曾经走到世界的前列。历史已经证明，它具有较强的自我更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能力。同样，在未来的道路上，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在全体市民的共同努力和全国其它兄弟省市的支持下，北京市一定会迎来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作者为北京市常务副市长）

清同治年间,有亚盃诸器于京师城外出土,其铭文中见有“匱侯”之称。在此前后,其他各地也发现了匱侯旨鼎等器。由此而使人得识古燕国之本称当为“匱”。近些年来,又陆续出土有匱侯诸器,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与此相关联,亦不免要引出对匱与燕的关系的探索。结合有关文献及考古资料加以分析,似不当将匱与燕混同为一,在周代北方当并存有匱与燕(北燕)二国。试予论之。

一、匱之释义

“匱”字释文首见于藩祖荫在《攀古楼彝器款识》中所著录的匱侯旨鼎铭文下,其以为“匱当为燕之假借字”。而后,吴大澂在《愬斋集古录释文贗稿》上册释匱侯鼎铭文言:“匱,古燕字,与匱侯盃匱字同。召伯所封国也。”在《说文古籀补》中并言:“匱,古燕字,象燕处巢,见其首。匱字从此。宴、晏、匱三字皆当从匱。许氏说:‘晏,安也。宴,安也。匱,匱也。皆燕安之义。小篆从日、从女,形相近而

由铜器铭“匱”

说到

“匱”、“燕”有别

曲英杰



匱 鼎

古义亡矣。经典通作燕。”刘体智在《善斋吉金十录》之二《礼器录》卷一释亚燕鼎铭文亦言:“据燕侯盃拓本证之,亚形下当即燕字之上半截,象燕之形也;下作匱,象在巢形。”其匱侯盃或燕侯盃即后称亚盃者,铭文曰:“晏侯亞晏。匱侯易亞贝,作父乙宝罍彝。”①其亚形下之字作匱形,今多释为晏。以晏象燕形虽有可取之处,然以此晏与其下匱字连读为燕则实误。所谓匱即燕字当即由此而引发。其说为大多数学者所从,以匱与燕同指一国遂成定论。后虽将“晏”字分出,然以“匱”象燕在巢的解说仍多有信者。另亦有学者以此说为牵强附会,但苦于无法对古燕国何以称匱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

其“匱”究作何解呢?笔者以为,似不必求之过深。依古时命名多缘于山水之例推之,匱国之称当亦得之于其所临之山水。周初召公受封,立国于北土。《史记·周本纪》载:“封召公奭于燕。”张守节《正义》引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周武王封召公奭

于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而其具体所在方位则无确指。今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北董家林村发现有西周时期古城址，其东南黄土坡一带发现有大面积的匱国墓地，出土多件带有“匱侯”铭文的青铜礼器和兵器等，特别是 M1193 大墓中所出的克盃、克盂诸器明确记有周王册封匱侯之事，发掘者判定其当即为周初匱都城之所在^②，可信。此古城址地处平野，西、北两面远临高山，然若指其为古之燕山，则并无确凿证据。《国都城记》所云或可能为误传。而若试推求于其所临之水，则可连类相通。其西部及南部有大石河（即琉璃河）自北而南、折而向东流过。大石河在汉魏时期称圣水。《水经注·圣水》载：“圣水又东径玉石山，谓之玉石口。山多珉玉燕石，故以玉石名之。其水伏流里余，潜源东出。又东，颓波泻涧一丈有余，屈而流也。东过良乡县南（此句为经文）。圣水南流，历县西转，又南径良乡县故城西，王莽之广阳也。有防水注之。水出县西北大防山南，而东南流径羊头阜下，俗谓之羊头溪。其水又东南流，至县东入圣水。圣水又南与乐水合。水出县西北大防南山，东南流，历县西而东南流注圣水。又东过其县故城南，又东径圣聚南，盖藉水而怀称也。又东与侠河合。……又东过阳乡县北（此句为经文）。圣水自涿县东与桃水合。水首受涑水，于徐城东南良乡西分垣水，世谓之南沙沟，即桃水也。……桃水又东径涿县故城北。……桃水又东北与垣水会。水上分涑水于良乡之桃水，世谓之南沙沟。故应劭曰：垣水出良乡。……垣水又东径涿县北，东流注于桃。故应劭曰：垣水东入桃。闕骞曰：至阳乡注之。今案经脉而不能屈也。桃水东入阳乡，东注圣水。”汉代于此置良乡县。魏晋以后，良乡县治所北迁至今窦店村西。^③故《水经》言圣水“东过良乡县南”，而《水经注》言“圣水南流，历县西转，又南径良乡县故城西。……又东过其县故城南，又东径圣聚南。”其“圣聚”，当为魏晋以后良乡故城以东之一聚落^④，不在今董家林村。

其“圣水”，不见于《汉书》。《汉书·地理志上》载涿郡属县“良乡，侯国。垣水南东至阳乡入桃。”此良乡于西汉末一度封于赵共王子刘交^⑤，故注为侯国。其“垣水”，当指流经良乡县境的较大河流，而不可能是指《水经注》所载之桃水支流垣水。且与注文所记垣水至涿县（今河北涿州）北注入桃水不合，而与注文所记圣水至阳乡（今涿州东北）合于桃水相符。由此推知，汉以前阳乡以上圣水当称垣水，汉魏之际方改称圣水，并以圣水统称阳乡以下桃水，而另移垣水之称于桃水支流。其地临垣水，又曾为匱都城所在，将此二者联系起来考虑，则垣水极有可能是由匱水演变而来。古音垣、匱同属元部，垣属匣纽、匱属影纽，同为喉音，可互转^⑥。《说文解字》云：“匱，匿也。从匚，𠄎。”段玉裁注：“匱之言隐也。《周礼·宫人》：为之井匱。郑司农云：匱，路厕也。后郑云：匱猪为雷下之池，畜水而流之者。按二说皆谓隐蔽之地也。”^⑦古圣水（垣水）经玉石山下伏流一里余，正为隐蔽之形，故有匱水之称。周初召公受封于此，其国称匱当是因都城所在临于此匱水之故。

今检铜器铭文，属西周早中期者如匱侯鼎、匱侯盂、宪鼎等，其匱字皆从匚作匱；至西周晚期所作器如克鼎、匱公卣等，始见作匱者。由此推测，匱字似当以匱为本体、匱为变体。《说文解字》云：“匚，匿也。象迟曲隐蔽形。凡匚之属皆从匚，读若隐。”段玉裁注：“象逃亡者自藏之状也。”其匚为隐字之古文。《说文解字》又云：“匚，表襚有所夹藏也。从匚，上有一覆之。凡匚之属皆从匚，读若徯同。”段玉裁注：“表者，𦑔也。徯者，待也。夹者，盗窃怀物也。迨表相待，有所窃藏。故其字从匚，而上复有一覆之。会意。”此匚（象藏物之状），与匚（象自藏之状）并有隐蔽之义，故可互换形旁，使古匱字有匱、匱二体。又依克鼎铭文匱作匱、匱公匱铭文匱作匱等例^⑧，其形旁匚似不当作匚，而当作匚，以示所覆盖者仅为所怀之物，并不包括盗窃者。另在琉璃河匱国墓地中出土有匱侯戟（M52：22），属西周早期，其匱

字作形^⑨，从L、从O，当亦为变体。O即古圆或圜字^⑩，古音属元部、匣纽，与晏相近，故可声旁互换。与此相类，古燕币中为大多数学者释为“明”者，实际上当亦属匱字之变体。其币形呈尖首刀状，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早期面文作、等；后演变为、等形，外笔圆折成半圆形弧线；再演变为、等形，因字体作横椭圆状，外笔超出刀身外郭而出现断笔现象。其字，或以为从刀、从口而释为召，或以为从日、从勿而释为易，或以为从日、从月而释为明，或以为为玄鸟（燕子）的象形字而释为（匱）等^⑪。其释匱者囿于所谓象玄鸟安居巢中的分析，混匱与燕为一字，因过于牵强，无法为学界所普遍接受。而若视、等为匕之变形、O为之代换、等为匱字的变体，则应该说是近于情理的。如此，所谓“明”字之惑，便断然冰释。由此似还可以做进一步推论，其匱水改称垣水，或即由断笔字讹变而来（古亘字作形，与相近，增土旁而为垣字；二者音亦相近）。又，古圣（聖）字有作者^⑫，与亘、等相近。汉桂阳太守周憬功德碑铭云：“懿贤后兮发英”^⑬。洪适注“”为“圣”字。此水后又称圣水，当即是由垣（亘）水演变而来。因一水二称，故移垣水之名于桃水支流。其匱水之名既被匱人用为国称，则终周之世似不会有变。其改称垣水当在秦汉以后，而至东汉以后渐为圣水所取代。

二、匱与燕之别

匱人自周初立国，至战国之末为秦所灭，其本称皆作“匱”，或加邑旁作“郕”，而不作“燕”。就迄今所见出土文物而言，以“燕”代称“匱”，当以汉初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等为最早。另在阜阳汉简《诗经·邶风》中有“燕燕于飞”（今传本作“匱匱于非”、“宴尔新昏”作“燕尔口口”等例^⑭）。考虑到诗书多承传有绪，则如同《战国纵横家书》一类写本在战国中晚期已以“燕”假“匱”，似并非没有可能。其时唯有匱国，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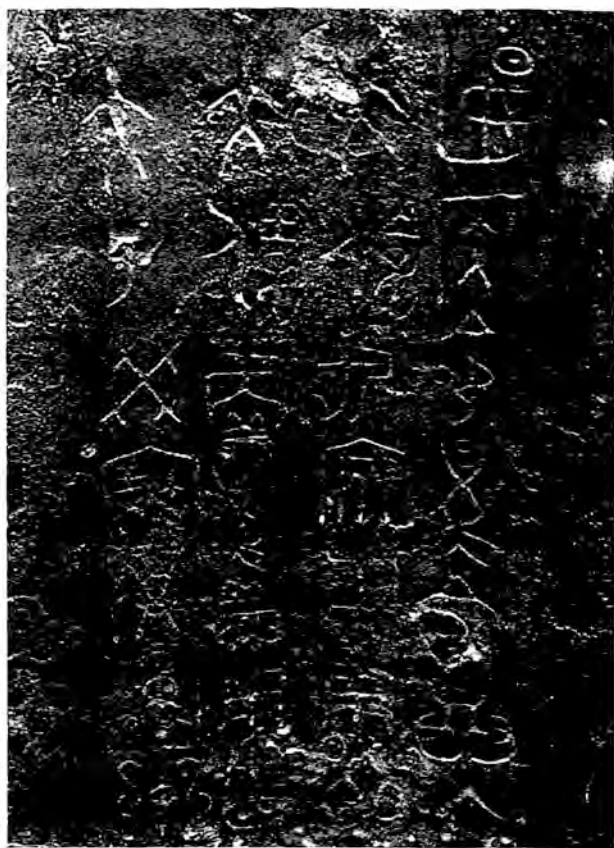
燕、北燕皆已不存，故以“燕”为匱国之代称不会发生淆误。至于《世本》所言“召公居北燕”，是指北燕之地，不当与此视为同例。而在《春秋》经传中记此匱国史事者唯两见。《春秋·庄公三十年》载：“冬，公及齐侯遇于鲁济。齐人伐山戎。”《左传》记：“冬，遇于鲁济，谋山戎，以其病燕故也。”杜预注：“齐桓行霸，故欲为燕谋难。燕国，今蓟县。”《谷梁传》言：“齐人者，齐侯也。其曰人，何也？爱齐侯乎？山戎也，其爱之何也？桓内无因国，外无从诸侯，而越千里之险，北伐山戎，危之也。则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尔？燕，周之分子也，贡职不至，山戎为之伐矣。”又，《左传·昭公七年》载：“（正月）癸巳，齐侯次于就。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听命？先君之敝器，请以谢罪。’公孙皙曰：‘受服而退，俟衅而动，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归燕姬，赂以瑶瓮、玉椀、鬲耳，不克而还。”^⑮其《左传》与《谷梁传》之“燕”当为后改，原当作“匱”^⑯。在《国语·齐语》中所记管仲对齐桓公言北伐“以燕为主”；《郑语》中记史伯言：“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其“燕”，均明显是指匱国，原当皆作“匱”。另有《诗经·大雅·韩奕》云：“溥彼韩城，燕师所完。”毛传曰：“师，众也。”郑玄笺言：“溥，大；燕，安也。大矣，彼韩国之城，乃古平安时众民之所筑完。”其去古未远，所释当合于诗之原意。依此，其“燕”，与匱国、燕国均无关。

除以上所辨，在《春秋》经传中单称“燕”者，如《左传·隐公五年》记“卫人以燕师伐郑”，《春秋·桓公十二年》记鲁公“会宋公、燕人，盟于谷丘”，《春秋·桓公十三年》记鲁公等与“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左传·桓公十八年》记“王子克奔燕”，《左传·庄公十九年》记“卫师、燕师伐周”，《左传·庄公二十年》记“郑伯和王室，不克，执燕仲父”，《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记齐公族“叔孙还奔燕”，《左传·定公十年》记晋“成何奔燕”等，当皆指南燕。其为

姞姓国，地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北，战国时属魏，汉时置燕县，属东郡^⑦。其“燕”，当即此南燕国之本称。《说文解字》云：“燕燕，玄鸟也。翕口、布翅、枝尾，像形。”^⑧其国名很可能是缘于此燕燕鸟，而简作“燕”。传世铜器庚壶铭文载齐庄公时齐将“庚率百乘舟，大_𠂔（举）从河台（以）亟伐燕口丘”；又记另一战事，“其王乘𨔵（牡）与（與）台（以）口燕师，庚捷其兵𨔵车马，献之于庄公之所。”其“燕”作_𠂔^⑨，当即指南燕国。其北临于河（即黄河，古时在今郑州以北作东北流向），故齐将庚率舟师从河以伐燕。

关于北燕，最早见于《春秋·襄公二十九年》载：“齐高止出奔北燕。”《左传》记：“秋九月，齐公孙蚤、公孙灶放其大夫于北燕。乙未出。书曰出奔，罪高止也。”《谷梁传》言：“其曰北燕，从史文也。”在此以前，《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有记：“夏，齐侯、陈

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晋。”杜预注：“燕国，今蓟县。”此后，《春秋·昭公三年》载：“北燕伯_𠂔出奔齐。”杜预注：“不书大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书名，从告。”孔颖达疏言：“传称燕大夫比以杀公之外嬖，公惧，奔齐，是被逐而出，非自去也。传又云：书曰北燕伯_𠂔（原文如此）出奔齐，罪之。是仲尼新意。”《左传》记：“九月，（齐）子雅放卢蒲嫫于北燕。燕简公多嬖宠，欲去诸大夫，而立其宠人。冬，燕大夫比以杀公之外嬖，公惧，奔齐。书曰：北燕伯_𠂔出奔齐。罪之也。”《谷梁传》亦言：“其曰北燕，从史文也。”由此可知，“北燕”之名原出《春秋》，当为时称，其意在区别于“燕”（即南燕）。其“_𠂔”，或作“_𠂔”，自古有之，故孔颖达引《春秋》经传作“_𠂔”而无异文（阮元《校勘记》不见有辨，另宋王应麟《诗地理考》等亦引作“_𠂔”）。而杜预注以此“北燕”



董鼎上铸有「匱侯」的铭文

混同于“匱”，以“𪔐”为此出奔的“北燕伯”之名，虽为后世所从，然似未必合于史实。查《春秋》有关诸侯国君出奔的记载，或书名，或不书名，而均可示以内、外之别。如《春秋》记桓公十一年，郑庄公卒，突（厉公）归于郑，郑忽（昭公）出奔卫。桓公十五年，郑伯突出奔蔡，郑世子忽复归于郑。昭公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昭公三十年，吴灭徐，徐子章羽奔楚。除徐子奔楚而外，前二例均涉及君位争夺，其书名可别于内。又记僖公十年，狄灭温，温子奔卫。僖公二十八年，卫侯出奔楚。襄公十四年，卫侯出奔齐。其不书名，可别于外（即诸侯国之间）。相比之下，“北燕伯𪔐”似并不与之同例。联系到《春秋·昭公六年》载：“齐侯伐北燕。”《左传》记：“十二月，齐侯遂伐北燕，将纳简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二。吾君贿，左右谄谀，作大事不以信，未尝可也。’”及《春秋·昭公十二年》载：“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左传》记：“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𪔐于唐，因其众也。”《谷梁传》言：“纳者，内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在此燕简公出奔，其国已另立国君的情况下，为区别两个北燕伯，若“𪔐”为燕简公之名，《春秋》似不会不书。而《左传》于“北燕伯”后增书“𪔐”字，并改“阳”作“唐”（据杜预注，阳即唐），似当视为广存异说^②。至于《谷梁传》所释，不书燕伯之名，是为了不与齐大夫高偃相提并论，显系牵合。其“𪔐”，既不为私名，则最有可能为国名。或当如楚称荆楚（一为本称、一为他称）之例^③，其国以“北燕”为他称，而以“𪔐”为本称^④。《春秋》书“𪔐”于“北燕伯”之后，当属附注、说明的性质。其之所以标注“𪔐”之本称于燕简公出奔齐之事，当是从此“北燕伯”所告。很可能其时以“北燕”之称通行于世，而本称“𪔐”已鲜为人知。

在铜器铭文中有一多与亞形合书之字（图徽），作𪔐、𪔐、𪔐、𪔐等状（上引亚孟铭文之𪔐即同于此），一般释读为𪔐、𪔐、𪔐等^⑤。当以释𪔐为妥^⑥，而含义则需重加分析。其上作𪔐形以象龠口，中为布翅两分之

状，下为枝尾与鱼尾同^⑦，正为燕鸟之象形，与甲骨卜辞中释燕字者如𪔐等极相类^⑧。《尔雅·释鸟》云：“𪔐周、燕燕、𪔐。”邢昺疏言：“燕燕，又名𪔐。郭云：一名玄鸟，齐人呼𪔐。此燕燕即今之燕，古人重言之。……孙炎、舍人以𪔐周、燕燕、𪔐为一物三名。”《说文解字》云：“𪔐周，燕也。从佳，山象其冠也，𪔐声。一曰：蜀王望帝姬其相妻，惭亡去，为子𪔐鸟，故蜀人闻子𪔐鸣，皆起曰是望帝也。”段玉裁注：“𪔐周、子𪔐，异物而同字。《文选·七命》：𪔐脾猩脣。李云：《吕氏春秋》曰肉之美者𪔐燕之脾。此燕名𪔐周之证。”又注：“《曲礼》：立视五𪔐。借为规字。汉之越𪔐，即此字，音髓。”由此推知，其𪔐当即𪔐周，与燕燕为同物而异名。𪔐字不见于典籍。《说文解字》有𪔐字，其释曰：“𪔐，未定也。从匕、𪔐声。𪔐，古文矢字。”而矢字下不载。《说文解字》又有疑字，其释曰：“疑，惑也。”疑字古文又有作𪔐者^⑨，或有可能为𪔐之变形。此𪔐、疑二字当皆从𪔐得声（其义或亦可能由燕鸟飞翔不定，使人看不清引申而来；许慎以𪔐为古文矢字，显系猜测，并无根据），如此，则𪔐当读如疑。古音疑属之部、疑纽；𪔐属之部、匣纽，周属幽部、章纽。其音相近。𪔐周当为𪔐字之缓读^⑩，其𪔐，形有可能为北燕人所造，音属北燕方言；称𪔐周则有可能为中原人所模拟^⑪，如同称子𪔐鸟一般；义则同于燕，故其国有燕之他称（为别于媾姓之燕而称北燕）。《左传·昭公三年》记周景王使詹桓伯言于晋曰：“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其燕，当即为他称，原文作燕（不作匱）。又，《逸周书·王会》载：“俞人虽马。”孔晁注：“俞，东北夷。虽马，𪔐如马，一角；不角者曰骐。”其俞（古音属侯部、喻纽），当为𪔐字之假借，即指北燕（国）。其贡品虽马，或有可能为虽、马二种，即肉之美者𪔐周与骏马，均为当地特产。又依俞人在会堂序列与稷慎（肃慎）、稷人、良夷、发（当即亳）人等相近，亦可判知其当为北燕。若以上所论有理，则《春秋》经传所记“北燕伯𪔐”当依孔颖达疏所引作“北燕伯𪔐”，“𪔐”

即北燕国之本称矣,增欠旁作𡗗,“款”为形之讹。带有𡗗字的𡗗器多出土于今河南安阳、北京房山及卢沟桥、辽宁喀左等地,时代早者可至商代后期、晚者在西周时期^⑧。由此推知,此一部族当很早即存在于北燕之地,且与中原地区联系密切,后即以族徽𡗗称国。据《春秋·哀公十五年》载:“夏五月,齐高无𡗗出奔北燕。”时在周敬王四十年(公元前480年),可知至春秋末期,𡗗国犹存。

其𡗗国所在,旧无确指。《水经注·鲍邱水》载:“(蓝)水出北山,径无终县故城东。故城,无终子国也。……其水又南入灋水。灋水又西南入于庚水。《地理志》曰:灋水出俊靡县,南至无终东入庚水。庚水,世亦谓之柘水也,南径燕山下。”《隋书·地理志中》载渔阳郡属无终县“有燕山、无终山。”《括地志》载:“燕山在幽州渔阳县东南六十里。”其无终县(无终子国)与无终山在今天津蓟县境,燕山在今河北玉田县境,二地相连。考古学研究表明,这一带有存在一个古国的可能,其文化面貌在夏商时期属夏家店下层文化,西周时期属围坊上层类型,春秋时期属张家园上层类型,前后一脉相承,具有明显的土著特征^⑨,或即为此𡗗人长期居存的中心区域之所在。其所临燕山,很可能是由燕鸟群栖而得名,或原当以北燕方言称𡗗山,而后改称燕山。至于无终国,很可能是在春秋晚期方迁于此地^⑩,于是有𡗗与无终二国并存。无终山之命名当在此时。至战国之世,此二国之地皆归属于𡗗。

如上所论,周初召公受封于北土,因建都于𡗗水之侧(今北京西南琉璃河)而称𡗗国,终周之世不曾改变。铜器铭文中𡗗字初作𡗗,从𡗗、从𡗗,因形旁互换而作𡗗,亦有因声旁互换而作𡗗者,古𡗗币中所谓“明”字当亦属此类变体。其皆不当与“燕”字混同为一。所谓北燕,当与此𡗗别为两国,是指今河北玉田县境(古燕山所在)的𡗗国。铜器铭文中所见的“𡗗”当属其徽文。𡗗即𡗗周(燕鸟名),为区别于南燕(今河南

延津县境)而称北燕。至春秋晚期,𡗗国犹存。战国以后,𡗗归于𡗗。

①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卷十四第十页。

②琉璃河考古队:《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文物出版社,1995年。

③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拒马河考古队:《北京市窦店古城调查与试掘报告》,《考古》1992年第8期。其推断窦店古城址为汉良乡县所在,似误。

④《说文解字》云:“聚,会也。从𡗗,从𡗗,取声。一曰:邑落曰聚。”

⑤据《汉书·王子侯表》,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封赵共王子刘交为梁乡侯,十六年而免。

⑥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字母》言:“凡影母之字引而长之则为喻母,晓母之字引长之稍浊则为匣母,匣母三、四等字轻读亦有似喻母者,古人于此四母不甚区别。”

⑦《周礼·天官·宫人》载:“宫人掌王之六寝之脩,为其井匱,除其不蠲,去其恶臭。”郑玄注:“井,漏井,所以受水潦。蠲,犹洁也。……郑司农云:匱,路厕也。玄谓匱猪,谓留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贾彦疏:“谓于宫中为漏井以受秽,又为匱猪使四边流水入焉。”

⑧其克鼎铭见《三代吉金文存》卷四第四十至四十一页,匱公匱铭见《三代吉金文存》卷七第三十一页。

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图一一九。

⑩《墨子·经上》曰:“圜,一中同长也。”参见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110~111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

⑪参见朱活:《匱币官窺——略谈匱国货币的几个有关问题》,《古钱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石永士、王素芳:《燕国货币的发现与研究》,《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二辑,1992年。

⑫参见高明编:《古文字类编》第135页,中华书局,1980年。

⑬《隶释》卷四。

⑭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诗经〉》,《文物》1984年第8期。

⑮据《春秋·昭公六年》载:“冬,叔弓如楚。齐侯伐北燕。”《昭公七年》载:“春,王正月,暨齐平。”

《左传》记：“春，王正月，暨齐平。齐求之也。癸巳，齐侯次于兢。……”于经文下杜预注：“暨，与也，燕与齐平。前年冬，齐伐燕。间无异事，故不重言燕。从可知。”孔颖达疏言：“暨，与。《释诂》文也。此直言暨齐平，不知是谁与齐平。《谷梁传》云：以外及内曰暨。谓此为鲁与齐平。贾逵，何休亦以为鲁与齐平。”当以《谷梁传》等所释较确，齐侯伐北燕、鲁与齐平及齐侯次于兢等，凡三事；杜预以其相联为一事，有误。

⑮《左传·哀公五年》载：“齐燕姬生子不成而死。”其“燕姬”，当即上记“燕人”所归者，原当作“匿姬”。

⑯《左传·隐公五年》杜预注：“南燕国，今东郡燕县。”又，《左传·宣公三年》载“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姑”，杜预注：“姑，南燕姓。”

⑰其“燕燕”二字据段玉裁注补。

⑱庚壶原藏于清内府，著录于《西清续鉴甲编》，今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其铭文多为锈所掩，张光远先生使用X光透视等法审得全铭应有一七九字，作《春秋晚期齐庄公时庚壶考》，载《故宫季刊》第十六卷第三期，1982年；张政烺先生又作《庚壶释文》，载于《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本篇引文从张政烺先生所释。

⑲《左传》记国名，地名等多与《春秋》相异，如《春秋·桓公五年》载：“州公如曹。”《左传》记：“淳于公如曹，度其国危，遂不复。”

⑳《诗经·商颂·殷武》云：“挾彼殷武，奋伐荆楚。”《国语·晋语八》记叔向言：“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古本竹书纪年》载：“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又，挾取殷铭文载：“挾取从王南征，伐楚荆。”贞殷铭文载：“贞从王伐荆。”《春秋·庄公十年》载：“荆败蔡师于莘。”《左传》记：“楚败蔡师于莘。”《春秋·僖公元年》载：“楚人伐郑。”《左传》记同。而后均以楚称之。据此，楚国当以“楚”为本称，“荆”为他称。

㉑葛英会先生在《燕国的部族及部族联合》（载《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一辑）一文中提出商周时代族名、人名、地名往往是三位一体，“北燕伯欵”

之语不是指某一个公侯而言，言“伯欵”即可指代燕，是以族称作首领称谓。欵可能是疑（即矢）字之讹，“伯欵”之称为亚矢是燕之徽号提供了一个佳证。其说颇具启示性。然以矢为燕字古文，以矢与匚同为一国，则似不确。

㉒参见王献唐：《黄县县志》第二部分，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

㉓刘心源首释此字为矢。其在《奇觚室吉金文述》卷六释矢贞铭文：“𠄎即矢，古文矢字，见《说文》𠄎下。古器多有亚矢二字，或云矢亚。矢字或正或反，或旁有羡文，象矢脱手发出形。”并附形同者以资参考。

㉔参见《说文解字》燕字释文及段玉裁注。

㉕参见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卷十一。

㉖见《康熙字典》正部疑下所附。

㉗古音有疑与求、柔、浮（并属幽部）等叶韵之例，参见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颐部疑字。其疑、匣二纽同属喉音（亦有以疑纽属牙音者，则发音部位相近于喉）。故可相通。

㉘宋代出土的晚商铜器禹贞铭文有“王锡禹𠄎贝在𠄎”。其𠄎𠄎，是否即禹周（或与之音近），不能确定，姑存疑。释文从晏琬：《北京、辽宁出土铜器与周初的燕》，载《考古》1975年第5期。器铭著录见于《嘯堂集古录》，原称商兄癸贞。本人曾就此请教于李学勤先生，谨致以谢意。

㉙参见晏琬：《北京、辽宁出土铜器与周初的燕》，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㉚参见韩嘉谷：《燕史源流的考古学考察》，载《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二辑，1991年。其文认为此古国有可能即是周封召公以前的土著燕国（族），而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文化遗存则当属无终国。

㉛关于无终国的记载见于《左传》襄公四年、昭公元年及《国语·晋语七》等。其居迁之地，依诸家考辨，当原在今山西太原境，而后迁于今天津蓟县境。参见《左传·襄公四年》杨伯峻注。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燕亳与蓟城的再探讨

陈 平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其首都北京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商代的方国燕、蓟在今北京市辖境内建立的都城“燕亳”和“蓟城”,是北京建都之始。它们对北京的城市与都城发展史,均具有初始发轫的特殊意义,非常值得我们一再探索、反复研究。

一、对“燕亳”的再探索

关于“燕亳”,文献最早见之于《左传》昭公九年传周景王特使詹桓伯对晋人的一段外交辞令中。其辞云:“肃慎、燕亳,吾北土也”。传世《陈璋方壶》和近年于江苏盱眙出土的《陈璋圆壶》铭“陈璋内伐燕亳邦之获”,又一说作为战国中期的青铜器铭文,最早提及了“燕亳”与“燕亳邦”^①。对《左传》中“燕亳”和《陈璋壶》铭的“燕亳邦”,学界歧见迭出,人言人异。但我以为,“亳”应乃商人对中央王朝与封国都邑的惯称,它与周人将都城称“京”、楚人将都城称“郢”同例;“燕”城而称“亳”,这本身就带有鲜明的时代与部族特征;它表明,“燕亳”的本义,必是商代之商人对其族之封国燕国都城的专称;引申开来,则又可作为燕国的代称。“燕亳”,相当于“燕京”。这座燕国都城,似应始建于商代,其年则不可确考。“燕亳邦”,相当于“燕亳国”或“燕京国”,所指即燕国。这种称谓,当是直接上承商代之“燕

亳”而下至战国之燕国的。“燕亳”作为燕都,不同时代的具体指称对象可能会有所转移;周初之“燕亳”城,应即琉璃河之董家林古城;商代“燕亳”城,或与之相重,或在其近侧;《陈璋壶》之“燕亳”城,则应在汉河间府易县,即今河北雄县古贤村之战国古城,系燕文公至燕王哙时燕国的都城。《左传》昭公九年传詹桓伯称“燕亳”为周北土之国邑,均应上承商人之旧,断不可视为自周始有之证。周初武王封召公奭于北燕,其始建周之北燕都城,与商代已有之燕国都城“燕亳”之间,似应具有渊源关系,当是直接承袭商代“燕亳”城而来者。这种直接承袭,我以为可能会采取以下两种形态。一是直接利用商代燕亳城的城垣旧址,于其上稍加修缮增固而成;二是,紧傍商代燕亳城之外侧或内圈,另筑新的“燕亳”城,或加筑宫城。

对董家林燕国初都的建城年代,人们的认识也有一个进化过程。八十年代初,主持琉璃河遗址发掘的郭仁、田敬东先生,曾依据1976年发现两座商末周初小墓分别打破东城与北城墙内护坡的现象,撰文认为该城的始建年代最迟不晚于商末^②。这一意见,一度曾得到不少学者的赞成。笔者在近年出版的一部小书中也认为,董家林古城有可能就是商代即已存在、且后又为周初召公封燕所承袭而被《左传》昭公九年传中詹桓伯所道及的“燕亳”城^③。1995年8月,在琉璃河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李

伯谦等先生发言,把郭、田文所说打破董家林古城内护坡的那两座小墓的年代改定为周初,并断然肯定这种打破为同期打破,同时推定该城的始建年代既不晚于,但也不早于周初。当时,由于所谓“同期打破”论者并未亮出足够的证据,而学人间对那两座小墓的年代究属商末周初、还是只属周初也认识不一,因此有些学者仍然认为:这种打破现象,至多只能说明董家林古城的始建年代下限不得晚于周初,但却不足以证明其上限不能早至晚商。1995年至1996年,考古工作者对董家林古城首次作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其总面积近三千平米,解剖城墙三处,出土陶、石、玉、骨等各类遗物千余件。在北城墙内护坡上又发现一座打破它的周初小墓,在东城墙北部发现用卵石堆砌而成的东西向排水沟一道,在96G108号灰坑发现刻有“成周”等字样的有字卜甲三片。关于那座打破北城墙内护坡的周初古墓,原报道推测它于78M2(按:即田文所说的76M2)一样,应与某种筑城仪式有关^④。果真如此,那自然是判定该城当兴建于周初的佳证。然而,田文所说76M1、M2和新近发掘的那座小墓的资料至今均未公布。某种筑城仪式应当是什么样子,这三墓到底是否与某种筑城仪式有关,持论者亦未明言,对此局外人无法置喙。这不能不说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因此,我们呼吁有关方面尽快公布这三墓的所有考古资料,以期深入探讨。出有“成周”等甲骨的96G108号坑,原报道从地层与遗物判定该坑与该卜甲的年代均为周初^⑤。如果能确定该坑与卜甲是该城中年代最早的遗迹遗物,那当然可以之作为该城始建年代的下限不晚于周初的一个辅证。然而,目前该城内尚未揭露、发掘尽净,言其年代最早似乎还略早一点。故而它们至多也仅可作为该城始建年代下限不晚于周初的一个辅证,却不足限定其上限不可早至晚商。最能说明董家林古城始建年代的建硬材料,是原报道称在城墙夯土内出有少量西周早期陶片的重要消息。如果该城是一次筑成的,而年代又确

属周初无疑,结合城墙内护坡被三座周初墓(如确为周初墓)打破的现象,自然足可得出该城建在周初的结论。然而笔者的上述几个假设,似乎目前都还没有定论。看来,要最后确定董家林古城的始建年代,还有一些工作要做。

笔者认为,周初武王灭纣、封召公于燕之年,并不完全等于姬周北燕的实际建国和董家林古城的始建之年(假如该城是就封燕侯至燕后新筑之城的话)。因为文献与考古资料都说明,召公封燕与其元子实际赴燕就封建国筑都之间可能并不同步,后者可能要滞后到成王初年。在笔者向1995年8月琉璃河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所提交的论文中,我曾根据琉璃河1193号大墓所出克器铭事燕六族中有位于今鲁豫交界的河南永城徐淮东夷^⑥国族的重要线索,得出了“克”确为召公代就封于燕之元子和其至燕就封之年当在周成王命周、召二公东征徐淮反夷并获胜之年或其后不久的结论^⑦。如果董家林古城确为召公元子就封至燕时所筑,其始建年代似亦当如上述。而在其外围或近侧另外还潜伏着一座商代“燕亳”城的可能仍不能排除,它与商代“燕亳”城存在某种承袭关系的可能也不能排除。董家林古城的边长仅八百余米,比起与其地位相当而边长均在三千米左右的齐临淄故城和鲁曲阜故城来,其规模似失之过小。因此,曲英杰先生曾推测董家林古城或许只是原燕国初都的宫城^⑧。北大严文明教授在1995年琉璃河大会发言中也提醒人们,要注意在董家林古城附近是否还另有商城。以上两位先生的意见,我以为很值得重视。董家林古城附近如有商城,则必须找出来;如无有,也要做工作予以排除。

二、对“蓟城”的再探索

1. 关于蓟城的具体位置

从《礼记·乐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和《史记·周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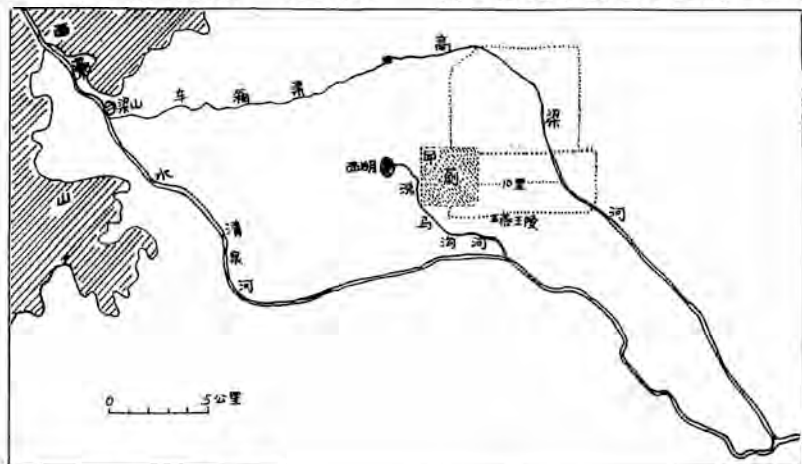
纪》“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帝尧之后于蓊”的记载分析，蓊城至少在武王克殷的商晚期就已存在，其始建之年则不可确考。据笔者推测，蓊城大约在西周中、晚期就已被燕国兼并且以之为都城了。它作为燕都，一直到燕为秦灭。作为战国晚期燕国上都乃至商代蓊国之都的蓊城，其具体位置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疑案。对此，古今大致有六说。下面，我们就分别介绍而探讨之。

①关于战国燕都蓊城至辽南京一贯说

北魏酈道元《水经·漯水注》云：“昔武王封尧后于蓊。今城内西北隅有蓊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武王封召公之故国也。”秦始皇二十三年，灭燕以为广阳郡。此乃酈氏以其北魏时所见之蓊城即战国之蓊城也。当代有些学者继承并发展了酈氏的观点，他们认为：“自春秋战国以来，历东汉、北魏至唐，蓊城城址，并无变化。其后辽朝，虽以蓊之故城置为南京，但是并无迁移或改筑。只是到了金朝建为中都之后，才于东西南三面扩大了城址”^⑥。这种意见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战国燕都蓊城至辽南京的一贯不变说（参见附图一）。

判断此说的是非，有三个问题不容回避：一、辽南京城到底在哪里？其位置是否可以一贯不变上溯到战国蓊城？二、白云观

以西的土丘是不是战国蓊城据以得名的蓊丘？三、如何理解八宝山西晋华芳墓志“假葬于燕国蓊城西二十里”这句话。考古学的层位学表明：存在着迭压关系的文化层，其层位愈下则年代愈早，反之则愈晚。古文献学又告诉我们：“丘”，乃是中国上古东方民族（东夷族）对聚落城邑的泛称，东方从古至今以丘名邑者甚众，如商丘、楚丘、帝丘、封丘、章丘等皆然，然范围大体不出冀鲁豫皖苏数省区。陕、甘西土虽有犬丘，但仍为东夷西迁之嬴秦等族所携而来者。上古东方低洼多水，城邑多在大阜广丘之上，故泛称之为“丘”。后先土亦积土为丘而建邑其上，仍称“丘”。进而“丘”渐转为抽象的城邑名而与丘阜无关，是乃“四邑为丘”之丘。无论蓊城原本是整个建在蓊丘之上，还是傍、围蓊丘而建，蓊丘都应是年代早于蓊城的丘阜。据主持蓊丘发掘的赵其昌先生介绍：在传为蓊丘的白云观以西土丘之下，他曾清理出过曲尺形残城墙一段，在该城墙下还压着三座东汉墓。赵先生认为：这段曲城形城墙应为该城的西北转角。其延伸线恰将传为“蓊丘”的白云观以西土丘的大部圈入城内而处其“西北隅”，它应即酈氏所谓北魏时之蓊丘无疑。而这段城墙，正与辽南京、唐幽州城西北角城垣重合，而其始建年代又必晚于被它迭压的三座东汉墓，位置



附图一：侯仁之先生对蓊城与附近水道相对位置示意图

（采自《文物》1959年9期第5页）

恰在华芳墓以东二十里左右。无疑它只能是自西晋迄于辽的蓟城、幽州城与南京城，而决不可能是战国秦汉的早期蓟城^⑧。

笔者认为，赵先生的论证以无可争辩的确凿证据说明：自战国燕都蓟城至辽南京城之间，并无一贯不变的城垣位置可言。对西晋或东汉以前的前期蓟城位置，必须另作考虑。至于白云观以西相传之“蓟丘”，由于其下压着三座东汉墓，其是否为战国以前蓟城据以得名之蓟丘也就很可疑了。如果是东汉墓先打破土丘、城墙再打破迭压于墓上，则该土丘还有可能是蓟城得名之蓟丘；反之，则不是。情况到底如何？局外人至今仍不得而知，也无法判断。笔者还认为：西晋幽州刺史王浚妻华芳墓志所说的“燕国蓟城”，指的多半不是战国时燕国的蓟城，而更可能是魏晋时诸侯王封国的燕国蓟城，亦即赵先生所掘白云观以西“蓟丘”下的后期蓟城，因为魏晋时位于今北京的诸侯王国也叫作燕国。

②关于古瓦井密集的宣武至和平门一带说

1956年，配合永定河引水工程，曾发现战国秦汉古瓦井一百五十余座，分布最密集的是今北京城区内宣武门豁口至和平门一带^⑨。1965年，在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又发现同一时期的古瓦井五十余座；而在琉璃厂、新华街、象来街、北线阁、广内街、校场口、陶然亭、白纸坊、西单大木仓等地，也都有瓦井发现。在瓦井密集的陶然亭、天坛、蒲黄榆一带，还发现了大量战国秦汉墓^⑩。1971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旌文冰”的（按：即北京文物战线一兵）《北京的古陶井及古蓟城遗址》一文，首次将有关古陶井的出土地与古蓟城联系起来考虑。此文虽受战国蓟城至辽南京一贯不变说的影响较深，但能指出古蓟城可能就在瓦井分布最为密集的自西便门经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仍为该说开了一个好头。在“旌文冰”文发表前后，还有一些考古发现与古蓟城有关。比如，1965年修地铁时，曾在北京西郊八宝山发现了西晋幽州刺史王

浚之妻华芳墓，墓中出有晋代骨尺和墓志等重要文物，墓志云华芳于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假葬于燕国蓟城西二十里”^⑪。1974年春，以赵其昌先生为领队，配合基建，又发掘了白云观以西郦注之所谓“蓟丘”。结果发现，在“蓟丘”下压着一段曲尺形拐角古残城墙，在城墙下还压着三座东汉墓。该城墙西距八宝山华芳墓正合晋尺二十里，显然当是墓志所言之“燕国蓟城”；而这段城墙，又恰是郦注所言北魏之蓟城、唐之幽州和辽之南京城的西北拐角^⑫。这表明，辽南京城至多只能上溯到东汉以后的魏、晋时期，东汉以前的蓟城当另外寻觅。1974至1977年，在白纸坊路北、法源寺近侧和西单白庙胡同路南，又先后发现了三处战国至西汉的墓葬。在“旌文冰”文发表以后，北京市的一些考古学者还就瓦井的发现、分布与古蓟城的关系作过一些报道与研究，但观点均不够鲜明。1979年，北京市文物局考古队发表专文，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古蓟城位于瓦井密集的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的学术观点；并据1974年在蓟丘下曾发现古城墙下压着三座东汉墓的实际，指出该城必晚于东汉，它不可能是战国古蓟城，否定了战国蓟城至辽南京一贯不变说；又据近年在中南海至龙潭湖之间发现一条永定河故道的实际，作出了战国蓟城东部后期可能曾被古瀑水冲毁因而在东汉以后西移的推测；该文还认为，战国蓟城南墙可能在法源寺以北，北墙则有可能在西长安街以南^⑬。

判断此说能否成立的关键，就是要看先秦两汉时期的城址内是否可以存在墓葬，尤其是大型墓葬。近年有的学者撰文认为：“古代习惯，城内一般不做墓地，特别是大型墓葬，在城内者更属罕见”，“墓葬所在，常常不是同期城池所在”，白纸坊附近、宣武门与和平门一带虽然井圈集中，可在它们附近都有大量战国秦汉墓存在，“上述地点，不论发现的是东汉、西汉或战国墓，也不论它距井圈出土地点相近、相远，在道理上讲，都不应是前期蓟城所在。而且，从

墓葬的分布看,墓葬与墓葬之间,也常常没有可容城址的间隙”^⑩。那么,在先秦两汉时期,城内是否可做墓地,特别是埋存大型墓葬呢?我想借用瓯燕先生近年的一段论述,来解答这个问题。瓯燕先生说:“在燕下都城址内外发现有战国时期的墓葬,如东城内西北角的虚粮冢、九女台为两处贵族墓葬区,地面都有高大冢丘,排列整齐有序。虚粮冢墓区有冢丘13座,九女台墓区有10座,其中16号墓及具车马坑已经发掘(笔者按:16号墓,学者多以其为燕王墓)。在西城内亦发现有5座冢丘墓。此外在城内发掘墓葬多座。……在东周列国都城内发现同时期的墓葬,或自成墓区,或与民居、作坊杂处,是一种普遍现象。如洛阳东周王城内的墓葬分布范围,东起金谷园路,西及涧河之滨,南自东下池,北逼陇海路,几乎遍布全城,贵族大墓则位于王城北部。齐都临淄的大城东北部河崖头村、南部刘家寨、北部付家庙村、阚家寨村之间都有东周墓葬发现,被推断为齐景公墓与殉马坑的位置即在河崖头村,这里亦是一处贵族墓地。曲阜鲁城内发现四处墓地,它们分布在鲁城西部三分之一强的范围内,而且与手工业作坊、民居遗址错落。中山国都灵寿的西城外和西城内西北部各有一陵区,并都有陵垣之设。著名的中山王^⑪墓(一号墓)和六号墓即分别坐落在这两处陵区内。新郑的郑韩故城之西城东南部和东城西南部均探出三百余座墓葬,其中不少属于大墓,估计贵族墓葬亦在其地。这些都城内的墓葬据已发掘的资料证明,它们的年代都与所在城址的年代一致。即是说,其墓主人为城内之居民,东周时期有把死者埋于城内之葬俗。”^⑫读完瓯燕先生的这一段话,我想读者们就不会再把附近有同期墓葬看作为瓦井密集的宣武门、和平门一带做前期蓟城城址不可逾越的障碍了。不但不会看成是障碍,反而会看成是该地区作为前期蓟城城址的有利条件。平心而论,宣武门、和平门一带战国秦汉瓦井密集,同期墓葬又很多,是迄今为止与同期城址有关的考古发现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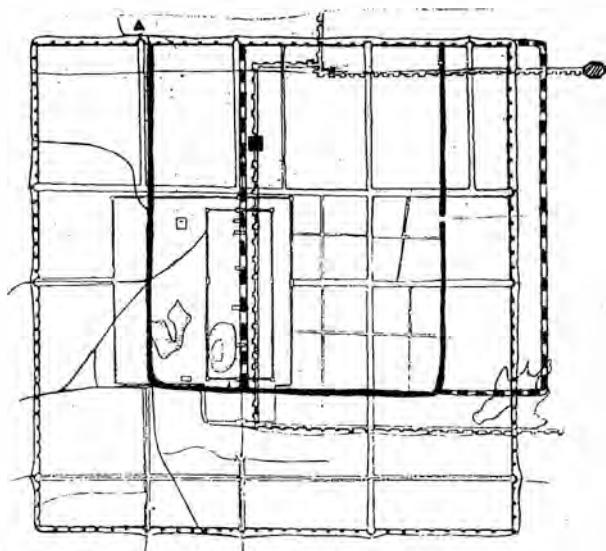
多,也是最有条件作为前期蓟城城址的首选地区。把有这么好条件的地点因附近存在同期墓葬便将它从前期蓟城的位置上给排除出去,实在是太可惜了。我想,我们应当把它重新捡回来,认真加以研究。

从前面的介绍可知,1974年赵其昌先生在白云观以西所谓“蓟丘”下发掘出来的那段曲尺形古城墙,正是自西晋历经前燕、北魏、隋唐而至辽的蓟城、幽州与南京城的西北转角,是晚期蓟城。我们也很赞成北京市文物局考古队的同志们在1979年专文中所说的“由于漯水的洪水泛滥,(前期蓟城)东部被冲毁,因而在东汉以后西移”的意见。那么,漯水究竟是什么年代冲毁前期蓟城东部,而晚期蓟城又是以什么方式自前期蓟城的原位西移的呢?

古漯水,又写作漯水、澠水与漯水,今中、下游称永定河,上游称桑干河。近代永定河自京西石景山冲出峡谷奔向平原后,即经卢沟桥向东南一泻而下,但在上古时期它的流向却不是这样的。今已探明:自晚更新世以来至汉代,漯水(即永定河)的故道却是出石景山向衙门口东流,至八宝山沿其北谷北折至田村,又东流紫竹院、德胜门,再东南折向什刹海、北海、中海、石碑胡同、高碑胡同、正阳门、鲜鱼口、长巷三条、芦草园、红桥、跳伞塔,经龙潭湖西部,在贾家花园流出城外,再流向马驹桥的^⑬。也就是说,古漯水(今永定河)汉代以前是从石景山折而向东北流,在前期蓟城的北、东二垣之外绕了一个近似于直角的大湾后,才转向东南,流向大海的。至三国曹魏嘉平二年(公元250年),征北将军刘靖于梁山(今石景山)立堰于漯水,道高粱河,造戾陵堰,开车箱渠,自梁山向东直达今通县、潞县。山川暴戾时,漯水仍由主河道乘堰东下;平流守常时,漯水则分流自堰门向东流,岁灌蓟城南北农田万有余顷。这是一个与四川都江堰极为相似的我国古代又一大型水利工程。戾陵堰造成受益45年后的西晋元康五年(公元295年),漯水暴发特大山洪,冲毁损坏了戾陵堰四分之三的坝堰,洪水割

削堰渠北岸堤防长达七十余丈，上渠车箱，所在漫溢^⑧。据笔者估计，可能正是这场特大洪水，也冲毁了前期蓟城的东部。这时，恰逢刘靖的少子刘弘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为宁朔将军。于是他亲率军民重修戾陵堰，起长岸，立石渠，修立堰，治水门，对该项工程加高加固，使之远胜于旧堰^⑨。学者每称：“东汉以后，漯水改道，经今衙门口，东南流向小井，至马家堡南下，即《魏土地记》称清泉河者，而旧河道又为高粱之水所流经。”^⑩笔者认为，漯水所以不再经蓟城以北、以东之故道而改走蓟城南十余里的清泉河向东南而下，其起因大概也是刘弘重修戾陵堰及重新规划梁山下漯水走向的原故。改道的时间，可能也在西晋元康五年。我们认为，可能也在这段时间内，被漯水山洪冲毁其东垣的前期蓟城沿水平方向向西迁移，而重新构筑了晚期蓟城。此举的主持者，可能也是刘靖的少子宁朔将军刘弘。

蓟城在西晋元康五年或稍后曾沿



附图二 笔者对蓟城的复原示意图

- 明北京内外城垣
- 金中都城垣
- ▲ 金中都会城门
- 辽南京城垣
- 战国蓟城垣
- 广安门
- 正阳门

水平方向向西挪移而构筑晚期蓟城，也是有后事为鉴而可以逆推的。明初徐达攻克元大都，为加强城防，就曾舍弃大都北城之一部，将大都北垣沿水平方向内缩南移了约五里。永乐重建北京城时，又将大都南垣沿水平方向外拓南移了约二里。这两次分别将大都北、南二垣沿水平方向南移，才构成了明代北京的内城。而其东、西二垣除截其北段而增其南段外，不仅走向未变，其城墙、城门也都沿元大都东、西二垣之旧。刘弘之重修蓟城，或亦应与之相仿。即舍弃已被洪水冲毁之前期蓟城东垣，沿水平方向往西内缩一、二里再筑晚期蓟城之东垣；拆除前期蓟城之西垣，向西外拓一、二里再筑晚期蓟城之西垣；南、北二垣截其东段而补其西段外，其余一仍前期蓟城之旧，前期蓟城南、北二垣的城墙、城门在晚期蓟城中大多也都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按：与明北京内城西直门仍沿元大都和义门之旧一样）。《后汉书·姚期传》所言姚期奋戟的早期蓟城南门在北魏酈道元《水经·漯水注》中仍被称道，其原因恐即在此。

如果赵其昌先生当年能沿着残城墙西北转角的北垣继续向东顺藤摸瓜，或许在其东二里左右的地方会发现前、后蓟城北垣西段的结合部，而使其真相大白。据笔者推测，要想寻找前期蓟城的东、西二垣，只需从晚期蓟城（即辽南京城）东、西二垣沿水平方向再向东推出二里许即可。其东垣，或在正阳门西侧向南一线；其西垣，则或在广安门外护城河以西里许向南一线（见附图二）。其东垣由于洪水冲刷，恐已无遗迹可寻；而其西垣的基槽，或许将来会在辽南京城西垣以东二里许的南北纵线上觅得。以上推断确否，还需将来的考古发现去验证。

③关于京西八宝山以西略北地区说

赵其昌先生于1986年撰文，依据其1974年发掘“蓟丘”之所得，一

方面得出结论：“蓟丘”下古城要晚于东汉，当为西晋蓟城，前期蓟城不在这里；另一方面，又以“城内一般不做墓地”、而宣武门至和平门古瓦井密集区附近有同期墓葬为由，否定了宣武门至和平门古瓦井密集区为前期蓟城说；最后，他还提出了前期蓟城可处位置的三种假说。其假说之一，便是京西八宝山以西略北地区说。赵先生认为：白云观以西土丘古文化层中常有棱角磨光自上游冲刷而来的战国陶片发现，这些陶片应来自京西八宝山以西略北的永定河东岸地区，该地区的“古城”这个地点很值得注意，虽几经调查既未见古城古物遗迹，也未能弄清“古城”这一地名的由来，但这一带极有可能为前期蓟城之所在地，今后的考古调查、发掘或出土实物也许会补充、修正或否定这一假说。

笔者认为，1974年赵其昌先生发掘白云观以西土丘所发现的从上游冲下的棱角磨光的红陶片，或出于赵先生所推测的八宝山以西略北的前期蓟城，也或出于该地区的一些战国秦汉聚落。在没有发现该地区的前期蓟城城垣遗迹之前，似乎还不足以说明该地区就确有前期蓟城存在。笔者于1996年11月22日曾应邀赴首钢公司参加由该公司的绿化公司发起的“石景山地区东周蓟城论证会”，有幸目睹了关续文先生在《北京文博》1996年2期《东周蓟城遗址踏勘记》一文中所述与东周蓟城有关的遗迹与遗物。我认为：关先生所携陶片，确属战国秦汉时期，为该地区那一时期确有先民居住之佳证；其所言或可为战国蓟城内王宫、官署的断壁残垣及券拱石室，似均为辽金以后的晚期建筑遗迹，尚无一例可早至战国者；特别是那些“券拱石室”，似均为辽金以后之过道门洞、出水涵洞之类，好象还不足以将其称为“券拱石室”，更不足以方燕昭王时之宁台、“磨室”（按：磨室，旧注仅云为燕之宫名，不免失之笼统。愚见以为，它很可能就是燕国的“金匱石室”，与明清的皇史宬相仿，为燕国宝藏王家盟书、鼎彝等档案之秘库。《史记·乐毅列传》所以

云：“故鼎反乎磨室”，或即因故鼎原本就以铸有王家档案之盟约铭文而藏之于磨室之故）。至于关先生目之为东周蓟城东垣的土龙岗，既已于农业学大寨时遭平毁，且从其所描述追记的形态分析，似底宽既不足为城墙之基，其土质黑壤土也不似城墙夯土，倒象是汉以后先民所筑防洪之堤坝。其所言蓟城垣墙四至，也多出于悬拟，而乏实据。总之，京西八宝山以西略北地区，虽有作为前期蓟城城址之可能，但以目前的发现与遗迹而言，似尚不足以得出肯定性的结论。

④、⑤关于京西南外城以西与后期蓟城以南二说

京西南外城以西，是赵其昌先生对前期蓟城位置提出的第二种假说。赵先生在文中认为：1957年《文物参考资料》第7期报道的出土战国燕国饕餮纹瓦当等物的北京广安门南700米护城河西岸，因处于后期蓟城内西南侧而与前述白云观遗址的后期蓟城与墓葬的迭压关系相矛盾，也与前、后期蓟城没有继承关系的结论相矛盾，因而不大可能是前期蓟城之所在。如果这里的瓦当与文化层也有受到水沙冲磨的迹象，则前期蓟城应位于其上游西部的京西南外城以西地区。

后期蓟城以南，则是赵先生的第三个假说。在文中，赵先生认为：如果前述北京广安门南700米护城河西岸的瓦当与文化层堆积遗物没有受到水沙冲磨痕迹，则该地区应是战国蓟城无疑；至于它与后期蓟城城位的矛盾，就只有重新考虑后期蓟城之复原是否正确了，特别是对复原后的南部城墙要重新考虑，适当北移。在这样的情况下，前期蓟城则应在后期蓟城之南，二城相隔、相接，或有极少部分套迭。造成人们放弃前期蓟城而稍加北移另建后期蓟城的原因，以洪水的可能性更大。今白云观西的土丘，正是“蓟丘”之所在。前期蓟城北倚其城外之蓟丘而为名，后期蓟城北迁之高阜，将蓟丘套入城内西北隅而沿用蓟城旧称，均为情理之所必然。且前期蓟城若在后期

蓟城之南,则前述今北京外城内西南侧及白纸坊的古墓即均应在前期蓟城之外而不存在牴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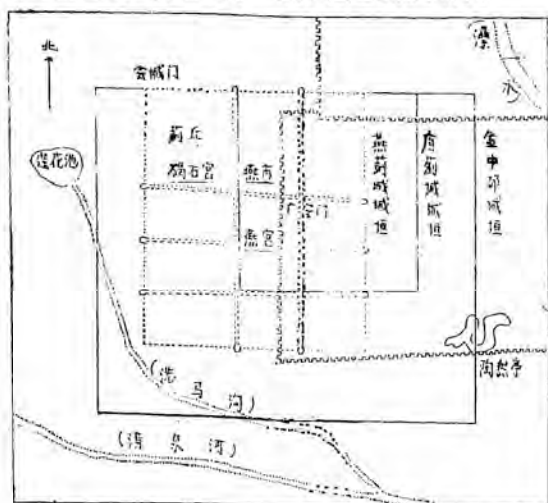
笔者认为,以上二说均系推测而缺乏必要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作依据,尚难作出结论。

⑧关于战国蓟城与唐蓟城套接而略出于其西南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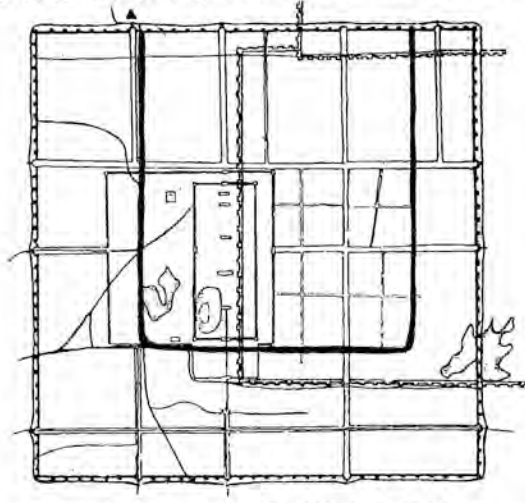
此说由曲英杰先生于199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为其出版之专著《先秦都城复原研究》之《燕都蓟》一节中提出。曲说认为:1957年出土燕饕餮纹半瓦当的广安门外桥南一带,出土器物年代最早接近西周,当即周初蓟国都城之所在,战国燕都蓟城即以此为基础而有所扩展。燕人扩建蓟城,极可能始于燕文公;其所筑蓟城,一直相沿至北魏未改。1974年于白云观以西土丘下发现的古城墙,很可能是唐蓟城而不是西晋蓟城之西垣;有人据之所作出汉以前蓟城在其东、曹魏以后方西移至此的推断,理由并不充分。曲说据华芳墓志、晋尺和《太平寰宇记》载传为袁山松《后汉书·郡国志》佚文及有关出土唐墓志推出:战国燕都蓟城应西起今会城门、北蜂窝路一线,东至牛街、右安门内大街一线,北起头发胡同一

线,南至明清北京城外城南垣内侧一线。东西长约3000米,南北长约4000米。东、西垣各开三门,南北垣各开二门,共十门。曲说对城内燕宫城、燕市与碣石宫、蓟丘位置均有推断,并将蔡公庄、西单大木仓、宣武门、和平门、校场口、琉璃厂等地出土的战国秦汉陶井和宣武区韩家潭出土的饕餮纹半瓦当、明刀视为蓟城外居民邑落与宫殿之遗迹(见附图三)。

曲英杰先生此说虽可称考证缜密,但仍无可商之处。曲说所据《太平寰宇记》引传为晋袁山松《后汉书·郡国志》所述的蓟城长宽与门数,所据恐非战国蓟城,而系西晋已改筑之晚期蓟城。以之恢复战国蓟城,似难得其原貌。另外,曲说所据华芳墓志所言“燕国蓟城”与该基地的方位、里数,也恐系三国魏晋时之燕国蓟城,而非战国时之燕国上都蓟城。所绘线图也有不够准确之处。辽南京城与唐幽州蓟城本为一城,而其城之西垣正处金中都城城门向南一线。而曲书附图将唐蓟州城西垣远离正对金中都城城门向南一线而东缩不少,人为地将依华芳墓志所言方向、里程而与唐蓟城西垣、金中都城城门向南一线重合的墓志所言“燕国蓟城”西垣分离开来,似乎有



附图三:曲英杰先生对燕蓟城推测示意图(采自《先秦都城复原研究》一书第302页)



附图四 于杰先生复原的金中都城图 ▲为会城门 — 为辽南京城 为明北京城 (采自于杰著《金中都》)

些考虑欠周(附图四:“金中都、辽南京城复原图”,采于杰先生著《金中都》一书,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此外,曲书所据以恢复战国蓟城四至的各唐墓志所言方位、里程,其所言“蓟城”似亦皆指唐时的晚期蓟城,而非战国之蓟城。这样复原出来的蓟城,似只能离远于战国蓟城,而贴近于唐代蓟城。

除以上六说外,王世民、李学勤二先生也曾道及过燕蓟城问题。由于受资料的限制,二先生出语均很谨慎,仅列举与蓟城有关各项考古发现,而基本未就蓟城位置作具体描述。然从文意体味,似乎李先生更倾向于本文所归纳的第一说;其书中所绘蓟城虚线图,也大体与辽南京城垣吻合(见附图五)^⑤。苏天钧先生对战国蓟城的看法也近似于侯仁之先生,但他据平谷刘家河发现的一座殉有两组青铜礼器及铁刃青铜钺等具有商文化特征的墓葬推断,商末周初的早期蓟城很可能就在这一带^⑥。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处陈旭处长,近来也曾撰文论及早期蓟城的定位问题。然该文在谈到战国蓟城时,仅介绍了赵其昌先生所作的三种假说,而对本文所列举的①、②、⑥三说却均未涉及。

关于商末周初更早期的蓟城位置问题,平谷刘家河出土有青铜礼器及铁刃青铜钺的墓葬自然不失为一个重要线索,但仅据此似还不足以作出那时蓟城即位于这一带的推断;我个人更倾向于曲英杰先生的意见,出有饕餮纹半瓦当且有一米厚文化层、出土物时代可接近西周的广安门外700米附近,好象更具有作为商末周初蓟城旧址的条件。

2. 关于蓟城始为燕都的年代

这个问题,学界大致有以下四说。

①西周初年召公封蓟说

此说较早见于《汉书·地理志》,其文云:“广阳国。蓟,故燕国召公所封。”《水经·漯水注》亦云:“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武王封召公之故国也。”《史记·索隐》也说:“后武王封之(召公)北燕,在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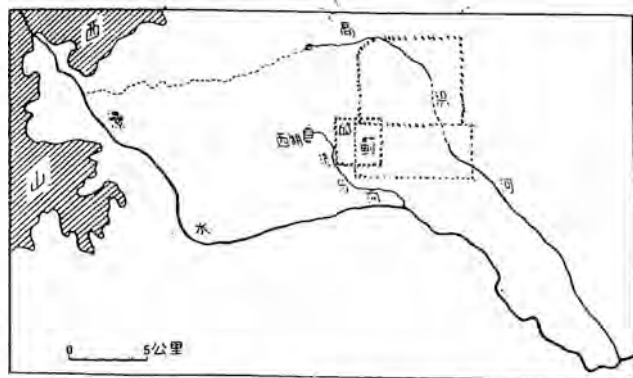
幽州蓟县故城也。”此后古书各有采此说者,然此说实误。《礼记·乐记》云:“武王封黄帝之后于蓟”,《史记·周本纪》又云:“武王封帝尧之后于蓟”。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虽以“黄帝姬姓,君奭其后也”语,而将封于蓟的黄帝之后调停为燕召公奭。但君奭为周王室宗亲,不可能兼作黄帝之后,故此说实不可从。周初被武王封于蓟的,若非黄帝之后,就必为帝尧之后,而决不可能是燕召公奭。其实,召公封蓟之说因史仅言封召公于北燕而未言燕都,后世俗儒又见《韩非子》、《战国策》、《史记》等书称战国晚期燕都率以蓟当之,便以战国时之情形逆断周初之事实而成者,不足信据。

②成王更封召公于蓟说

此说始见于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因其已先睹《礼记·乐记》武王封黄帝之后于蓟之说而又见战国晚期燕以蓟为都之载,故出于己意而妄为调停曰:“或曰:黄帝之后封于蓟者已绝,成王更封召公奭于蓟为燕。”然此说凿空立论,实不可信据。

③春秋中期的燕襄公或燕襄王始以蓟为都说

此说自1982年始见而至今愈盛,信从之学者颇多,影响也很大。但此说主要基于对《韩非子·有度篇》“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的一种误解,从根本上讲是站不住脚的,应尽快予以纠正。1982年,有位学者



附图五 李学勤先生对蓟城位置的示意图
(采自《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第87页)

可能是以为《韩非子·有度篇》中“以河为境，以蓟为国”的燕襄王，乃《史记·燕世家》燕襄公之误，故而在其文中引用《有度》时干脆就将篇中的燕襄王改成了燕襄公，并将燕始以蓟为都的年代定在了燕襄公所处的春秋中期^②。1983年，另一位学者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他说：“据《韩非子·有度篇》所载，起码在燕襄王（《史记·燕召公世家》作‘襄公’）时，蓟已经成为燕国的都城。襄王（公元前657—前617）在位时，当春秋中叶。就是说，从春秋中叶开始一直到秦拔蓟城燕国灭亡止，蓟一直是燕的都城之一^③”。1990年，又一位学者表述了相同的意见。他说：“大约在西周末年或东周初年，燕国兼并了蓟国，并且迁都到蓟城，所以《韩非子·有度》篇有记载说：‘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④1991年，还有一位学者发表了近似的看法。他说：“《韩非子》说：‘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燕无襄王，当为襄公之误。……燕国在齐国帮助下复国（按：当指齐桓公于襄公父庄公三十年伐山戎救燕之役），又迁都于蓟^⑤。”此说在新闻媒体中影响也颇大。《中国教育报》于1995年6月10日第4版《摄影专刊》《骄傲与辉煌——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的说明词中便称：“在武王封燕的同时，曾封帝尧之后于蓟。但蓟弱燕强，蓟后来被燕吞并，在春秋中叶燕襄王以蓟为燕之都城。”^⑥开馆于1995年5月的辽金城垣博物馆在陈列展厅中关于《辽金以前的北京》一章的说明词里也写道：“武王灭商，封召公于燕，封黄帝之后于蓟。春秋中叶，燕襄王迁都于蓟。”

笔者认为，从《韩非子·有度》与《史记·燕世家》的诸家古注中，皆不见云《有度》之“燕襄王”在《燕世家》当作“襄公”者，故有的学者作如此说是没有根据的。战国中期的公元前334年齐威王与魏惠王的徐州相王和公元前323年的秦、燕、韩、赵、中山五国相王，是战国史也是整个中国古代史上的两件大事^⑦。在徐州相王以前，除戎狄蛮夷之君如楚、吴、越等国曾僭称王号以

外，秦、韩、赵、魏、燕、齐等服属华夏之国无一称王者；徐州相王后，亦仅齐、魏二国之君始称王，秦、韩、燕、赵等国仍从无称王者；只是到了公元前323年五国相王以后，燕国历史上才出现了第一位开始称王之君——燕易王，此前的燕国无论何时均无称王之君。上述所谓春秋中叶的燕襄王始以蓟为都云云，姑且不论燕始以蓟为都是否处于春秋中叶，单说春秋中叶已有个燕襄王，这就是一个大大的疏误。

笔者还认为，古书中固然常有将此人误作彼人之例，但《有度》篇中之“燕襄王”却决非《燕世家》中春秋中叶的“燕襄公”之误；史也决非燕无襄王，而恰恰是曾经有过一个“襄王”的；这个襄王，亦决非春秋中叶之燕襄公或燕襄王，而应当就是战国中、晚期燕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燕昭王。笔者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燕昭王死后的谥号原本为双谥，称“燕昭襄王”，这就象秦昭王史亦称其为秦昭襄王一样。两号合之，则称燕昭襄王；析而言之，则取其前可称燕昭王，取其后可称燕襄王。《韩非子·有度》之“燕襄王”，正是析而言之独取其后者。除此以外，任何别的解释都是不正确的，也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此说的过硬证据，古今皆有。《汉书·武五子传》有云：“且燕国虽小，成周之建国也，上自召公，下及昭襄。”文中的“昭襄”，其实就是取双谥“昭襄”的燕昭王。惜乎颜师古不谙于此，竟将此“昭襄”误注成了六国时燕之二王。最新而又最为确凿的证据，则在近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其书第十九章篇题为《秦客卿造谓穰侯章》，其辞云：“侯何不使人谓燕相国曰：‘……因天下之力，伐雠国之齐，报惠王之耻，成昭襄王之功’”^⑧。这里的“昭襄王”与前句单个的燕王“惠王”连文对举，肯定只是一个与“惠王”时代相近而毗连的谥号作双称的“燕昭襄王”，而不是一作“昭”另一作“襄”的不同的两个燕王。考燕君称王后谥号中含“昭”者，仅燕昭王一人。则帛书燕之“昭襄王”必当系燕昭王

无疑。更为不容置辩的铁证是，帛书该篇在今传本《战国策·秦三》中仍存，篇题同为《秦客卿造为穰侯章》，文字也基本相同。然而，在与帛书上引的“昭襄王”相对应处，《战国策》赫然正书作“昭王”。有此铁证为凭，《汉书·武五子传》与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十九章·秦客卿造谓穰侯章》中之燕的“昭襄王”当为燕昭王，燕昭王有双谥作燕昭襄王，燕昭王也就是《有度》中之燕襄王，我以为大概可以“盖棺论定”了。

笔者遍查《韩非子》现存诸版本，尚未见有一将燕襄王另书作燕襄公者。有的学者因自以为《有度》中“燕襄王”乃“燕襄公”之误，便径直将《有度》之“燕襄王”改作了“燕襄公”，这种“改字读经”的做法，我以为是不够审慎的。

上述诸位学者在引用《有度》时，都只引其前边的“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一语立论，却没有注意到其后边还有一段关于燕襄王“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的重要记叙。“残齐，平中山”，显然只能是燕昭王时才有可能发生之事。残齐，应指燕昭王二十八年命乐毅率五国之师大败齐师于济西并一鼓攻克齐都临淄之役^①；平中山，当指燕昭王十七年与赵、齐共同伐灭中山之役^②。此乃篇中燕襄王必是燕昭王的有力内证。其实，《有度》中“燕襄王以河为境”句，也不失为篇中燕襄王当为燕昭王的得力内证。自春秋时期黄河入海口一度由今河北南移至山东入海后，燕国之疆域在昭王以前其南界皆不至黄河，而齐在黄河以北则拥有大片国土。在《战国策·燕二》的乐毅报燕惠王书中，有一段乐毅回忆他在燕昭王二十八年奉命伐齐拓宽燕土的文字，其辞云：“以天之道，先王（笔者按：指燕昭王）之灵，河北（笔者按：指黄河以北）之地（笔者按：指原为齐国所有之地），随先王举而有之于济上。”这段文字以确凿的史实证明：只有到燕昭王二十八年乐毅率五国之师大举克齐于济上之后，燕之国境方才南扩到了黄河北岸。而这，正是《有度》之所谓“燕襄王以河为境”。请问，《有度》之燕襄

王若不是燕昭王，还能是谁呢？总之，若以《有度》之“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作论据推定燕始以蓟为都的年代，绝对不可能得出春秋中叶的燕襄公或燕襄王时即已以蓟为都的结论，而只能得出战国中、晚期之际的燕昭王方以蓟为都的结论。平心而论，燕之以蓟为都，好象还不至于晚至战国中、晚期之际的燕昭王之世方始。故而，我以为：论蓟始为燕都之年，最好不要以《有度》为据。

④西周中、晚期之际燕或始以蓟为都说

关于燕人并蓟，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蓟、燕二国俱武王立”、后“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之语可谓说出了几分真相。但何时燕始并蓟居之，却史无明文。最近琉璃河董家林古城的发现，倒是透露出了一点信息。据有关报道称：在最近的发掘中发现，城墙内护坡部分地段被西周晚期层位打破，护城河也被含有西周晚期陶片的淤泥层所覆盖，故而该城的废弃年代不晚于西周晚期。如从西周晚期略向上延，并估定该城的废弃年代亦不早于西周中、晚期之际的话，我以为是大体可行的。前两年，我曾在一部小书中推测，燕并蓟为都之年或在西周的中期或晚期^③。文献载燕君之迁都，最早当推《世本》所言之“燕桓侯徙临易”。这次迁都，笔者曾论定其当发生在春秋早期晚段的燕桓侯之世^④。“徙临易”的如果确如笔者所论为春秋早期晚段的燕桓侯的话，从时间上它相距燕国初都董家林古城废弃的上限西周中、晚期之际近二百年，距其废弃下限西周晚期也有一百余年。这一、二百年中，燕都既不在初都董家林古城，也不在临易，出现了一段不短的空白。这段空白，必须由另一座都城居中作过渡。这座居中过渡燕都的最好候选者，我以为莫过于蓟城。这便是我为什么会提出蓟城之始为燕都或在西周中、晚期之际的一点理由。

①《陈璋方壶》，著录于《三代》12·24·1，现

流落美国。《陈璋圆壶》1982年2月出土于苏北盱眙县南窑庄铜器窖藏,铭文发现于1986年,消息首先披露于1986年10月22日的香港大公报,正式研究论文始发于《考古》1988年第三期周晓陆撰《盱眙所出重金铭陈璋圆壶续考》。

②郭仁、田敬东:《琉璃河商周遗址为周初燕都说》,《北京史论文集》第一辑,1980年。

③见拙著《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上册第6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版。

④琉璃河遗址考古队:《北京琉璃河遗址发掘又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7年2期、1月12日第1版;赵福生:《琉璃河遗址访谈录》,《北京文博》1997年1期。

⑤雷兴山、郑文兰、王鑫:《北京琉璃河遗址新出卜甲浅识》,《中国文物报》1997年3月30日第3版。

⑥陈平:《克器事燕六族集释考证》,《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⑦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第28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

⑧侯仁之:《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文物》1959年9期;《说蓟》,《北京日报》1962年2月8日;《历史上的北京城》,《光明日报》1962年1月17日;《北京城的兴起——再论与北京建城有关的历史地理问题》,《燕都》1991年4期。

⑨、⑬、⑮:赵其昌:《蓟城的探索》,《北京史研究》(一),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年版。

⑩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白云观遗址》,《考古》1963年3期。

⑪北京市文物局管理处:《北京外城东周晚期陶井群》,《文物》1972年1期;《北京地区古瓦井》,《文物》1972年2期。

⑫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西晋王浚妻华芳墓清理简报》,《文物》1965年12期。

⑭、北京市文物局考古队:《建国以来北京市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⑯瓠燕:《试论燕下都城址的年代》,《考古》1988年7期。

⑰孙秀萍:《北京城区全新世埋藏河湖沟坑的分布及演变》,《北京史苑》第二辑,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⑱、⑲《水经·漯水注》。

⑳、㉑苏天钧:《试论北京古代都邑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古都研究》第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㉒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86、87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版。

㉓徐自强:《关于北京先秦史的几个问题》(下)《北京史论文集》第2辑,1982年版。

㉔葛英会:《燕国的部族及部族联合》,《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一集,1983年版。

㉕侯仁之:《论北京建城之始》,《北京社会科学》1990年3期。

㉖韩嘉谷:《燕史源流的考古学考察》,《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二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版。

㉗该专刊注明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供稿。

㉘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㉙《战国纵横家书》,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整理注释,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

㉚《史记·燕世家》与《史记·乐毅列传》。

㉛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下册第91至9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版。

㉜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下册第2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版。

㉝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上册192—19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版。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关于西周“蓟”国的思考

葛建军

早在 3000 多年前周武王克商以后,分封于北京地区有两个方国,一个是燕,一个是蓟。目前从考古资料证明,燕在周武王克商以前就已经存在,周武王克商以后,封召公于燕的始封地的位置也得到了解决。^①关于燕国的势力范围,通过考古资料的论证,它辐射于河北中部,北部和辽宁西南部的广大地区,燕国在这片广阔的区域里创造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②对其所创造的文化内涵,专家们冠之以“燕文化”统称之。“燕文化”在北京史研究领域内亦就成为西周至秦统一以前,这段历史时期物质与精神财富的代名词了。

关于蓟国情况,碍于种种条件的制约,研究工作很难展开。这表现在蓟国的始封地在什么位置?蓟国的主体民族是黄帝之后呢?还是帝尧之后?在 3000 多年前的西周时期,蓟与燕两个方国是如何共同生息在北京这片沃土上的?他们与周边部落有哪些联系?蓟与宗主国的关系如何;蓟国在“燕文化”范畴内所处的历史地位。目前学术界关于蓟城位置的研究主要有:

1. 蓟城城址最初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古城遗址,后因大石河不断泛滥,而迁到今北京外城西南部,大约在广安门白云观一带。^③该观点的主要依据是《韩非子·有度》篇记载的:“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以琉璃河地区发掘的情况分析,我们赞同董家林古城遗址应该定为“燕”为

宜。

2. 目前学术界多数学者倾向战国时期,蓟城位于广安门南 700 米,市政建设时在护城河西岸被铲平的三座山丘。依据是 1957 年《文物参考资料》发表的《北京广安门外发现战国和战国以前的遗迹》一文。^④

3. 认为东周蓟城遗址在京西八宝山一带,并在土龙岗、田顺庄地区发现有灰陶、红陶、鱼骨盆残片。^⑤

蓟是一个古老的名字,自商周时期出现,一直延续到五代的后唐。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学术界对蓟城的位置以东汉为时限,东汉以后的蓟城是新筑的,为后期蓟城。在北京城西南侧,道教建筑白云观之西发现的残城墙遗址为证,而且上至西晋,下至唐代,是相沿使用的。而对于东汉以前蓟城的位置研究,还有一定的分歧。近几年笔者参与了《北京简史陈列》、《北京历史文物陈列》的陈列大纲编写工作,都涉及到白浮西周木椁墓出土文物。白浮墓发掘于 1975 年,地点位于昌平区白浮村附近,所发掘的三座西周中期木椁墓。^⑥出土了铜、陶、石、玉、骨、牙器及卜甲、贝饰约 600 余件文物,其中一些文物“带有浓郁的北方草原文化因素”。^⑦在论证这三座墓葬的发掘意义时,考古学家认为:“3000 多年前北京一带就是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传播交流的枢纽,为研究周初燕国文化与中原文化以及北方文化三者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⑧

自1976年发表白浮西周墓发掘简报至今已有一二十年的时间,关于该墓葬主人国(族)属问题的讨论仍再继续。如:

1. 出土于“其”卜辞和“兀”兵器的昌平白浮墓,极有可能是蓟国遗址。执此观点的韩嘉谷先生,从战国和西汉帛书中考证了“兀”即“其”字。“其”在卜辞中有时被写成“𠄎”,应是土方之族的表示。从而得出白浮西周墓主人的国属为黄帝之后的蓟国。^⑩

2. 白浮西周墓“极有可能是周初被迫自蓟邑北徙的𠄎侯或𠄎国公族成员之墓”。^⑪这个观点所依据的是1867年芦沟桥地区出土的“𠄎侯亚矢”铜盃,推测该地区很可能是商末名臣箕子的封国“𠄎国”(或称蓟国)的都邑,并着重强调了白浮西周墓是以蓟邑向北迁徙的𠄎侯或𠄎国公族成员之墓。此时该文的作者却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芦沟桥所出“亚盃”铭文为“𠄎侯亚矢,匱(燕)侯易(锡)亚贝,乍(作)父辛宝𠄎葬”。(《缀遗斋彝器考释》14.27)盃铭文记述了商𠄎侯亚在周初曾受燕侯赏赐而作器的史实。𠄎族即受燕侯的赏赐,表明该部以委身于燕,成为燕属仆佣之族,故而笔者认为𠄎族无需避燕而北迁。

3. 据昌平白浮村墓主人分析,这样的国朝武将坐镇昌平一带,显示出现在北京地区等地已被燕国所有,曾被分封于此的蓟国可能已灭亡。^⑫这种观点认为该墓主人国(族)属召公奭之燕国。

如果说白浮墓主人是燕国武将,那么在琉璃河燕国墓地中还没有看到一例刻有“兀”“𠄎”相同的器皿,相似的字形是IM52出土“复尊”徽号右上方有竖式的“片”字。在1974年发表的发掘简报将这个徽号写成“𠄎”形。^⑬1995年出版的《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一书将其更正为一个整体作“□”形;而同墓葬出土的“复鼎”上的徽号作“□”形。^⑭M52号墓徽号与白浮墓“兀”字徽号之间究竟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其次,既然白浮墓主人,为燕国之周朝武将,而该墓出土文物中北方草原文化因

素与琉璃河诸西周墓葬出土的文物相比要浓郁的多。因此,我认为,通过白浮墓的发掘,去推测蓟为燕国所灭,白浮墓主人的族属为燕,尚有缺乏说服力之嫌。在学术界对白浮墓的考证,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在展览中如何展现这些文物,运用这些文物较为客观地反映这一时期的历史,我认为最基本的途径是熟悉了解白浮墓整体文物内涵。为此,笔者将自己对该墓葬的一点想法表述如下:

笔者曾数次拜读白浮墓发掘简报,其中“白浮村北约6公里的小北邵村就有相当丰富的商周遗址”字样多次映入眼帘,工作之余查寻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没有看到更多的文献与考古资料,可知这条信息直至目前为止,尚未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对该区域进行科学的勘查。在思索这个问题时笔者联想到已发掘的琉璃河西周遗址,以墓地、城址、居住遗址相隔不远,错落有致的分布中得到启示,如果小北邵村确实有相当丰富的商周文化遗存,可以斗胆猜测小北邵遗址,或许是一片和琉璃河西周遗址相似,与白浮三座木椁墓遥相呼应的文化遗存。从白浮地望分析,与北邵相对应的是南邵村,这一区域曾出土过西周、战国、汉代文物。如:北邵村西约3公里的松园村,50年代曾发掘了三座战国时期的墓葬,出土了器型硕大的仿铜陶礼器。^⑮如果在白浮以北的十余公里范围内确实有着“相当丰富”文化遗存,而这些遗存又与白浮、松园等有着时代的延续性,对于我们认识白浮西周墓葬文化内涵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这种猜疑还有待于考古发掘来证实,不过从已经发掘的白浮、松园二处墓葬中出土的文物看,均能反映出墓主人,绝非一般平民阶层。尤其是松园战国墓大型陶制礼器的出土,表明这种崇尚礼器陪葬之俗在这一地区的遗存,必然有着一种承袭的社会因素。

燕与蓟同时为周武王灭商后采用“封邦建国,以藩屏国”的统治政策的产物。按当时环境论,燕、蓟二国同时被封于边远的

北方地区,表明该地区地理环境处于周王室镇抚边鄙的重要地区。因此,燕、蓟二国在这一地区共同肩负着屏周安邦的重任。燕与周室同姓姬氏,为周之支族,黄帝之后中的大姓也是姬氏,均符合封周之同姓部落的条件。所不同的是,燕、蓟与周王朝的族属上有着质的不同,必然会导致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这表现在姬姓燕国新贵,除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商文化外,势必在自己受封的疆域内推行宗周的统治政策与文化,并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适合于燕区域内的霸主式统治模式。与北方及当地土著文化的吸收、融合不仅需要一定的历史过程,同时取舍的程度也有别于蓟。这一点通过对已经发掘的琉璃河燕国贵族墓地所出土的文物组合等方面的情况可以得到佐证。相反,位居于华北地区的黄帝之后,在生活习俗诸方面与周原文化模式不同,因此,受当地土著及近邻的北方诸部(族)文化的影响与燕国新贵相比要深的多,在承袭中原文化同时,吸收北方和当地土著文化较广泛,并有条件能使其融合于一体。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分析白浮三座西周墓葬中出土的不同地域风格的文物,或许能够使我们想像出 3000 多年前北京地区中原、北方与当地土著三种文化相互碰撞时所迸发的文明之火是那样灿烂、明亮。

经过对上述各家之说的思考,和对白浮墓中出土的 600 余件文物组合情况及有关史料辨析,我倾向第一种观点即白浮西周墓主人之国(族)属为周初武王所封黄帝之后的蓟。当然探寻蓟文化内涵的突破点,还将依赖于地下考古工作。

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能够反映西周时期文化交融历史面貌的文化遗存,应首推昌平白浮发现的三座西周中期墓,从宏观上分析,墓的形制,葬俗,600 余件文物有与中原地区西周墓相同的地方。还出土有与北方草原文化相似的兵器;同时亦有介乎于二者之间的文物,如:二号墓出土了一批兵器,其中编号 31Ⅵ 式戈,编号 36Ⅲ 式戈、编号 37Ⅳ 式戈等,均与 1931 年 6 月

在河南浚县出土的卫国兵器相似。^⑩3 号墓出土编号 22Ⅱ 式、Ⅲ 式铜短剑与河北北部青龙抄道沟、^⑪山西保德林遮峪^⑫等地出土的青铜短剑相似。这些兵器有马头或鹰首状的剑首,有别于中原地区出土的西周时期兵器,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因此,有的学者将白浮墓出土的 I 式(2:7)、Ⅱ 式(3:22)、Ⅲ 式(3:22)等兵器列为鄂尔多斯式。^⑬二号墓出土的铜胄,左右两侧向下延伸,形成护耳,胄的顶部有网状形长脊,脊中部有可以系纆的环孔。这种造型的铜胄,中原、内蒙和辽宁地区商、周墓葬遗址中没有发现相似的铜胄出土。唯有 3 号墓出土的铜胄,顶部系纆的圆钮与 1958 年辽宁锦西乌金塔东周墓及赤峰等地出土的铜胄相似。由此看来,白浮 2 号墓出土铜胄,其形式可谓是一孤例,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 上述我们列举了白浮墓葬遗址中所反映的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因素外,哪些属于北京地区特征的文化呢? 我认为,白浮三座墓葬文化遗存,整体是反映北京地区的文化特征,即交流——融合——升华的一个缩影。2 号墓出土的铜胄,就是这种互为作用的具体产物。前文已经提及到北京是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交流的枢纽地带,交流成为这一地区的特点,也是中原与草原文化相互碰撞之花的结果之地。正是由于北京地理位置的特殊属性所决定,交流、融合、升华方式贯穿北京史全过程,只不过是因时代的差异,每个时期所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经过交流、融合后的蓟国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本身原有的特征,可能会不那么鲜明了,伴随而来的是与当地土著形成较为密切的结合。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研究昌平白浮西周墓葬中出土的文物可能会不难理解墓葬中出土的文物分别与中原文化,北方草原文化那样相似,基于这种思考,在《北京历史文物陈列》中我将白浮墓主要文物作为一个整体陈列。在陈列的顺序上,兵器摆放在前排,车马器等摆放在后排,兵器的两侧分别是玉器和卜甲,展柜的左角用较突出的位置展示了铜胄。这种陈列方式即保持了

主体文化的完整,同时也刻意反映二种文化交融升华的特殊属性。又可与旁边琉璃河出土的青铜器群作一比较。

究竟是什么因素,使蓟国在北方的土地上消失呢?从社会演进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西周时期北京地区社会状况分析,蓟之衰落或消亡必与战争有关。问题的关键是与蓟国交战的对象是谁?我们从各地发现的货币中,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1978年北京市延庆县香营公社辛庄堡出土1000余枚战国初期尖首刀,其中带有“兀”字铭文数枚。^②在此之前河北中部、东部、辽宁西南部等地区也曾发现过“兀”铭文的尖首刀出土。^③这表现“兀”字铭文的尖首刀有着较广的流通区域。关于“兀”字含义,在货币学领域中,多数人认为是地名,其地域位于今山西省太谷东南。尖首刀上发现的“兀”字与白浮墓出土铜戟上的铭文相似,区别于两者界限只是时代不同而已。恰巧白浮墓反映了蓟对北方文化的吸收主要表现在铜兵器上,而刀型货币的出现源于北方民族常常使用的铜削刀。由此推测带有“兀”字铭文的刀币可能是西周蓟之后裔所铸。从出土尖首刀地域分析蓟有可能在西周末期某一方外来势力的对峙过程中,弃本土而迁徙它地,随着社会的演进,最终淹没于社会变革的潮流中,成为北京地区乃至占更广阔地区霸主之臣民。

①齐心《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科研系列丛书·序》。《燕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第1页。

②陈光《燕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燕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第6页。

③王灿炽《北京建都始于公元前1057年》。《燕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第145页。

④赵正之、舒文思《北京广安门外发掘战国和战国以前的遗迹》。《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7期。

⑤关续文《东周蓟城遗址踏勘记》。《北京文博》1996年第2期第80页。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版第261页第二节《西周时期》文中从出土文物的器型方面研究得出:“这些墓葬大致是西周中期的”。本文从此说。

⑦宿白《在北京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北京文物与考古》第4辑第9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

⑧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考古》1976年第4期第246页。

⑨韩嘉谷《燕史源流的考古学考察》。《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二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页。

⑩陈平《“先燕文化”与“周初燕文化”议》。《北京文博》1995年第1期第46页。

⑪徐自强《关于北京先秦史的几个问题》。《燕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20页。

⑫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考古》1974年第5期第309页。

⑬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7月版。

⑭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昌平松园村战国墓葬纪略》。《文物》1959年第9期。

⑮李学勤《论澳澳收藏的几件商周文物》。文物出版社《新出青铜器研究》1990年6月版第314页,第53页。

⑯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青龙抄道沟发现一批青铜器》。《考古》1962年第12期。

⑰吴振禄《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考古》1972年第4期。

⑱田广金、郭素新编著《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12页。

⑲高桂云、张先得《北京市出土战国燕币简述》。《中国钱币论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9月第一版第142页。

⑳朱活《匱币管窥》。《古钱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6月版第142页。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馆员)

[编者按]

博物馆一词最早源于西方,我国虽然早在商周时代,就有专官保藏国家典策、庙堂重器,但称得上现代意义的博物馆,则始于清末,而且是首先由外国人创办的。如法国人1868年创办的上海震旦博物院、1874年英国人在上海筹建的亚洲文会博物院等。而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1905年才正式出现,它是由实业家张謇出资创办。1912年,在北京国子监筹设历史博物馆,这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第一个国立博物馆。1949年新中国成立,博物馆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国立、省立博物馆纷纷成立,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私人博物馆则归于消失。可是我们纵观世界及我国的博物馆发展历史,私立博物馆与国立博物馆,从来都是并行不悖、互相补充的。随着改革开放深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生活的需求也不断提高,私立博物馆应运而生。1996年,北京市首批四家私立博物馆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正式成立了。一时,首都的各大新闻媒体,竞相报道,热闹了一阵。冷静下来一想,许多工作还没有做细,博物馆管理法规对私立博物馆的管理还存在空白;与相关的法规如何协调配套、确定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的思索,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为此,我们特开辟此栏目,邀请政府主管部门的代表、专家和四家私立博物馆之一的“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馆长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对私立博物馆从理论到实践中碰到的问题进行总结探讨,以期对此开展讨论,促进私立博物馆的健康发展。

关于北京市

民办博物馆

申办成立的

经过及相关

问题的思考

● 刘超英

在1996年10月31日北京市文物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单霁翔局长对社会宣布了北京市批准四家民办博物馆筹建资格的消息,北京市的几家主要宣传媒体均发了消息。随即,国内外的各种宣传机构纷纷予以报道,电台、电视台多次作了专题或专访节目。一时间,“民办博物馆”成了舆论与公众关注的热点。作为此项工作的主管部门,我们深知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将受到世人瞩目,但感受到如此强烈的冲击,却是始料不及的。消息发布不久,最多的一天,博物馆处竟接待各路记者电话来访及当面访谈近二十余人次。国外有些舆论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大陆文物、博物馆方面的政策将会有大的变化”,“中国大陆将会进一步开放文物市场,批准建立私人博物馆就是一个信号,”国内各省市的同行也纷纷来电来函询问有关事宜,垂询申办民办博物馆手续的公民也不时前往,更有热心的市民打电话来,或鼓励,或咨询,或建议,或提醒。总之,民办博物馆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受到了公众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时至

今日已半年有余,仍余热未熄。笔者在博物馆处工作多年,自始至终参与了民办博物馆兴办、审批等一系列工作,在此把近年来此项工作开展的有关情况作一简要回顾。

一、民办博物馆的兴起与 《北京市博物馆登记暂行办法》 的颁布实施

众所周知,建国以来由于政策与体制的原因,博物馆作为文化事业单位统由政府拨款兴建,指派人员管理,馆舍、藏品都是国有财产。因此,博物馆无一例外都是国有性质,或称之为“公立”。而“私立”、“私有”一类的概念,在国人的观念中,似乎都与“私利”有关,人们羞于谈“私”,博物馆体制亦不例外。而在世界各地,各种门类的私人博物馆散见于城市、乡村,与公立的国家博物馆互为补充,成为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而在我国,直至1989年,私人所属的博物馆还是空白。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温饱之余,各类民间收藏活动开始活跃,一些民间收藏爱好者出于交换收藏品及与藏友互相鉴赏的需要,开始产生建立博物馆的动机。因此至90年代初,上海、成都、哈尔滨、苏州等城市的一些收藏爱好者,相继宣布成立私人博物馆。其中以号称“神州收藏半壁江山”的上海市宣告成立的私人博物馆数量最多,门类也很丰富。如蝴蝶、算盘、戏装、钟表、海洋生物标本等博物馆在全国收藏界有较大的影响。这些博物馆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未经过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收藏者通过新闻媒介发个消息,挂牌即宣告成立。二是博物馆都建于收藏者的居室中,展厅居室合为一体,藏友之间往来把玩鉴赏尚能容纳,而作为博物馆显然不具备基本的开放接待条件,不能满足观众参观的需求。三是受收藏者本人的研究能力、学术水平以及收藏品的质量数量所限,难以给观众以完整、准确的知识,博物馆固有的教育功能不能充分实现。四是开放时间受收藏者的时间限制,或关或开,几无定时,显然不符合博物馆作为开放

单位的性质。因此,这种自封的“私人博物馆”,定名为“私人收藏陈列室”似更为确切。因为它们不具备博物馆必需的基本条件,所谓的“宣告成立”,也只是收藏爱好者自发的行为,博物馆处于自生自灭,无主管理状态,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行为。因此,由著名书画大师黄胄先生创办的民办公助性质的炎黄艺术馆从一开始兴建,就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一方面与黄胄先生的社会影响力有关,另一方面在京城首次出现非公立性的博物馆,意义非同寻常。“民办公助”的性质,决定了炎黄艺术馆与公立的博物馆既有相同处,又有不同点。说它民办,是由于该馆是由黄胄先生倾其大半生积蓄及全部作品和收藏品兴办,说它公助,是由于为了建馆,各级政府在用地、馆舍建筑等方面予以了政策及资金方面的援助。这所既不是完全“私立”、又有别于“公立”的艺术馆的兴办,从一开始,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同,得到了政府及海外的资金支援,但如何解决该馆的法人资格,如何管理该馆的藏品,应按什么模式进行管理,等等一系列问题摆在了眼前。鉴于炎黄艺术馆的先例,作为全市博物馆的行业主管部门,我们开始考虑拟定有关博物馆管理的地方性法规,初衷就是想解决类似炎黄艺术馆这样无上级主管单位的博物馆的法人资格问题。经过多次研讨,最后达成共识,是首先以法规形式确定博物馆的开放资格,再通过国家已颁布的其它有关文物博物馆方面的政策、法规对博物馆进行管理。因此,明确了要拟定的法规暂不涉及博物馆的管理问题,只解决资格问题。这样,由我局拟定的《北京市博物馆登记暂行办法》于1992年上报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公室,于1993年11月13日经市政府批准,12月25日由市文物局以市政府令的形式发布实施。这项法规的颁布实施是全国第一份关于博物馆资格认定的地方性法规,也是迄今为止,全国唯一的一份。

现在看来,《北京市博物馆登记暂行办法》内容过于简单,有些条款滞后,但它的颁布实施,无疑为行政主管部门审定博物馆的从业资格提供了法律依据,使博物馆

资格认定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1996年北京市首次批准四家民办博物馆的筹建资格,就是依据此规定审核批准的。这是我国首次经国家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批准的非公有性质的博物馆,此后,民办博物馆的活动已不再是收藏爱好者的个人行为,自批准之日起,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将关注博物馆的一切活动。其生存与发展状况与国家的文化事业有了某种特殊的联系。一方面民办博物馆,使私人的收藏行为转化成为社会行为,受到政府和公众的关注,纳入政府的管理范畴和舆论的监督之下,它要以开放的文化单位的资格接受政府管理,同时服务于社会。另一方面,民办博物馆又不同于公立博物馆在人、财、物及办馆方式方面由国家统管,相反国家对其不以任何财力、物力方面的支持,其生存方式由办馆者自行决定,减少了行政干预,给民办博物馆利用本馆特点谋求生存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民办博物馆的申办与审核批准

《北京市博物馆登记暂行办法》于1993年11月13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我局即组成了11人的北京市博物馆资格评审委员会,开始对全市已开放的博物馆依法进行资格认定工作,先后分二批审批确定了73所博物馆的资格,并颁发了北京市博物馆登记证书。在此期间,陆续有十余位公民个人提出了开办博物馆的申请,包括火花、书画、瓷器、家具、碑帖、异形瓶等,藏品十分丰富。经过审慎考虑,在我局初审的基础上,组织北京市博物馆资格评审委员会的成员对申办馆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其收藏历史、藏品来源、藏品价值、馆舍情况、申办者本人的学术研究能力等,经过综合考评,委员会讨论提名,报请局办公会批准,首次批准了“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古陶文明博物馆”、“遗箴堂金石碑帖博物馆”及“何扬、吴茜现代绘画艺术馆”四家民办博物馆的筹建资格。

这四家民办博物馆被批准筹办,主要基于:1. 拥有一定数量及价值的收藏品,收

藏品基本已形成一专题或一系列;2. 拥有相对固定,一定面积的馆舍建筑;3. 申办者本人具备相应的研究鉴赏能力(四家之中,有三位收藏者出版有关于其收藏品的专著);4. 能遵照《北京市博物馆登记暂行办法》的规定,常年对公众开放。筹建时间以一年为期限,届时不能完成筹建任务,将被取消其办馆资格。

由于民办博物馆是一个新生事物,不仅给我们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对相关委、办、局亦如此。本市四家民办博物馆的筹建资格经我局批准后,由谁来认定其法人资格即成了当务之急。不取得法人资格,只有博物馆的筹建资格,就无法在社会上开展活动。但当时,我市任何一个行政机关都没有办理过类似的公务,一时也不知从何处入手来办理。一方面是刚取得筹建资格的博物馆急于取得法人地位,开户建帐,以便资金往来,筹备开馆事宜;一方面是有关的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此手续时无先例可循,这是本市民办博物馆遇到的第一个难题。经过我局多次与民政局、人事局、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等单位研究磋商,最终确定的审批程序为:由我局依照《北京市博物馆登记暂行办法》审核批准民办博物馆的筹建及开放资格,由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依照民办事业法人资格的有关规定批准其法人资格。其它方面,民办博物馆与其它开放单位一样接受社会管理。此后,取得了法人地位的民办博物馆在办理经营执照,争取馆舍修缮资金,筹备开放事宜等方面也遇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有些问题,经过我局的努力,已经得到解决,有些问题的处理方式我局正在与其它委、办、局协商研究之中。

三、对民办博物馆管理的几点意见

民办博物馆的建立,是我国博物馆体制的重大变革。如同民营经济对国有经济所作的补充一样,民办博物馆必将成为我国博物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有些博物馆界的老前辈所言:“民办博物馆极有可能成为中国博物馆的另一根支柱,它将

与公立博物馆共同撑起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大厦”。民办博物馆的建立,一改过去我国自上而下,由政府命题、投资一手包办的单一办馆模式,代之以由公民个人收藏行为转到面向社会办馆的社会行为。其办馆方式,可由公民个人出资兴办,亦可由企业兴办,还可实行股份制,或多方联办。总之办馆方式灵活多样,为我国博物馆事业开辟了新的发展途径。民办博物馆的出现,客观上,与公立博物馆形成了竞争的局面,尤其对公立中、小型博物馆的压力将不言而喻。民办博物馆优势其一,在于藏品种类丰富,建成小型、专题、多样化的馆,可与公立博物馆互为补充,同时因其源自民间,无形中缩短了博物馆与公众的距离。散见于街巷中的民办博物馆,易于使观众与其展品产生共鸣。其二,民办博物馆不需要国家投资。在目前国家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大环境下,大多数博物馆正在由计划经济体制下靠国家拨款生存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谋发展转轨,固有的思维方式及习惯的生存方式困扰着博物馆工作人员,影响了博物馆的发展。而民办博物馆从开始申办、筹建开馆直至以后的生存发展,统由办馆者自筹资金解决,减轻了国家用于文化事业方面的投资负担。但民办博物馆的出现,决不意味着它将一路顺风地向前发展。相反,它所面临许多问题,给我们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因此尽快找准民办博物馆生存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确定管理方式及方向,加强对民办博物馆的管理,已成为当务之急。

我认为民办博物馆目前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1. 目前我国在博物馆管理方面的法规明显空缺,各项政策亟待制定,博物馆的发展没有强有力的政策支持。2. 生存和发展的资金来源不固定。3. 藏品征集受现行法规限制,来源渠道单一。4. 由于是个人办馆,受资金和专业限制,民办博物馆的科研力量明显不足,而科研水平低

造成发展缺乏后劲。5. 由于馆舍变动,如租借期已到或是属危改迁用房等原因,造成博物馆不能坚持常年开放。

对此,我以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解决:

1. 要抓紧立法。法律规章是我们实施管理的依据和保障。民办博物馆的兴办在某种意义上讲,促进了博物馆的法规建设,而法规的拟定、颁布,反过来又为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北京市博物馆登记暂行办法》的颁布实施,即是一例。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考虑到目前国家还未有制定博物馆管理方面法律规章的计划,因此,我们一要抓紧研究、制定新的地方性法规。二要对现行的法律规章进行修订。

2. 要切实加强管理。要本着积极扶持、慎重审批的原则,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在宏观管理上,与对公立博物馆的管理应有所区别,在馆舍建筑面积、展览开放时间、办馆融资方式等方面可适度放宽。而在藏品的征集、保管、使用方面,在展览内容及出版物内容的审定方面,应严格送审、报批制度,并通过年检、抽查等方式进行经常性的检查督促,以确保民办博物馆坚持正确的办馆方向,健康地向前发展。

今后,我们应鼓励各种体制的博物馆兴办,无论是民办公助式,还是公民自办,或是企业兴办,还是中外合资兴办,都应予以支持。只要其藏品管理有序,展览内容健康向上,没有违法经营活动,对于我国的博物馆事业就是重要的补充。对于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就是一种贡献。关键在于我们各级行政主管部门要积极努力,抓住管理这一环,通过我们的工作,使现有法规更趋于完善,管理更趋于合理,各项政策法规应更有利于博物馆的兴建和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博物馆事业百花齐放的局面即将到来,中国博物馆事业大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

(作者为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副处长)

支 持

私人博物馆的

建 设

● 胡 骏

北京市文物局批准筹建四家私人博物馆以来,国内外传媒进行了大量的多角度的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重大的反响,一时成为引人注目的话题。应该说,批准筹建私人博物馆,这是北京市挖掘博物馆资源、加速发展首都博物馆事业的一项重要决策。这次批准的数量虽然微不足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预见,它对首都以至全国的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将具有深刻的影响。其深远意义,也将越来越为人们所认知。因为,私人博物馆可能会成为未来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中一支富有生命力的生力军,它将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私人博物馆是国家博物馆 的补充和延伸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一个正在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国家,无疑的应该大力发展博物馆事业。

我国现有的博物馆,无论是从规模、种类,还是从数量上,都同我们这个历史悠

久、幅员辽阔的大国很不相称,因此采取积极的态度,加强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建设是非常必要的。胡乔木同志生前也说过:“中国的文物、考古事业是第一流的,但是博物馆就整体来讲还很低”,“中国博物馆事业逐步需要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中央的重要指示和乔木同志的精辟论断,并没有因为这些年来中国博物馆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而失去了意义,它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我们应该经常记住:要做到我国博物馆事业在“规模”、“种类”、“数量”上与“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大国”实现“相称”,需要经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艰巨历程。中国博物馆事业要逐步改变“数量较小、种类较少、水平较低”的局面,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

但是,在博物馆事业发展中经常会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特别是资金的困难。建国以来,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中国博物馆的数量从 21 所发展到目前的 1600 余所,国家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仅就资金而言,以最近落成开放的上海博物馆新馆为例,即花了 5.7 个亿,正在建设并争取今年开放的河南省博物馆新馆,估计也将在 3 个亿左右。这是大馆。而中小型馆的兴建,一般也少则需要上千万元、多则几千万以至上百亿元。这些仅仅是馆舍和内部设施,如果算上文物,那就“无法估量了,而且博物馆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全国现有博物馆,国家每年要投入数以亿计的“人头费”、“业务费”。诚然,我们国家不会因经济建设而牺牲包括博物馆在内的文化建设,但是,国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为了发展博物馆为之作出的巨大的投入,也不能不说是个“负担”。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的比例,必然会对博物馆的发展作出无可奈何的制约。

北京市批准筹建私人博物馆,为减轻国家负担,发挥公众积极性,加速首都以至影响全国博物馆的发展打开了一个广阔的通道。这是从资金角度来讲,私人博物馆不要国家一分钱,一切的一切都由办馆者自己去完成,而办成一个馆,就是为首都、为

全国增添了一处文化设施,这对国家是件多么好的事呀!另外,私人办博物馆,潜力十分巨大。国泰民安,民间收藏家必然越来越多,收藏品越来越广、越来越精,有些收藏品在国家博物馆也属罕见,甚至空白。这些民间收藏很可能成为博物馆的后备军,国家要加快博物馆建设,吸引大量私人博物馆加盟,则是投入少、见效快的一项两全其美的捷径。发达国家博物馆之所以数量大、发展快,种类多,很大程度得益于私人博物馆,包括基金支持建立的博物馆,当然国外的体制也与国内不同。如果北京市这个决策能影响全国、推动全国,那么我国博物馆必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那时中国博物馆事业就在数量上取得了飞跃、在种类上填补一个一个的空白,那么也就到了根本改变面貌的时候了。

国家应该大力支持私人博物馆

国家支持私人博物馆,首先是政策上的支持。到目前为止,国家的有关政策、法令、条例还没有明确国家支持私人博物馆的建设。上海在八十年代早已有了私人自己打出“博物馆”牌子或外国传媒封给的“博物馆”牌子的民间收藏陈列,如蝴蝶、算盘、钟表、火花等。许多这样的“博物馆”到现在还在开展着有效的活动,但国家并未明文加以承认。北京市这次批准首批私人博物馆的筹建,无疑的已在政策上体现了对私人博物馆建设的支持,而且据了解在《北京市博物馆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中也专门写了一章“私人博物馆”。我们期望北京市在适当时机出台一个办法,更期望国家在适当时机出台一个办法,来规范和指导私人博物馆,使之健康地发展。

其次,对私人博物馆的批准筹建,以至建成后的管理,似应采取适度从宽的原则。适度从宽,当然不等于不管。笔者认为,从粗线条看,要抓住以下三条:

一、要求私人博物馆基本符合博物馆应具有的性质、任务和职能(即使是低标准的)。也就是说,办博物馆就是要按博物馆

的要求去办,不能办成近似娱乐场所、商店那样的机构,必须办成社会文化教育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不等于不讲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同步)。

二、陈列、展览要由适当一级的文化文物部门审查,不能误导观众。必须保证陈列品所传递信息的确实,不产生政治上的错误,没有不健康的展品等。

三、文物的征集,严格按照现行法令通过合法渠道取得。不得逾越国家规定,打着“博物馆”的名义实际为个人非法收集文物。

第三,要关心私人博物馆的巩固、发展和成长。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对待私人博物馆,应该与对待国家博物馆“相同”。国家可以做到的有:对私人博物馆的人员培训,业务工作的指导,与国家博物馆一起进行工作经验交流与学术活动,安全保卫工作的指导,藏品的鉴定等。如果国家在税收等方面对博物馆有优惠的话,那么对私人博物馆与国家博物馆应该一视同仁。

“私人博物馆要走好”

这是引用北京电视台一个专题节目的题目。私人博物馆发展既然有光明的前景,但当前毕竟是个新生事物。筹建固然举步维艰,垮台却可能很容易。因之,国家既然需要真心实意的予以支持和关心,也要求私人博物馆好自为之,走好自己的路。

许多私人办博物馆的初衷是很感人的。有的说:“是为了变个人之宝为社会共有之物”;有的说:“要用自己的藏品,丰富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有的说:“以弘扬民族文化、展现中华古老文明为宗旨”;有的说:“为了对青少年以至老年人提供一个静心养智、启迪思维的窗口”。这些办馆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是极为可贵的,也是这些办馆者的精神支柱。但是,应该看到,私人博物馆建成后的道路,也可能是曲折的,它们可能会碰到资金拮据的问题,观众冷清的问题,以及事先想不到的种种问题,这时候就希望他们能以顽强的精神,努力克服

困难,主动争取国家有关部门帮助,不改初衷,把这件“善举”坚持下去,真正做到为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私人博物馆”的提法尚可研究。如可否称为“私有博物馆”或“私立博物馆”等。可在今后正式法令中正名。

(作者为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

私立博物馆的

梦想与实践

● 马未都

开办博物馆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一直是官方的事情,私人的收藏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说成“玩物丧志”,不少收藏前辈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将自己或长辈的毕生收藏随便处理了事,从不敢在人前提及,现在忆起,扼腕叹息。私人的收藏,与国家的收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早在宋朝,官方就已经大力提倡文物的收藏与研究,并有多部专著问世,现在看来,许多地方仍有借鉴之处。这种全国范围的收藏热自宋朝起,大约有三次。其标志是,大量研究专著问世;做伪、仿古成风;私人以收藏品显示身份和地位。除北宋外,清乾隆时期、清末同光中兴至民国初年,这三次遍及全国上下的收藏热,大大增强了研究文物的深度,把人类的收藏行为由早期的单纯聚财进化为认知历史,强调身份的社会活动。

很久以来,私人收藏做为个人行为强调秘不示人。中国人讲究秘玩,藏品多了,起个堂号,最多唤三五知己,闭门把玩研究。这种单纯的自娱自乐的收藏行为,不具备社会公开性,因而使许多收藏研究成果被淹没,十分可惜。前辈收藏家中,有许多大家,不仅收藏富甲一方,而且知识渊博,

成就非凡。但社会没有给他们一个办博物馆的条件,由它自生自灭,最好的结局就是捐献国家,能辟出一个单独展室,做长年展出。

愿望与设想

比起前辈收藏家,我们这一代人的收藏微不足道,原因不单单是历经百多年前辈的搜罗,西方的掠夺,更重要的是我们本身没有什么经济能力。这种量力而行的收藏本身是业余生活的一种精神补充。好在这种生不逢时又可以说是生正逢时,十年动乱对文化的破坏,使得绝大多数人厌恶这些历史旧物,直至八十年代中期,文物在中国大陆还是没有经济地位,几元钱就可以买到很不错的文物,这在任何朝代,任何地方都是不可想象的。我就花五元钱买过完整的清代官窑碗。我买了这件文物高兴,卖主比我还高兴,这件东西可算变成钱了。这就是八十年代对待文物的一般心态。我的很多藏品就是那个时候收藏的,我的藏品日益渐多,就想有个机会向社会展示一下,这个想法就是创办私立博物馆的原始动机。每当我拿出一件藏品向朋友炫耀的时候,心里的满足感给了我说不出的愉悦。1992年,我向北京市文物局打过报告,表示愿意成立一家私立博物馆。当时文物局给我的答复是认真的,提出了一些可能存在的问题,这件事就搁浅了。实际上,当时不仅社会条件不成熟,就我个人的条件也不成熟,如勉强上马,很可能会迅速落马。

把个人的收藏推向社会展示,由秘不示人到公开展览,这是一个进步,这个进步需要社会与个人共同完成,光靠勇气是不够的,还要有社会环境。

建立一家纯粹意义的私立博物馆,表明该馆运营机制中不要国家一分钱的行政拨款,完全靠自己给自己输血,让它具备正常运营能力,能接待观众,能按时开放。经过长时期的考虑与调查,创办一家私立博物馆理论上可以,实际上能不能行就要看实践了。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处境和能



力,因而把私立博物馆的办馆宗旨定为:小型化,亲切化。“小型化”是生存的前提,我们必须量力而行,决不可能象公办博物馆那样贪大,大而不当,会导致全军覆没;“亲切化”是生存的条件,由于体制的缘故,我们许多博物馆常常会怠慢观众,比如没有灯光,下馆太早,没有一般性的服务,对观众冷漠,工作人员仅成了看守,久而久之,使得观众对博物馆有一个冷冰冰的印象,百年不遇地去一回,也是快进快出。许多省级大馆要么门可罗雀,要么出租招商,使得博物馆这么神圣的地方变得不伦不类,文化商业两不靠。鉴于此,我们在办馆初期就定下调子,唱好唱坏不是愿望问题,而是能力问题了。

设计与实施

把设想付诸行动,要有一个过程。首先是选址,在国人的眼中,商业区与生活区是分开的,尤其在北方,有钱有势的人一定不住在商业区附近。中国的封建社会大部分时期都商住分开,作为文化场所的博物馆,历来远离商业区,无论是国家博物馆,还是地方博物馆无一例外地选址“高雅”,不与

商业区为伍。这就使国人把参观博物馆变成一种奢侈的行为,很多人都是陪亲戚朋友才进博物馆,原因很多,但地址是最主要的原因。

邻国日本常把非常重要的文物大展放在百货公司举办。西武、崇光、大丸、三越等著名的百货公司都以办文物展为荣,这不仅提高商场的文化品味,更重要的是方便观众,在购物的闲暇,顺便参观文物展,潜移默化,非常重要,这也是日本人喜欢收藏的重要社会因素。

一个机会,促使我们在选址问题上下了决心,琉璃厂西街53号,原中华书局的旧址愿意出租,我们考察了一下,觉得有几点好处:一、地处古老的文化街,该街形成三百余年,名声大,凡是想参观的人不费力气就能找到;二、该建筑为三层小楼,总面积400多平方米,可以分区域布置,发挥想象,符合“小型化、亲切化”的办馆宗旨;三、价格适中。这些条件促使我们下了决心,从1996年1月接手53号,并开始设计装修,在当年10月已基本准备就绪,并申报北京市文物局,于10月30日获准创办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

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是以弘扬民族文

化精神为己任,侧重中国文物中的陶瓷、古典家具和文玩。我们考虑,博物馆规模小就不宜求全,所以馆藏文物以陶瓷和古典家具为主,兼顾其它。但展览不限于此。凡是能展现中国文化之精华的艺术品,本馆都可以展出。这是一个原则,虽为私立博物馆,也不以个人好恶排斥其它。博物馆是永久性的,但展览是临时性,经常换展,让观众常看常新,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自1997年1月18日开馆以来,每三个月换一个展览。开馆的头一年安排的五个展览是《明末清初青花瓷器展》(展毕)、《中国古代文具展》(展出中)、《中国古代门窗展》(展出中)、《明清箱匣展》(将展)、《元代瓷器展》(将展)。对此,博物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比如,已经展出的展览都在中保公司财险公司投了保,这也是建国以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首次为艺术品正式投保。又比如,在博物馆的灯光设计中,有感于国家博物馆大部分灯光昏暗,不便参观,我们对灯光的要求较高。第一次装修好的灯光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隐患较多,我们又下决心将灯光全部改造,再次投了一笔资金,使灯光效果大为改观。考虑到参观博物馆的观众休息,我们特意设计了休息处,非常舒适的藤椅,观众可以坐下品茗,并享受博物馆具有浓郁文化气息的空间。

一个困扰我们的问题是参观券的票价。我们最终定为每券20元。理由有三:一、让观众习惯尊重文化。凡是发达国家参观博物馆都比看电影贵(免费除外),而我们目前电影票价是30~40元一张。如果票价太低,任何人对文化的尊重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流失,票价略高一些也是避免闲杂人员,让参观者有一个良好的参观环境;二、本博物馆实行一票到底,凡购票参观者,存衣、存包、照像、讲解、休息、饮茶等

一系列服务都不再收费;三、本博物馆门票的质量是建国以来任何博物馆都不曾达到印制水准,成本极高,正面六色印刷,起凸、复亚光膜,并打出00001—10000的序号,观众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以优先原则选号。为使参观票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第二个一万张就会改版,重新设计印制。我们希望10年20年以后,凡能集齐全套门票者,应该是一笔财富。头一个月就有1000多人购票参观,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经营与管理

很多记者都问我为什么办一座私立博物馆,有什么图求。我就打个比喻,办博物馆就象办一所希望小学。办学是不图报的,无法赚钱。办博物馆也是如此。我清楚地知道,全世界办博物馆都没有赚钱的。原因很



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内景

简单,博物馆是公益性事业。尽管这样,我仍希望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能够收支平衡,短期不行,长期行不行?博物馆的收入无非是几块:门票收入;纪念品收入;其它服务收入;社会赞助。我参观过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该博物馆的纪念品部的生意之好,不能想象。纪念品格调之高,品质之高,使人爱不释手。由此我想,若能提高我们博物馆的纪念品的品味,也不失一个生财之道。博物馆将来能否开展鉴定业务,提供裱画、加工锦盒、修复文物等等服务,总之,开动脑筋,积极争取,肯定会增加收入。

由于我本人没有管理经验,博物馆的管理的确是一个大问题。首先针对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不熟悉业务,我们写了一份近万字的解说词,发给所有的工作人员,使他们对展品有一定了解,并定期考试。通过一段观察,许多工作人员渐渐熟悉了解说业务。其次,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普遍年轻,有热情,但缺乏耐性,我没有办法让年轻的工作人员象我年轻的时候那样对文物有着痴迷的热情,但可以以一种精神感化他们,以严谨的制度要求他们,使博物馆除了庄重,还要有朝气的温情。

问题与担心

对于博物馆,老百姓一般敬而远之,过去偶尔进博物馆也常常是组织去的。完全自发地经常地参观博物馆的人总是少数,因而博物馆常处于萧条之中。如果停止国家行政拨款,任何一家国立博物馆几乎都不可能生存。这一点似乎不存争议。于是,老百姓就将私立博物馆视为资金极为雄厚的个人奢侈之举,而误解其中的公益行为。与此相关的个人或单位,也会把私立博物馆当做随时可以索取的大户。这就从客观上给私立博物馆造成困难。

政府机构给了私立博物馆相当的支持和肯定。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卫视中文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单位为此做了多次报道,国家文物局也都肯定了私立博物馆作为国家博物馆的补充是一个发展方向。过去,国家对博物馆的重视除去拨

款以外,更多的是看重它的教育功能;私立博物馆在注重教育功能的同时,又追求长期生存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我们不可能要求观众经常参观博物馆并愿意支付较高金额的门票,任何一家博物馆都不能只靠门票收入生存。所以我们必须另辟蹊径。

我们希望国家对博物馆接受捐赠能有相应的政策,对捐赠方给予减免税收等奖励性的法规。私立博物馆应与公立博物馆一样,享受国家对文物藏品管理的优惠政策。

我们的担心是,博物馆的经济包袱,我们能否长时期地扛住,这就要看经营的情况了。包袱越小,扛的时间就越长,越大就越扛不住。这个包袱的大小,不单单取决于我们本身的经营,更重要的是社会的支持,而社会的支持又取决于国家相关的政策。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处在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发展时期,怎样在经济发展的阶段,保证国家的文化品味不至于下降。每一个发达国家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中国是一个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文明延续不断,文化的沉积越厚,我们越可能不重视它。

从鸦片战争起至今已一百五十年了,一百五十年以来,西方各国都对对中国文物垂涎三尺,并搜罗了大量的文物摆在了它们的博物馆。西方大国几乎每家大博物馆都有东方艺术的陈列,并引以为自豪。由于经济的失衡,这一百五十年,中国文物一直外流,直到近两三年,中国文物第一次出现以经济为目的的回流,从国外流入国内。这是一个信号,它表明我们国家的整体经济已达到一个过去没有的高度,表明中国文化的高品味和素质。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时机,教育国民真正热爱本民族的文化。

中国有句老话“乱世黄金,太平古玩”。收藏热是国泰民安的标志。而私立博物馆的建立,使个人收藏有一总结,服务于社会;更重要的是,私立博物馆所走的示范作用和昭示的发展方向,对于国家的文化建设所起的作用是不应低估的。

(作者为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馆长)

调 整

博物馆管理结构的 对策思考

○ 单 霁 翔

建国以来,我们的博物馆一直实行的是统一管理的办法,即由国家安排建设计划、国家提供各项资金、国家进行统一管理、国家确定业务内容,在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这种高度统一管理的体制,便于统筹安排,综合协调。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过去的管理体制就表现出了极大的不适应。

第一、博物馆的国家建设资金 与社会实际需要不适应

目前,国家经济和城市财政还不很富裕,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又需要在很多方面给予投资,在此情况下,今后数年国家仍不可能拿出很多资金投入博物馆事

业,现在每年投入博物馆的建设资金不足城市建设资金的千分之一,每年国家拨给各博物馆的事业费,仅够各博物馆正常开支的50%。然而,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断对博物馆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北京,在本世纪末,应该达到每十万城市居民拥有一座博物馆的水平。为达到此目标,必须加大对博物馆事业的投入。

第二、博物馆的分散投资方式 与综合效益提高不适应

在投资方面,改善现状条件对所有博物馆来说,几乎都是迫在眉睫的,无论是新馆还是老馆,由于先天不足,都急需加强和充实,面对有限的资金和广泛的需求,过去往往采取平均主义和分散主义的投资方式,结果是不论办馆条件如何、投资效益好坏,按各馆规模安排经费。各博物馆也习惯于根据国家下拨经费来确定自己的工作,多拨钱多干事,少拨钱少干事,不拨钱不干事,尚未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缺乏自主能力,业务思想停留于等、靠、要。如此投资结果,各博物馆的建设与展陈水平长期停留在较低水平,更谈不上达到国际国内先进水平,发挥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三、博物馆的单独运营状况 与整体优势发挥不适应

虽然博物馆群体拥挤在国家统一管理的体制下,但是各博物馆自我封闭、自成中心,馆际之间封锁壁垒、各自为政,藏品种类得不到扩充、重复品文物得不到交换调剂、展览得不到合办与互换、业务信息得不到交流与协作,北京地区博物馆的群体作用和群体效益难以正常发挥。

第四、博物馆的传统展陈内容 与当代大众需求不适应

多年来,我们一直把挖掘、收藏、保管和展示古代文物视为博物馆的中心任务,似乎只有出土文物和传世古董才有资格进入博物馆,而那些充满时代气息,与当代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实物、纪念物和近现代诞生的科技成果,却往往遭到忽视。结果是各博物馆从陈列内容到表现手法雷同现象严重,千篇一律的展览疏远了众多不同年龄、不同阅历、不同文化层次、不同职业的观众,造成门庭冷落状况。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高度集中、高度统一的博物馆运行机制,在经济体制向市场转轨的过程中矛盾重重,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发生危机,在这种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下形成的思想方式处处碰壁。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冲击,又给博物馆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机遇,将冲开博物馆自我封闭、盲目办馆的大门,迫使其改变脱离经济建设主战场的状况,使其面对现实,面向社会。市场经济把博物馆推上城市经济活动舞台,将拓宽博物馆的发展领域,使博物馆的工作成果可以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实现它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有选择地引入管理,也将给博物馆带来生机与活力。由此可见,市场经济的冲击,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他使博物馆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呈现出危机与生机并存的局面。如何将危机转化成生机呢,我认为,必须对博物馆的现状结构进行以下调整。

1. 调整博物馆的建设结构

博物馆事业是社会性很强的事业,社会事业要社会办,今后博物馆的建设主体不应再是政府和文物部门,要重视发挥社会各界的力量,充分调动社会各行各业办

博物馆的积极性,提倡各行各业兴办体现行业特性和时代特点的专业博物馆,鼓励区、县和乡镇、街道建设和发展具有个性特点和地方特色的中小型博物馆,推广企事业单位办馆、私人办馆、合资办馆、集资办馆的经验。如正在筹建的中国商业博物馆、北京戏曲博物馆、北京漕运博物馆、北京花卉博物馆等都属于动员社会力量创办博物馆的积极探索。只有形成这种多渠道、多层次的博物馆建设格局,才能满足社会对博物馆建设的需求,才能使博物馆事业不断地取得较大发展。作为政府和文物部门今后在博物馆建设方面,除要重视现有博物馆的发展,并量力而行地建设少数大型博物馆外,要对各行各业兴办博物馆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加以扶持,同时理顺和调整管理体制,做好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检查监督的工作。

2. 调整博物馆的投资结构

在投资方面,今后要理顺投资思路、调整投资结构,讲究投资效益。要克服平均主义和分散主义倾向,把有限的资金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对一批地理条件优越、独具特色、有较大影响的博物馆提高投资强度,进一步提高办馆水平,充分发挥其优势,取得更大的效益。与此相反,对于一些由于历史原因,尚未解决古建筑群的收复问题,不具备举办好展览条件的博物馆,则不盲目在展陈方面增加投入,而把近期工作目标集中在馆舍的收复上,积极创造条件,待条件成熟后再加大博物馆展陈方面的投入。我认为,只有分清轻重缓急、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建设一个,成功一个,把一批博物馆推入先进水平行列,取得良好的投资效益。

3. 调整博物馆的运营结构

由于各博物馆条件、任务和性质不同,

决定了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因而,应大力提倡北京地区馆际之间开展协作和交流。建立馆际之间横向联系有利于扩充藏品种类、更新陈列展览、交流业务信息、促进学术研究、减少资金投入、增加经费来源。近期要提倡在互惠互利原则下,开展馆际间重复品文物藏品的交换调剂活动,提倡馆际之间合办展览、互换展览、联合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充分发挥群体作用和群体效益。各博物馆由自我宣传,变为互相宣传,由自我发展,变为共同发展,从而增加博物馆整体活力、吸引力、凝聚力和竞争力,依靠博物馆系统的合力,形成博物馆工作的良性循环。

4. 调整博物馆的内容结构

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类博物馆占有引人瞩目的地位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北京不仅是世界著名古都,更是一个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城市,博物馆也应掌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反映北京的全貌。在保存好古代文物的基础上,应多注意表现当代人的生活,在展示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应多注意展示自然科学研究成就。博物馆只有与现代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焕发出巨大的活力,也才受到社会普遍的关注和重视,才会有更多的人前来光顾。只有当博物馆在人们文化生活、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就向银行在人们经济生活中的位置一样重要的时候,博物馆的门庭才不再冷落。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博物馆的社会服务内容,要从过去的有什么藏品就办什么展览,就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转变到社会和市民有什么需求就办什么展览,就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内容的新路子上来。也就是说,一切从社会需求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意愿出发,真正做到服务于市场需求。

(作者为市文物局局长、高级工程师)

北京的博物馆事业已有 80 多年的历史。1912 年,中国第一座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今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成立,这是近代北京博物馆事业的开端。在此后的二、

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宝库。博物馆事业是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模和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北京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的博物馆不仅是我们的民族历史缩影,集中展示科学文化成果的窗口,更是

新中国的诞生,使北京的博物馆事业获得了新生。自 1950 年起,北京开始建设新中国自己的博物馆,在 50 年代北京著名的十大建筑中,就有 3 座是博物馆(历史博

故宫博物院两座。1949 年,北京的博物馆仅存历史博物馆和济落后,大部分博物馆都先后关闭了。到是,由于民国时期,政治腐败,战乱不已,博物馆、天文陈列馆等 20 余座博物馆。但物馆、故宫博物院、北平天然博物馆、通俗三十年里,相继建立了交通博物馆、地质博

北京地区 博物馆现状的 调查报告

于丽萍

物馆、军事博物馆、中国美术馆)。到1965年底,北京地区已有各类博物馆、纪念馆15座。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博物馆事业又有了长足的发展,许多大、中、小型的博物馆相继建成。据1995年底的统计,北京已有126座博物馆及具有博物馆性质的单位,其中已正式开放的90座,尚未开放和正在建设中的36座,是建国初期的63倍(《北京日报》1996.9.24第5版。“京城博物馆知多少”)。

纵观建国以来北京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成绩喜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更加重视这一事业的发展,并将其纳入了首都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规划。1996年,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并特别指出对博物馆的经济投入,“要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增加幅度不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这都为博物馆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处于世纪之交的今天,国家对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北京作为首善之区,更应当具有世界一流的博物馆,并具备一流的设施、一流的管理、一流的展览和一流的服务。只有这样,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时代要求,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更好地为首都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然而,目前北京的博物馆现状又如何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组织了部分研究生和本科生,对正式开放的不同类型的68座博物馆进行了调查。学生们踏遍京城市郊,获取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整理出了68份原始记录,发出各类调查问卷500多份。在个案调查基础上,起草了47份调查报告。并认真听取了博物馆领导和同志们的意见与要求。总体认识是: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作为文化教育单位的博物馆虽然做出了许多努力,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仍然面临着生存难、发展更难的严重问题。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金短缺

在我们走访的68座博物馆中,除故宫、雍和宫等极少数博物馆以外,95%以上都强烈呼吁资金短缺、经费不足(见附表1)。

目前,博物馆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国家拨款。据我们了解,国拨款项只够职工的工资发放部分,且与各馆每年实际的经费开支相比,差距甚大。从附表1中可以看出,各馆的国拨款不足实际经费开支50%的占一半左右。二是门票收入。据统计,近年来有50%以上的博物馆客流量逐年递减,其门票收入亦随之减少(《北京博物馆年鉴》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1992年、1992—1994年)。另外,由于各馆客流量不同,门票收入差别较大。个别大馆及与旅游相关的馆情况较好,而大部分中、小馆的门票收入则微乎其微。例如文丞相祠,每月仅有300余元,即使这样,门票收入仍要被用来补充日常行政开支之不足。显然,博物馆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当我们看到北大地质博物馆展厅前摆放着一个“捐款箱”,希望参观者解囊相助时,不免感到几分苦涩。

由于资金严重不足,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制约着博物馆自身建设的发展。

其一,文物征集困难。收藏文物是博物馆的基本社会功能之一,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收藏品是办好博物馆的前提条件。在五、六十年代,征集文物大多通过行政调拨、无偿捐赠或廉价购买。但在如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件文物都明码标价,购买有较高价值的文物更是耗资巨大,以至于在文物拍卖会上,专司收藏之职的博物馆常常显得囊中羞涩。中国美术馆由于资金不足,眼睁睁地看着中央美院一批具有收藏价值的青年画家的作品,被外商以高出国内市场价数倍的价格买走,对于世界珍品则更是“望洋兴叹”。中国古动物馆在南江发现古鱼化石,由于缺乏资金,而无法征集,只能任其在原地风化、散失。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有藏品7000多件,现因没钱早

已停止了征集工作。据我们了解,其它馆亦有类似的窘境。

其二,文物保护设施简陋。对于博物馆的收藏品,应有必要的保护措施,有些文物要求具备一定的空气温度、湿度、日照等环境条件,才不致损坏。然而在法源寺佛教藏书博物馆,具有珍贵历史价值的云居寺石经拓片,却常年堆积在案架上,连个最起码能防尘的柜子都没有,该寺的法师对此只有叹息而无能为力。团城演武厅管理处,位于香山脚下,由于缺乏资金,无法采用现代化的防火设备,只能切断文保区的电源,晚上用手电筒照明。古观象台展出的清代八大天文仪器,属国家一级文物,自建国以来就一直摆放在露天。航空博物馆有20多架飞机亦展示在露天广场,任其风吹、日晒、雨淋,至今仍无资金搭个棚子。据馆内负责人说,其中有一架二战时期的“黑寡妇”是世界上仅存的两架之一。据调查,目前北京的博物馆,只有一些经济效益较好的馆安装了现代化的恒温、恒湿设备和防盗系统,不少馆仍靠室内养花、往地上洒水防止干燥,采用樟脑球防虫和“三铁一器”防盗。

北京的各类博物馆,是珍贵的科学文化宝库。国家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内的一级文物藏品都在2000件以上,故宫博物院的一级文物亦多达8000多件,军事博物馆被列为世界十大军博之一,地质博物馆有着亚洲最大的恐龙标本,鲁迅博物馆有文物近3万件,在各地鲁迅博物馆中是馆藏文物最多的大馆。其它诸如皇史宬收藏着明清皇家档案,法海寺保留着稀有的明代宗教壁画,等等。完好地保存这笔丰厚的文化遗产,留传给后人,是我们当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其三,展览内容陈旧,藏品使用率低。博物馆是展示历史文化的窗口,它与观众沟通的主要方式就是陈列、展览。博物馆的展陈不仅要具有科学性和艺术性,还要不断更新内容与形式,给观众更多的科学文化信息。然而,由于资金问题,许多馆的固定展览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不能更换。北京猿人博物馆的陈列是70年代的,至今仍基本保持原样;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中国通史

陈列》已展出30年了,其间虽有小的修改,但大部分展品未曾更换过。这样一成不变的展览,不能使观众及时看到新的科学发现及研究成果。我们对一组中学生的问卷调查表明,学生不愿参观博物馆的多种原因中,有78%是因为展览内容陈旧。

这次调查我们还了解到,在固定陈列中所使用的展品与藏品的比例(即藏品使用率)各馆不一,总的来说,大中型馆比率较低,小馆较高甚至100%(请看附表1)。例如,首都博物馆0.9%,大观园4%,雍和宫10%,中国古动物馆0.3%,北京自然博物馆9%,中国地质博物馆5%,抗日战争纪念馆20%。1/4的博物馆藏品使用率低于10%,这无疑不能使更多的文物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一些中、小馆因无法征集更多的藏品,只能将全部的家底都用到固定展览中,虽然使观众将展品尽收眼底,但某种程度上也使参观变为一次性了。

其四,展览手段落后。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时代,要想在北京建设世界一流的博物馆,就需要将现代化的声像、激光、电子技术应用到展陈布置、模型制作及模拟演示等各个环节中去。但在我们所调查的博物馆中,只有19座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某一方面的新技术,不到总数的1/3,多数博物馆仍采用传统的实物、图片及文字说明的手法,由讲解员一遍遍地重复讲解,且许多小馆连讲解员也没有。

从以上事实,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北京多数博物馆靠国拨经费和门票收入只能勉强维持其生存,至于发展则更是举步维艰了。

二、人才匮乏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员素质如何是办好博物馆的关键,也决定着博物馆的未来与发展。经过本次调查,我们了解到,目前北京地区各博物馆工作人员的现状不容乐观(参看附表2)。地质博物馆、中国科技馆、故宫、抗日战争纪念馆等大馆的人员情况较好,它们都有较强的专业队伍,工作人员中的年龄结构较为合理,学历、职称层次较

高,并不断有新的科研成果。但是,一些中小博物馆却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1、年龄趋于老化。附表2中数字表明,在49座博物馆中,40岁以上的工作人员达50%的就有27座,达60%的有20座。多数馆30岁以下的年轻人寥寥无几。年龄老化已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如果不及时注入新鲜血液,博物馆将会出现一个青黄不接的人才断层的局面。其原因何在?某博物馆一位负责同志如是说:“博物馆清苦,吸引不了年轻人,即使来了还是留不住”。有一个馆,这几年先后有20名出国人员未归。也有的国家级大馆,自己培养了几十年的高级鉴定专家却奔赴异国。由于博物馆是清贫的文化机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显然不能成为一些年轻人择业的方向和目标。

2、学历层次偏低。附表3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在51座博物馆中,大专以上学历达50%的仅有26座,其中只有4座硕士学历占50%以上,但这4座全都是大学办的博物馆。我们还可以看到,高中及以下学历占60%的馆有23座。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大馆专业人员均占总人数的一半以上,且大专以上学历密度较大。但多数的小中馆,特别是文管所、纪念馆等类型的博物馆,工作人员学历层次明显偏低。恭王府花园80多人中,大多为中专学历;西山大觉寺9人中只有1名专业人员;圆明园展览馆40人中,大专学历只有2人,其余多为周围地区农转非的高中生;白塔寺文管所高中及以下学历高达90%;焦庄户地道战遗址博物馆,17人全部是高中及以下学历。

博物馆专业人员队伍力量薄弱,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科研能力不足。调查表明,开展科研活动的博物馆仅占半数左右。科研工作博物馆的社会功能之一,一方面,要为有关部门提供科研咨询服务;另一方面,只有通过科研才能不断提高展览的质量和陈列水平。

三、社会教育功能发挥不够

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不少博物馆作

为文化教育机构,是重视发挥其宣传教育功能的,如历史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徐悲鸿纪念馆等,他们制定了“走出去、请进来”的方针,通过举办夏令营、巡回展览、知识竞赛、培训教师、义务讲解等多种形式,开展教育活动。如首都博物馆曾在国内外进行巡回展览,并成为22所中学的青少年教育基地。然而调查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也是值得注意的。

1、各馆重视程度不一,力量配备不均衡。在68座博物馆中,大多数在机构方面设立了群工部或社教部,从组织上保证了有专门人员从事宣传教育工作。但也有一些馆有人员有编制却未开展工作。还有一些小型博物馆,由于人手少,常常是一个专业人员身兼数职,没有精力和时间对外联系。

2、社会教育的辐射功能不强,多为短期行为。开展面向社会的宣传教育活动,尤其是面向广大青少年的教育是博物馆的长期任务,但就目前已有一些教育活动和形式而言,短期行为较多,如举办夏令营,搞知识竞赛,而真正建立起与中小学校的长期固定联系,利用本馆的展陈实施教育,把博物馆办成中小学校的第二课堂,做得还很不够。我们从对中学生的调查问卷中得知,只有8.8%的中学生在休息日去博物馆参观过。在大中小学校也还没有普遍将博物馆视为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及文化科学知识教育的第二课堂。问卷表明只有32.9%的中学历史教师组织学生参观过博物馆,46.8%的中学生表示学校教师没有组织过参观博物馆的活动。

近一两年来,各种舆论、宣传媒介对博物馆事业的关注有所增强,特别是“孔繁森事迹展”和“红岩魂”展览的报道,曾轰动京城。但从总体上讲,长期以来,各种宣传媒介对博物馆还是冷落了,偶尔有些专题节目或报道,也不被安排在黄金时间和显要位置上。在前不久一则调查中中学生课外生活的报道中,调查者设立了公园、电影院、游乐场等近十项内容,唯独没有设立“博物馆”这一项。这说明在当今社会人们的文化

生活中,参观博物馆还没有占据应有的位置,有时甚至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当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博物馆自身的宣传意识很薄弱,宣传力度也很不够。

综上所述,建国以来,北京的博物馆事业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其文物收藏、科学研究、社会教育的功能,发挥得还很不够。特别是在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如何进一步发挥博物馆的作用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对此,我们提出以下基本看法:

第一,博物馆的生命力在于紧紧把握时代的需求。

如何改变长期以来博物馆门庭冷落的局面,近年来一些博物馆的成功经验作出了回答。“孔繁森”、“红岩魂”等展览,之所以火爆京城,观众人数达到平均每天1万人,就是因为它适应了当代人对精神食粮的企盼和对正气回归的呼唤。成功的展览,来自于对社会心理的透视分析,对人们精神世界需求的正确把握。在“红岩魂”的参观者中,有80%是自费购票的,这说明了只有适应时代的要求,紧紧把握社会需要,展览才能吸引观众,才能使观众自觉自愿地走进博物馆。

第二,以特色展览吸引观众,增加资金来源渠道。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经费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各博物馆为了解决资金问题先后采取了以商养文、以馆养馆(指出租场地或房屋)等各种办法。对此我们的认识是:一,出租场地、开办商业公司等办法,只能是在国家经济尚不发达时期的权宜之策,而不能代表博物馆将来的发展方向。二,博物馆的根本任务是展示历史文化,进行社会教育。在不违背博物馆宗旨的前提下,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挖掘各馆潜力,举办特色展览,吸引观众。这一方面可更多地为社会服务,另一方面也扩大了资金来源,使博物馆的发展呈良性循环。

目前,已有不少单位在这方面下了许多功夫,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地质博物馆利用自身的技术力量,办起了宝石鉴定中心,现已成为宝石鉴定

行业的权威。首都博物馆利用馆藏优势,到东南亚及香港等地举办文物巡回展,既展示了我国灿烂的文化遗产,又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在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观众们参观完毕,还可以吃上有当地特色的抗日饭,体验一日军营生活,该馆的客流量从1988年的不足1万人,上升到了1994年的8.6万人。大葆台汉墓博物馆的模拟考古,不仅吸引了许多国内观众,也使海外旅游者慕名而来。中国科技馆在展览方式上推陈出新,增加了动手操作,给前去参观的学生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地处香山脚下的曹雪芹纪念馆,大胆设计了“黄叶村”,把旅游与访古融为一体,使观众耳目一新。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在国家目前尚不能大幅度增加资金投入的情况下,这些博物馆不是消极地坐等、守摊,而是积极地开拓、探索,坚持博物馆的宗旨,依靠自身优势,办出了特色,搞活了博物馆,拓宽了资金来源渠道,较好地解决了资金短缺的问题。

第三、引进人才,提高素质,科学管理。

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首先必须要提高国民素质,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同样,博物馆事业要发展,更需要有高层次的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因此,如何提高博物馆工作人员的素质,已成为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首先必须引进专业人才,注入新鲜血液。每年大专院校都有博物馆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等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博物馆应当以优惠政策,克服困难,积极吸纳。年轻的专业人员不断走上博物馆工作岗位,将会给博物馆的发展带来生机和活力。

其次,培训现有人员,提高业务水平。引进人才毕竟是杯水车薪,而立足于对现有人员的培训和再教育,则是更直接而有效的途径。比如,送一些业务骨干到高等院校进修,以提高学历层次,增强科研能力;请专家教授讲课,进行短期培训;办讲解员培训班,普遍提高职工的文化素质;加强馆际交流,及时推广先进经验等等,在这方面,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做法值得借鉴。该馆对业务人员全部进行了培训,内容为

基础课、专业课及技术课三部分。每周安排固定的进修学习时间,并有严格的考核制度。目前全体业务人员已结束了为期三年的培训,完成了毕业论文,通过了考核。除此之外,对行政人员还开设普及班,进行相关的专业知识培训。

再次,向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迈进。提高博物馆的整体素质和水平,见效最快、投资最少、潜力最大的措施就是加强管理,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博物馆领导及各级管理干部只有不断学习,更新观念,树立现代意识,才能适应时代要求,科学地做出决策,使管理上档次、出效益。此外还要合理地用人,发挥职工的主观能动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查中,我们感到大观园的职工都有一种主人翁精神和饱满的工作热情。去年几位职工自己动手制作大观园沙盘,节约了20万元经费。园职工义务劳动铺电缆、挖沟5、6次,节省15万元。他们还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岗位责任制及完善的考核条例。

总之,在博物馆事业中,从征集文物到藏品保护,从设计展览到普及宣传,各个环节都需要有高素质的专业人员。因此在博物馆的竞争与发展中,人才是关键。

第四,加强重视,增加宣传,扩大博物馆的知名度。

调查中,一位博物馆工作人员无奈地说:“群众需要商店,不需要博物馆”。是的,对于刚刚走出温饱、奔向小康的中国国民来说,许多人还沉浸在物质的追求上。在家庭里,许多家长面对“小太阳”,都尽量从物质上给孩子以最大的满足,却忽视了对孩子精神上的陶冶。博物馆是人们的“终身学校”,特别是北京的博物馆,数量众多,门类齐全,称得上是一部“百科全书”。要使广大群众更多地去参观博物馆,首先就要使大家充分认识到博物馆的重要性。

为此,我们向有关的各级领导建议:对博物馆事业给予高度的重视和支持。在对一组学校教师的问卷调查中,我们仅列举了3个博物馆,但仍有45.6%的教师回答

“都没有去过”。当被问及“您所在学校的领导是否重视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时,有60%的人回答“不重视”。可见各级领导重视,在学校里强调博物馆是学生的第二课堂,倡导学生们自己去博物馆,鼓励教师带学生参观博物馆是很有必要的。一位博物馆负责人这样对我们讲:“我们的社会多一个来博物馆的人,就少一个犯罪的人”。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却道出了博物馆事业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贯彻六中全会《决议》精神,各级领导应当重视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把它作为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

我们还要向社会上的各种宣传媒介建议:给北京的博物馆事业再多一点关注!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中,报纸、广播、电视等各种媒体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很强的导向作用,文化生活亦不例外。舆论宣传曾挽救了严肃音乐,曾使“国安足球队”家喻户晓,也曾使孔繁森、“红岩魂”深入人心。我们同样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宣传媒体对北京的博物馆倾注更多的热情。

最后我们也要向北京所有的博物馆建议:积极行动起来,走出大门,走向社会,采取多种途径和渠道宣传自己和自己的特色展览,扩大博物馆的知名度,向社会奉献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当我们结束这次调查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们被辛勤工作在博物馆战线上的博物馆人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他们工作条件艰苦,待遇低微,然而却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为自己所挚爱的文博事业努力地工作着。40年来北京博物馆事业的成就正是他们辛勤劳动的结晶。但愿今日他们的劳动能换来明天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但愿今日我们的呼吁亦能换来明天全社会对博物馆事业的加倍关注。

博物馆——它能使一个民族不致于丢掉自己好的东西,能使一个民族记住耻辱而奋发图强,能使一个民族看到自己辉煌过去而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

附表1 博物馆经费、藏品及使用状况

数 字 单 位 名 称	项 目	年国拨经费 /元	实际 投入经费 /元	国拨经费 占实际经 费百分比	馆藏品 数/件	固定陈列 使用藏品 数/件	藏品使用率
故宫博物院		不固定	6千万	/	96万	/	/
中国革命博物馆		400万	1千万以上	40%	12.6万	4500	4%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 物馆		100万	120万	83%	2000多	1200	60%
中国航空博物馆		0	100万	0	700	238	34%
首都博物馆		80万	140万	57%	8万	700	0.9%
中国体育博物馆		80—100万	200—300万	60%	3500	1800	51%
中国地质博物馆		70万	100万	70%	10万	5000	5%
中国农业博物馆		15万	150万	10%	2—3万	1万	40%
中国科学技术馆		305万	800万	38%	/	/	/
中国美术馆		0	100万	0	4万	/	/
北京自然博物馆		140万	600万	23%	10—12万	1万	9%
民族文化宫展览馆		0	200万	0	2—3万	约600	3%
雍和宫		0	不定	0	5000	500	10%
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 馆		24万	30万	80%	1167	400	34%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博物 馆		100万	300万	33%	1000	200	20%
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		2万	10万	20%	7000	200	3%
中国古动物馆		6万	30万	20%	20万	600	0.3%
北京航空馆		3000	1万	30%	460	450	98%
北京古代钱币展览馆		9万	40万	23%	7000	1000	14%
郭沫若故居		20—30万	不定	/	/	/	/
李大钊烈士陵园陈列室		10万	50万	20%	1	1	100%

詹天佑纪念馆	18 万	30 万	60%	2000	1000	50%
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	2 万	6 万	33%	78	78	100%
当代美术馆	不定	不定	/	/	/	/
长辛店“二七”纪念馆	0	不固定	0	300	110	37%
大观园	0	600 万	0	9000	400	4%
北京天文馆	不固定	80 万	/	100	50	50%
北京农业大学校史陈列馆	/	/	/	3200	3200	100%
北京科技大学校史陈列馆	5000	1 万	5%	600	600	100%
白塔寺文物保管所	6 万	10 万	60%	200	50	25%
鲁迅博物馆	70 万	90 万	78%	3 万	1 万	33%
古观象台	100 万	200 万	50%	48	16	33%
正阳门管理处	35 万	45 万	78%	2	2	100%
中华航天馆	0	100 万	0	1000 以上	几百件	约 50%
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	不定	2 万	/	900	900	100%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博物馆	2 万	3 万	67%	5600	5600	100%
北京大学地质博物馆	不定	70 万	/	2—3 万	2000	8%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艺术博物馆	不定	80 万	/	2 万	800	4%
北京艺术博物馆	40 万	120—150 万	30%	1 万	约 600	6%
北京猿人博物馆	/	/	/	1000 多	/	/
北京辽金城垣遗址博物馆	20 万	35 万	57%	/	864	/
圆明园展览馆	0	/	0	2	2	100%
北京城东南角楼文物保管所	10	15	67%	/	/	/
文丞相祠	4 万	8 万	50%	80	15	19%
北京法海寺文物保管所	20 万	150 万	13%	1000	/	/
郭守敬纪念馆	8 万	20 万	40%	10	1	10%
皇史宬	360 万	500 万	72%	153	122	80%
团城演武厅管理处	6 万	20 万	30%	/	/	/
北京画院展览馆	20 万	45 万	44%	/	/	/

西山大觉寺	9 万	20—30 万	36%	/	/	/
法源寺佛教图书馆	/	/	/	30 万拓片	/	/
茅盾故居	0	/	0	/	/	/
恭王府花园	30 万	80—90 万	43%	/	/	/
梅兰芳故居	/	/	/	3 万	/	/
白云观	0	/	0	1000	800	80%
炎黄艺术馆	0	100 万以上	0	3000	600	20%
中国工艺美术馆	20 万	100 万	20%	2000	710	30%

附表 2 博物馆工作人员年龄比例

具体数字 单位名称	年龄层次	各馆人数	50 岁以上 人数及 百分比	50—40 岁 人数及 百分比	40—30 岁 人数及 百分比	30 岁以下 人数及 百分比
故宫博物院		1500	300 20%	600 40%	450 30%	150 10%
中国革命博物馆		278	/	/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		230	10 4%	20 9%	80 35%	120 52%
中国航空博物馆		120	3 3%	10 8%	30 25%	77 64%
首都博物馆		131	/	/	/	/
中国体育博物馆		80	2 2%	10 13%	40 50%	28 35%
中国地质博物馆		98	30 31%	45 46%	20 20%	3 3%
中国农业博物馆		100	20 20%	52 52%	18 18%	10 10%
中国科学技术馆		160	100 63%	30 19%	20 12%	10 6%
中国美术馆		130	/	/	/	/
北京自然博物馆		120	36 30%	60 50%	12 10%	12 10%
民族文化宫展览馆		57	6 11%	3 5%	30 52%	18 32%
雍和宫		70	8 12%	10 15%	45 64%	7 9%

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	20		2 10%	14 70%	4 2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120	30 25%	40 33%	40 33%	
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	5	1 20%	4 80%		
中国古动物馆	6	3 50%	2 33%	1 17%	
北京航空馆	5	2 40%		1 20%	2 40%
北京古代钱币展览馆	14	1 7%	5 36%	8 57%	
郭沫若故居	28	4 14%	21 75%	3 11%	
李大钊烈士陵园陈列室	23	5 22%	6 26%	7 30%	5 22%
詹天佑纪念馆	15	/	/	/	/
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	17	1 6%	1 6%	1 6%	14 82%
当代美术馆	4	2 50%		1 25%	1 25%
长辛店“二七”纪念馆	4	1 25%	1 25%	2 50%	
大观园	278	9 3%	105 38%	146 53%	18 6%
北京天文馆	120	20 17%	80 67%	16 13%	4 3%
北京农业大学校史陈列馆	4	2 50%	2 50%		
北京科技大学校史陈列馆	1	1 100%			
白塔寺文物保管所	10	4 40%	4 40%	2 20%	
鲁迅博物馆	80	15 19%	50 63%	10 12%	5 6%
古观象台	26 7 27%	7 27%	12 46%		
正阳门管理处	16	3 19%	4 25%	7 44%	2 12%
中华航天馆	20	5 25%	4 20%		11 55%
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	2	1 50%	1 50%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博物馆	6	1 17%	2 33%	2 33%	1 17%
北京大学地质博物馆	2	1 50%			1 50%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艺术博物馆	7	2 29%	3 42%		2 29%
北京艺术博物馆	64	5 8%	16 25%	33 52%	10 15%
北京猿人博物馆	11	/	/	/	/

北京辽金城垣遗址博物馆	10		1 10%	5 50%	4 40%
圆明园展览馆	40		1 2%	2 5%	37 93%
北京城东南角楼文物保管所	8		2 25%	4 50%	2 25%
文丞相祠	3		1 33%	2 67%	
北京法海寺文物保管所	14	1 7%	1 7%	5 36%	7 50%
郭守敬纪念馆	4		3 75%	1 25%	
皇史宬	4	2 50%	1 25%	1 25%	
团城演武厅管理处	9		4 45%	3 33%	2 22%
北京画院展览馆	14	3 21%	4 29%	6 43%	1 7%
西山大觉寺	9	1 11%	2 22%	4 45%	2 22%
法源寺佛教图书馆	4	1 25%	3 75%		
茅盾故居	2		2 100%		
恭王府花园	84	/	/	/	/
梅兰芳故居	20		90%	90%	
白云观	100	/	/	/	/
炎黄艺术馆	50	/	/	/	/
中国工艺美术馆		/	/	/	/

附表3 博物馆工作人员学历文化程度比例

具体数字 单位名称	学 历	硕士以上人数及 百分比	大学本科人数及 百分比	大专人数及 百分比	高中及以下人数及 百分比
故宫博物院		150 10%	400 27%	350 23%	600 40%
中国革命博物馆		/	/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			120 52%	60 26%	50 22%
中国航空博物馆		2 2%	18 15%	20 17%	80 66%
首都博物馆			28 21%	32 25%	71 54%

中国体育博物馆	7 9%	40 50%	20 25%	13 16%
中国地质博物馆	12 12%	38 38%	30 30%	18 18%
中国农业博物馆		25 25%	38 38%	37 37%
中国科学技术馆	20 12%	70 44%	40 25%	30 19%
中国美术馆			23 17%	107 83%
北京自然博物馆	10 8%	50 42%	20 17%	40 33%
民族文化宫展览馆		10 8%	32 56%	15 26%
雍和宫	3 4%	2 3%	15 21%	50 72%
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		2 10%	5 25%	13 65%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10 8%	40 33%	20 17%	50 42%
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		5 100%		
中国古动物馆		2 33%	1 17%	3 50%
北京航空馆	1 20%	2 40%	1 20%	1 20%
北京古代钱币展览馆		1 7%	3 21%	10 71%
郭沫若故居	3 11%	6 21%	6 21%	13 47%
李大钊烈士陵园陈列室		1 4%	2 9%	20 87%
詹天佑纪念馆			4 27%	11 73%
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				17 100%
当代美术馆	1 25%	1 25%	1 25%	1 25%
长辛店“二七”纪念馆				4 100%
大观园		5 2%	53 19%	220 79%
北京天文馆	8 7%	72 60%	20 16.5%	20 16.5%
北京农业大学校史陈列馆	2 50%	2 50%		
北京科技大学校史陈列馆	1 100%			
白塔寺文物保管所			1 10%	9 90%
鲁迅博物馆	22 28%	30 38%	5 6%	23 28%
古观象台		8 31%		18 69%
正阳门管理处		4 25%	1 6%	11 69%

中华航天馆	/	/	/	/
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		2 100%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博物馆	2 23%	3 50%	1 17%	
北京大学地质博物馆	2 100%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艺术博物馆	6 86%	1 14%		
北京艺术博物馆	3 5%	7 11%	20 31%	34 53%
北京猿人博物馆		1 9%		10 91%
北京辽金城垣遗址博物馆		3 30%	1 10%	6 60%
圆明园展览馆			2 5%	38 95%
北京城东南角楼文物保管所			2 25%	6 75%
文丞相祠			1 33%	2 67%
北京法海寺文物保管所			3 21%	11 79%
郭守敬纪念馆			1 25%	3 75%
皇史宬	1 25%	1 25%		2 50%
团城演武厅管理处		2 22%	3 33%	4 45%
北京画院展览馆		3 21%	7 50%	4 29%
西山大觉寺		1 11%		8 89%
法源寺佛教图书馆	/	/	/	/
茅盾故居		1 50%	1 50%	
恭王府花园	/	/	/	/
梅兰芳故居				90%以上
白云观		5 5%	30 30%	65 65%
炎黄艺术馆	/	/	/	/
中国工艺美术馆	/	/	/	/

说明：①我们调查了 68 座博物馆，但由于有的博物馆数字不全，或是不愿透露，因此表中只列了 57 座。

②“/”表明数据不全，不在统计之列。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编者按

本文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为《宣南鸿雪图志》一书编的序言。该书由宣武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和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合编，是一部全面记录宣南地区文化遗迹的图文并茂的文献著作，将于今年六月份出版。吴教授的序文全面论述了文物建筑的价值和保护利用的原则，是一篇立论严谨的论文。现征得吴教授同意，将此文单独发表于本刊，以便更多读者阅读。

整理文化遗产 服务现代城市

——《宣南鸿雪图志》序

吴良镛

北京是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国城市发展的最后结晶，集中体现了许多历史名城的形态。北京有宫殿、苑囿、坛庙、府衙、巨刹这类典章文物，也有民宅、会馆、店铺、茶园、杂祠这类市井旧迹，还有商场、银行、酒店、学校、工厂这类近代遗存，它们都是北京文化的具体形态，共同构成了北京历史文化的长卷画。在这个长卷中，以今日宣武区为主的“宣南”史迹，因其历史悠久，类型众多，内涵丰富而具有特殊价值。许多研究北京文化的学者认为，北京地域文化的源头在宣南，至少可以说北京的士人文化、平民文化集中在宣南，从现存的史迹来看，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

城市中的文物古迹是城市文脉的载体，丢掉了它们，等于城市失去了记忆。因此，整理、发掘、保护文物，开发其价值，发挥其功能，是每一个城市公民，特别是城市

管理者的责任。毋庸讳言，对城市中文物古迹的价值，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认识得很清楚，因而导致保护不力，轻率拆毁的事情时有发生。在这里，结合我个人对宣南文化的粗浅了解，谈谈对文物价值的认识。

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世界古迹保护学术权威、英国学者菲尔顿教授(B. M. Feilden)提出，文物有“精神价值、文化价值和实用价值”。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比较全面，容易理解，在实践中也是便于操作的。所谓精神价值，也就是哲学意义的美学价值，它包涵着若干审美效应。一是奇观(wonder)。比如唐悯忠寺中的观音阁甚高，流传着“悯忠高阁，去天一握”的美称；现存法源寺的深深庭院，天宁寺塔的层层密檐，牛街礼拜寺的巨大殿堂，身临其间，都会有“奇观”的感觉。二是形象标志，如辽代的天宁寺塔，明代的先农祭坛，清代的安徽会

馆、湖广会馆,近代的天桥、大栅栏,都是宣南特有的标志,可以引发人们对本地区的联想。三是反映了文化的延续性(continuity)。如和平门外至前门间的几条斜街,就是当初元代建立大都后,新都(金中都)之间自发形成的通道,后来又发展成商业繁盛的地段,明朝有人称为“龙脉”。宣南现存的史迹中,从远在唐代的寺庙,直到近代的“新市区”和各处商业街,其间的文化嬗递,脉络是很清楚的。四是它可以成为一种精神象征。谁都承认,万里长城是中国人的精神象征,天安门是作为政治中心首都的象征,在宣南,象牛街礼拜寺,就可以成为民族团结的象征,琉璃厂成为书卷文化的象征,湖广会馆成为戏曲文化的象征,大栅栏成为“儒商”文化的象征等。

所谓文化价值,既体现在文物建筑所包容的文化内涵,也体现在它们自身的形态中,一是指它有文献价值。如法源寺中的唐碑,先农坛的祭祀建筑,牛街礼拜寺的“白匾”,许多会馆中的碑记,以至一些街巷名称,都是最可靠的第一手文献。二是指它有历史学和考古学方面的价值。历史街区 and 文物建筑也可以看作是大“古董”,它们

最直接地记载着该地区的历史地理,社会文化,民俗风尚,乃至经济兴衰,政治变迁。比如天宁寺塔的建塔碑和塔身造像,对考证辽末的政治、宗教就有很大价值。三是指它有美术价值,也就是建筑艺术、景观艺术、装饰艺术、雕刻绘画艺术等方面的观赏价值。如天宁寺塔、法源寺、牛街礼拜寺、湖广会馆、陶然亭等名胜,大栅栏的商业店面,以及一些民宅和近代优秀建筑,还有许多木、石、砖、铁、泥制装饰构件,都是很精美的艺术品。四是指文物有科学的价值。如天宁寺塔已有877年的历史,中间经过几次大地震,特别是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京师大地震,主要受灾区就在南城,大部分建筑都被震塌,但此塔主体结构安然无恙,它的结构科学就很值得重视。

文物建筑的实用价值,一直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一般说来,文物保护主要是社会公益事业,应当主要发挥社会效益。单纯把文物建筑当成房屋使用,或只知依托文物赚钱而忽略社会的、文化的、环境的效益固不足取;但无视客观实际,讳言利用,不注意开发其实用价值,最终也会使文物的社会效益下降。文物的实用价值是多方面的。



法源寺

天宁寺塔



牛街礼拜寺



法源寺

一是它可以成为健康的公益活动场所。如湖广会馆成为戏曲博物馆,太岁殿成为古建博物馆,万寿西宫成为老年活动公园等,就是很好的开发利用。二是它本身是一种经济资源。北京正是因为有许多文物古迹,才成为吸引中外人士观光的胜地,除旅游业自身的收益外,由此而带动的经济活力和创造的财富更是难以估计。除了故宫、颐和园、十三陵等典章精品外,胡同、民宅、会馆、店铺、庙会、祠庙,以及民俗活动,民间工艺都可以而且正在成为新的旅游热点,在这方面,宣南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我赞成一种提法:今天的文化就是明天的经济。三是它有社会教育价值。现在不少文物古迹定为青少年教育基地就说明这一点。历史街区、文物建筑为人们提供某种健康纯净的文化环境,有助于调节心理机能;还可以成为展示民俗文化的场所,有助于丰富知识领域,对于塑造健康人的素质,有重要作用。四是它有政治价值。在宣南,既有王渔洋、孔尚任、朱彝尊、纪晓岚、闫百诗、沈家本等众多对中国文化作出重大贡献名人的故居,也有推动中国近代改革,戊戌变法风云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活动的祠庙会馆,更有近代革命者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鲁迅、高君宇等人留连的旧迹;此外还有近代中国城市规划管理改革的示范区新市区的遗物。这些故居、旧迹、遗物,显然各自都有特定的政治价值。

以上是就一般意义上来说的文物价值。对于宣南,从这本《图志》来看,尽管如书名所说,现在记录的只是一些“雪泥鸿爪”,也足以显示出当地文化底蕴之深厚,从中可以看出,这里的文物又有特殊的价值。比如,北京城的规划,在总体上是规整的,但在宣南,却有不少地段突破了规整的格局,出现了不少斜胡同、直(南北走向为主)胡同、窄胡同、短胡同,也就是大规整中又有小变化;由于这种“小变化”,又影响了建筑的组合形式,特别是住宅,有很多变体组合,出现了不少非法式的“非标”建筑。又比如,老北京的建筑做法、式样,以至装饰装修是比较和谐统一的,形式的传统性、规范性很强;但在宣南,自清末以来大量吸收

外来形式,仅仅 20 年左右,使传统面貌改变很大,煤市街、珠市口以西、大栅栏一带、天桥、先农坛等地形成了特有的宣南近代风格。其中有许多不是正规建筑师设计的作品颇有特色,它反映了在吸收外来形式时,中国人独特的审美解释和审美趣味。这是历史文化的积淀,也是现代创作中一项重要的课题。宣南的几条斜街,记录着金、元之际城市的脉络,是城市发展中留下的“痕迹”(trace),而在现代城市建设中,注意保护这类“痕迹”,正是今天国际城市规划理论着意强调的一项原则;更何况这类斜街,恰好又为城市设计创造丰富空间,增加景观趣味提供了有利的地形条件。像五道庙、观音寺、棕树斜街口、伏魔寺等处周边,现在还能找到引人入胜的城市景观。这是宣南难得的“天赋”条件,在城市改造中一定要注意保护利用。

城市总是在更新中发展。在宣南,唐迹只余石碑,辽金故城也只留下一座砖塔和一片池水(鱼藻池),明代建筑遗存数量已经不多,清代和近代建筑正在逐渐减少。不可否认,由于危旧房改造规模加大,城市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文物古迹数量也会越来越少,这种现象是难以避免的。大浪淘沙,更新中总会留下一些精品。但是正如我在本文开始所说,对文物古迹的价值,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认识得很清楚,因而急功近利,杀鸡取蛋,自毁资源的现象也是确实存在,值得引起重视的。本书的作者们有鉴于此,花了许多时间精力,调查访问,绘图记录,编成《图志》出版,实在是很有意义的一项文化基础工程。它既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历史文献,又是一部可供决策参考的研究报告。特别是本书的策划、组织者正是主管城市改造建筑的政府部门,更是令人欣慰。本书的主编人多年从事中国建筑历史研究和文物保护工程设计,又是一位建筑师,我相信他和他的同事有能力驾驭这一份深厚的遗产,使读者对这本《图志》满意或基本满意。因此我也很愿意为之作序,并将此书推荐给读者。同时希望北京其它城区也都有类似的著作问世,并成为系列。

(作者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

北京城市建设指导思想的几点思考

孙 玲

北京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服从和充分体现这一城市性质的要求。《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明确确定了北京的城市性质,但是在当前北京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中,这项具有法规效力的规划却缺少应有的权威性。因此,尽管北京城的建设蓝图早已划定,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却大大地打了折扣,老北京城的神韵正在一天天消失,北京老城区里的平房区、老街道一片片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高速公路、高架立交桥。面对城市改造的大形势,一些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断发出急切而严重地警告:不要把北京建成香港、新加坡、纽约,北京要象北京,要保护住自己城市的风格、特色,建设现代化不能以牺牲北京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为代价。但是也有人认为:首都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不是一件老古董,不应成为一个维护和展示旧风貌的历史博物馆,京城大部分古建筑已遭破坏,古都风貌早已不复存在,维护古都风貌不切实际,应着眼新城建设。围绕着北京城的建设,见仁见智,但是不论是力主保护古都的还是赞成拆旧建新的,提起老北京城,则众口一词称赞老北京城的规划和建设是杰出的。

提起老北京人们就会想到金碧辉煌的故宫、雄伟壮丽的长城、工程浩大的帝王陵寝、恢宏端庄的坛庙、绮丽多姿的皇家园林、幽静典雅的王府、文人学者的故居、巍峨高大的城楼、角楼、别具特色的四合院民居、风貌古朴的街道胡同。北京早在金代就成为北中国的政治中心,至今已有 800 多

年的历史了。在这数百年中,北京历经几朝几代的建设,成为世界闻名的古老城市,它的规划与建设几乎达到了完美,我国著名建筑家梁思成先生曾赞美北京是“都市规划的无比杰作”。北京景山万春亭是观赏城市布局的最佳位置。站在万春亭上眼前是金碧辉煌的故宫建筑群和排列有序的灰色民房,远处绿树掩映,湖水波光粼粼,巍峨的城楼、坛庙恰到好处地点缀在城的四隅。再往远望,东南平缓疏朗,绿地如毯,西北山峦起伏,青山如黛,整座城市中无数个单体建筑组合在一起是那样恰如其分,那样适度合理,构成一幅完美和谐的图画。

北京城的特色之一就是它的天际线开阔、平缓,整个城市呈水平布局。但是目前,北京城的天际线已受到严重的破坏,我们仅从王府井地区的改造情况看,就可知道城市改造的趋势是多么迅猛。王府井大街是老北京有名的商业街,它紧邻紫禁城,为衬托故宫,尽管这里店铺林立,却没有超高层的建筑。但是近几年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王府饭店、台湾饭店、和平宾馆,都以其巨大的建筑体量,豪华的装饰效果令人瞩目。时下新东安市场,利生体育用品商店又以青出于蓝的态势出现了。这些建筑象一个个巨人包围了故宫,使雄伟壮丽的故宫建筑群成了一个精美的“建筑模型”。《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规定:“旧城要保持平缓开阔的空间格局,由内向外逐步提高建筑层数,建筑高度除规定的皇城以内传统风貌保护区外,分别控制在 9 米、12 米和 18 米以下”。可是事实却远离了这个目标,建控高度被一破再破。北京的十里长街,尤其是天安门广场曾被多少人赞颂,人们公

认它是城市广场中的“世界之最”。这条城市中心大道宽敞广阔，是许多世界大城市望尘莫及的。如今长安街上高层建筑竞相比美，从建国门开始往西，路北侧的高层建筑有中国社科院办公大楼、北京国际饭店、光华长安大厦、交通部大厦、全国妇女活动中心、东单电话大楼、北京饭店、电报大楼、航空大厦、图书大厦、民族饭店、长话大楼、百盛购物中心。除了这些已有的建筑外，东单路口数千间房子正在拆迁，数十万平方米的土地上正在筹建东方广场。西单路口两侧也在夜以继日地建设着。这一幢幢大体量的建筑使整个长安街的北面筑起了一道高层建筑的屏障。过去让人倍感雄伟高大的天安门城楼，在这些新建筑的对比下，显得逊色了许多。皇城内不断升起高楼大厦，使当年占据老北京中轴线上最高大、最有气派的故宫建筑群变得矮小了，它们在那些装饰豪华、体量巨大的新建筑的对比下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老北京城在设计时留下了好几条重要的风景线，如今被一些见缝插针的高楼把原来的景观视线割断了，“银锭观山”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当年站在银锭桥上，眼前是碧绿清澈的后海，一湖碧水倒映着两岸婀娜的垂柳，远处西山如黛，霞云缭绕，人在此处如置身在美丽的图画之中。但是现在这条重要的风景线遭到严重破坏，几年前某大医院新建的住院部大楼阻断了人们西眺的视线。

城市色彩是一个城市最醒目的标志，是人们对这座城市最初得到的最深刻、最宏观的印象。老北京城的民居是由大片灰砖灰瓦建成的四合院组成，在这大片灰色中以红墙黄瓦为基色的故宫以及城市四隅的坛庙点缀其中，颜色虽有反差，但是整座城市凝重中显得明快，朴素中显得绚丽，这种城市色彩恰当地展示了北京这座几朝帝都气度不凡的城市风范。新中国成立后，也曾对城市进行较大规模的建设，由于我国老一代设计家们在设计时充分考虑到北京城市的整体格局，精心设计出与北京城市性质相一致的建筑。使新建筑协调统一地纳入了古城的统一风格。如天安门广场的

设计既保留了北京城的风貌，又展示了广场的壮丽辉煌。景山后街的大屋顶建筑也是成功的典范，它以灰色为主体，绿琉璃瓦顶，虽然体量很大，但是它既没有与景山争色，又与地安门大街的其它建筑和谐一致，还保护了老北京中轴线的完整和对称。

近些年来，随着城市改造的速度不断加快，城区内五颜六色的新建筑扰乱了城市色彩的基调，特别是一些大体量的新建筑，有红有绿，有的采用大面积茶色或蓝色的玻璃幕墙，与附近建筑很不协调。如位于和平门附近的北京供电局的新楼，整座楼都用白瓷砖贴面，在高大的白楼顶上矗立着两座绿琉璃瓦的亭子，人们站在宣武门大街上往东看，这座新建筑无论从高度上，从体量上都比离它不远处的正阳门城楼高大，加上它靓丽的色彩，使原本金碧辉煌，巍峨挺拔的正阳门城楼显得低矮，破旧。

北京城东南角楼是北京地区保留下来的唯一一座城墙角楼，过去列车进入北京，人们首先看到这个建在高大城台上的重檐歇山顶、灰筒瓦绿剪边、拥有144个箭窗的角楼时，就会感到它是那么古朴端庄，那么高大雄伟，透过它感受到北京与其它城市不同的风采、与众不同的气势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但是近几年来，一座座高层建筑拔地而起，角楼附近最影响景观的是京安旅馆和交通旅馆，这两座建筑本身就超过规划高度，再加上大楼上的几座色彩鲜艳的亭子，使这一地区的建筑显得杂乱无章，在这纷乱背景下，东南城角楼在高度、体量和色彩上都失去了往日的优势。二环路上的新建筑，色彩更是五花八门。深褐色和浅棕色的保利大厦和京广大厦雄踞东四十条立交桥两边，离此不远处是通体洁白仿外国建筑风格的富华大厦，它的旁边是绿色的居民楼，朝阳门立交桥头是扇面型白色外交部办公楼。这里我们暂且不说这些大楼的建筑风格的不统一，不和谐，单就它们的颜色而论就很值得商榷，这些建筑颜色反差过强，跳跃性过大，缺少有代表性的基本色调。长安街在全市缺乏统一规划权威的情况下，各单位各部门各自为政，于是形成一条街的建筑风格不统一，颜色不协

调的尴尬局面。招徕批评最多的要数交通部大楼和全国妇女活动中心,这两座建筑设计者都采用了自认为满意的色彩,结果一个黑乎乎的,一个光亮亮的,两座建筑紧邻,形成极大的反差,非常不美观。

破坏城市色彩的行为还来自一种盲目的攀比,在当前许多店铺为提高档次,招徕顾客,纷纷装修门脸。特别是在老城区内的一些店铺,有的为了引人注目,不顾街道的整体色彩,片面追求豪华、奇特、艳丽,一些坐落在传统风貌街上的店铺,将铺面改装成铝合金门窗,大玻璃幕墙;有的还将原来的老式门脸改造成仿欧式样,有的虽保持着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但随心所欲,有的小饭馆修上垂花门,贴上黄琉璃瓦,使原来很古朴的传统街区变得形式纷乱,颜色各异,土洋混杂,缺少风格和特色,走在街上几乎体会不到古都的韵味,感受不到历史文化名城的风采。

北京的胡同有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典故。它蕴含着商业文化、市井文化、政治文化、饮食文化、会馆文化、梨园文化,它们中间蕴藏着前人奋斗的史迹,包含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历史变迁的遗迹,但是在经济大潮中,很多人难以舍弃炙手可热的大笔金钱,很多人不愿多投入,少回报,不愿为保护一座或几座有纪念价值的四合院,一条或几条有特色的街道而牺牲自身的利益,于是在各种理由中,老城区大片大片的建筑被推为平地,许多有价值的建筑还没有来得及论证,已成为一堆碎砖烂瓦。伴随着推土机的轰鸣声,老北京的遗迹越来越少了,许多人面对此情此景痛心疾首,说:50年代拆东四、西四、东单、西单的牌楼,60年代拆了老城墙,80年代拆平房,再拆老北京的魂就没了。多少人一提起北京的老城墙就惋惜不已,据说当年决定拆北京的城墙时,一位知名专家说:拆一座城楼如割我一块肉,扒一段城墙,象剥我一层皮,其对老北京的热爱之情是现在许多人不可理解的。

解放初期,西安市围绕古城墙拆与保的问题也展开了激烈地争论,但是西安市的决策者反复衡量最后选择了“保护”,几

十年后,当年决策者的英明决策给西安人民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西安的古城墙成了世界上目前保存得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城墙,仅这一景观每年吸引了多少旅游团,得到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当年决策者不曾预料到的。听到别人赞美西安的城墙时,凡是见过老北京和西安城墙的人,都说西安的城墙规模与老北京的城墙比起来差远了,当年如果不拆北京城墙,现在就是北京的一大景了。

历史是无情的,文物是失不可得的。当人们追悔之时,不是仍有人在做着令人日后追悔的事吗!“左宗棠故居”平了;顺承郡王府被迁了;朱彝尊故居被拆了;鲁迅先生写作《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的老宅险些在危改中消失。还有许多有建筑特色、有纪念意义的建筑面临即将被拆的危险。现在,房地产商们把开发的主要目标放在了城区,豪华的商业设施、高级别的大宾馆、国家级的重要机关、经济实力强大的办事机构都集中在老城区的繁华地带,于是原有的道路太窄了,周围的老建筑太破旧了。为了改造环境,为了实际需要,这些地区的道路不断拓宽,旧房子不断拆除,老北京的东西越来越少,这样发展下去,用不了太多的时间,北京城的面貌就会完全变了。如果以明、清城墙为基础的北京“旧城”的面目全非了,那么因为它们才被确定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北京也就名不符实了。

中国的经济一直较落后,改革开放以前北京的现代化建筑不多,街区狭窄,设施落后,改革开放终于给我们带来不可多得的良机,利用外来的资金,开发建设自己的城市,何乐而不为!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吃够了经济基础差的苦头,急切地希望抓住这个机遇,在自己任期内多引进一些项目,多开发出一些地区,多解决一些老百姓最关注的吃、住、行的问题。于是,可以带来眼前利益的开发项目受到重视,对保护文物则不太关心。尤其对影响开发这一地区的文物建筑更感到头痛,对公布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也不热心,曾有人出于既保护文物又不影响建设的良好愿望,建议专门开辟一块土地,将文物全部迁过去。

显然这些作法和想法是不利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确不但要看城市的历史,还要着重看这座城市是否保存着众多的文物古迹,是否保留着具有历史特色的城市风貌和格局。保留的越多越完整,整座名城的历史脉络越清晰,它的价值就越高。如果我们违背这一原则,使文物减少或迁离它特定的环境,这样文物的本身价值就会大大的降低,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色就会减弱,城市的文化内涵就会丧失。

北京早在商周时期就成为方国的都城,从金代起就成为统治全国的政治中心。在这千百年来的历史演变中,每个时期我们的祖先都在北京的土地上,留下了他们生产、生活的遗迹,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使北京具有了任何城市都不可比拟的内在魅力。这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是多少金钱也买不到的。人们大概至今还会清楚地记着1994年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日子,北京以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众多,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与其它几个申办国展开激烈地竞争,虽然最后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以一票之差落选,但是北京丰富的人文景观,从一开始就受到奥运会考察组成员的称道和赞赏。时间才过去了两年,北京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一些有价值的建筑被拆了、被迁了,一些反映北京民俗、民情的街区被夷为平地,一些重要的文物古迹被开发成有名无实的商业设施和游乐场所,北京的内在魅力已被大大的削弱了。美国哈佛大学华裔教授针对中国当前文物遭受破坏的现象指出:对于珍视人类历史的人来说,这种行为是个悲剧。我们确实要慎重对待祖先为我们留下的这笔财富。现在我们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在许多方面有很大的差距。也不可能在几年内就赶上和超过世界发达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再以牺牲北京的历史文化为代价,盲目去与发达国家争现代化,无疑是以己之短去比人家之长。

目前,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还不强大,发展事业的经费有许多需要外援,在合作

开发中,强调保护文物、保护古建,可能会给引进项目带来一定的影响,给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带来难度。但是为了后代子孙的利益,在开发的热潮中,我们每个人多一分冷静的思考,在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中我们的眼光放长些、远些,如果我们今天宁可少建几个项目而尽可能多的保护一些反映老北京内涵的文物古迹,那么多少年后,我们这代人的功过,历史会给以公正的评说。美国一位著名学者说:美国今天最现代化的东西,中国明天也会拥有,而中国的文物以及由文物而体现的历史文化名城,美国却永远也不可能拥有。这是多么深刻地认识啊!世界上确实有许多宝贵的东西是无法用金钱买到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悠久历史,一个代表这个历史进程的文物以及通过文物展现出的文化内涵都是金钱所不能买到的。北京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首,它的文化精粹集中在以明清城墙为基础的“旧城”内。我们曾多次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北京这个中国最大的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之中,但始终未能如愿,这里边除了政治因素以外,北京文物保护的现状不尽如人意,想必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如今在全国范围内,许多历史文化名城都面临着建设与保护的矛盾,国务院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国家文物局组织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管理者和文物专家多次研究对策,有些城市已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目前北京也正着手起草有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暂行管理办法》,北京的一些区县已把文物保护列入了城市改造的详细规划中。《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中对北京这座历史城市的保护和现代化发展做了深入地探讨,强调指出要从整体上考虑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问题。我们深信在全国提倡依法治国,依法治市的大好环境中,大家把总体规划当做法律来执行,北京地区盲目开发的势头会得到有效遏制,一个具有当代中国首都独特风貌的新北京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科研法规处处长)

文物工作者

在旧城改造中不能无所作为

董绍鹏

最近，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特别强调了要进一步加强博物馆文物征集工作的重要意义。广大文物工作者认为通知下达的及时、必要，指明了进一步加强今后文物工作的方向。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简称古建馆）保管征集部的同志，为了充实馆藏，并加强旧城区及旧城改造中文物征集工作，在人力、物力极为有限的情况下，集中地、有针对性地进行文物抢救性征集工作，在实地踏察和征集过程中，遇到许多矛盾与问题，迫使我们思考，对文物抢救与保护工作的迫切性有了深刻认识。

一、我们面临这样的现实

“危改”、“旧城改造”……诸如此类的词汇，近几年一下多了起来。对于普通百姓来讲，它们意味着旧城的住房、胡同、环境、街区、老邻居……在某种意义上的消灭殆尽。百姓的认识是朴素的，但是文物工作者的心情却是不平静的。无论怎样讲，旧城改造是一项造福于民的大事，文物工作者应该理解国家的苦心。

我们看到，确实有成片的反映了历史上的北京传统风貌民俗的街区从地图上抹

掉了；确实有不少反映了一定历史文化内涵的古建筑、民宅被推倒、碾碎；确实有不少不上等级、平凡无华，却在某一方面说明北京历史特色的实物（暂不称其为文物）被当成破砖烂瓦扔进了垃圾堆；确实在许多场所，在许多即将被夷为平地之处，一双双热爱故土的双眼中噙满了泪水，发出一声声无奈叹息。金融街危改区，拆掉了多少规规矩矩的大宅院，多少独具特色的门楼、砖雕、门墩、木饰被当做建筑渣土运出；椿树危改区，残垣断壁，犹如地震过后，几处区保单位好象不合时宜地鹤立鸡群；庄胜危改区，不用说旧的会馆，就是与“戊戌六君子”有关的建筑也照推不误……此次旧城改造，是继城墙推倒后又一次对老北京面貌的“整容”，面积之大超过历次，其后果将波及不止是一两代人。

二、回观我们自身

国务院的《通知》强调，要彻底改变文物工作软弱无力、滞后于发展的面貌。

长期以来，文物、博物馆界资金缺乏、人员配备不甚合理，从业者素质不高，对自身工作意义认识不足，有些人三心二意，朝秦暮楚，把文博单位当成了清闲疗养院，甚

至做为跳板。

资金缺乏,可以努力筹集,立项争取。人员配备不合理,可以理顺、调整。素质不高,可加强学习,促使提高。可怕的是缺乏真正愿意为文物工作奉献身心的工作者,缺乏对自身使命深刻理解的从业者。一些人自身如此殃及其他,亦造成文物系统难以为社会所广泛尊重,为其他系统积极合作之对象,令真心于文物事业的人员工作起来处处感到不应有的尴尬。

更为严重的是,地方保护主义时常作怪。一些地方明里暗里不与文博单位合作,宁可在事实上让某样东西烂在自家菜地,也不让它成长于他家花园。这种地方保护主义令博物馆这种依靠不断征集充实馆藏以达到展示研究目的之单位在工作中陷入困难局面。

三、紧迫的局面

旧城改造面积如此之大,文物部门要进行的工作之艰巨是可想而知。文物部门受人力,特别是物力、财力限制是事实,但同时出现的事实也是令我们回天乏术。

古建馆根据收藏展示需要,打算征集“懒凳”一对。经查找,得知西四北五条十三号门前有一对。我馆人员实地照了相,谁知

竟成该懒凳之绝照。还未待向西城的同志提出征集之事,该凳竟于96年末不翼而飞。后我馆同志征询了诸多老专家,查问他处有无,方知懒凳这一旧京最平常之物,而今已成京城稀罕之物了。我们后悔不已,但一切晚矣。

石敢当在旧时为挡灾、避邪之石,本为平常。但遗留至今具有一定造型特色、外观完整者不多,有些正在使用,难以征集。经群众提供线索,知宣武椿树上头条有此石,且正在危改,但待我馆人员到时,气愤地发现青石雕凿的完好的石敢当,已人为地被打碎。此处石敢当虽为一般文物,但正适合我馆做为标本采样。而此时,一切落空。

抱鼓石既有一定艺术特色,更在建筑上发挥重要作用。经群众提供线索,得知东城永康胡同9号有一对较为完整抱鼓石。待我馆同志持介绍信到达该地与居委会打过招呼后,一经查看,发现抱鼓石被抛弃于临街,其中一个石枕部分已人为被打断。多亏我馆人员及时征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地居委会大妈们说,你们早来就好了,早来还有很多,现在什么也没有了……

会馆界桩是一种极为普通的文物,但今天已少见。宣武琉璃厂附近有一界桩,我馆人员实地查看,附近居民说,不久前深夜,有人用锯切割界桩兽头,界桩被锯开



(九八年冬已被窃)
西城区西四北五条十三号 懒凳



宣武区椿树危改区现场

东城区永康胡同9号 抱鼓石
(已为古建馆收存)



宣武区后孙公园胡同“沔阳会馆地界”
标(石界桩)

(已为古建馆收存)



石界桩局部(黑色开口部分为文物盗
窃者的锯痕)

(已为古建馆收存)

1/2,我馆人员立即进行征集,为国家挽救了一件文物。凡此实例,举不胜举。

综合起来,总结出一条实实在在的“规则”;文物部门暗中调查可以,但不能向当地点明;如果点明,就要立即征集,否则象处于危改区或小巷内的小件文物极易“丢失”,而且多数是没有线索的“无头案”。

这是文物界一个窘境,许多东西明知是文物却不能点明,但不点明眼见文物因客观条件所限无法集中保护,而遭破坏,作为文物工作者又于心不忍。而最令人痛心的还是那些不够档次却反映一定问题的文物,无人理睬,无人认识它们的潜在价值,无人提出超前性的保护措施,而一旦认识了它们的价值再回过头去寻找它们时,或许已经来不及了,尤如几十年前的懒凳一样。

目前,古建馆的业务工作者已明确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思想上有了统一明确的工作意向。亡羊补牢,犹未晚矣。

四、使命感

所谓使命感,可以理解为对某一类工作极强的责任心。

作为文物工作者,具有对本职工作的责任心,是具有使命感的必备条件。在当前旧城改造及旧城文保工作中,我们认为首要的责任心是,作为文博工作者,为子孙后代尽可能地留下尽量多的文化遗产。无论有什么样的理由、借口,这一历史责任落在我们这些健在的人肩上,不容推托。毕竟,历史名城北京不能毁在我们健在的人的手里;历史名城北京不能徒有虚名,只留个空壳。而某些同志至今坚持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不愿面对现实,采取务实的灵活的文物工作方针,说到底,是想在这一关键的历史时刻采取听其自然、无能为力、无所作为的工作态度,从根本上说没有把一切为了文物为了后代作为工作的信条,是一种面对困难局面的逃跑主义。这不是真正的文博

工作者,是懦夫,在某种意义上说,更是历史的罪人。

古建馆业务人员在征集工作中,较为充分地与当地居委会等居民、政府工作人员交换对旧城文保旧城改造等问题的意见,绝大多数群众表现出热爱古都北京,热爱北京传统风貌的强烈愿望,并对市文物局博物馆采取的加大旧城文物征集力度的工作表示理解、支持和密切配合。许多年岁大的老北京说,老北京的东西没有什么了,再不收集,等到旧城拆完了,想找也没有了。一些群众深情的说,拍照吧,再不拍以后就拍不到了。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是我们古建馆同志工作的力量源泉。可以肯定的说,古建馆广大业务人员通过一段的集中征集,既在实践中锻炼了队伍,也在实践中积累了经验,增强了对文物工作的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

五、我们不能无所作为

旧城改造,是一项既定的大政方针,文物工作者一定要以积极的姿态、灵活的工作方法取得富有成效的工作成果,配合政府完成这一大事。去年,党和政府提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而爱家乡爱北京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内容。作为文博工作者,尽最大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为北京,为子孙后代尽可能地多保留下一些文物,就是对精神文明建设做出的最富有现实意义的贡献。而这一切的实现,从根本上说就是建立在对自身历史使命感的认识基础之上,它的实现与否决定着文物工作是否有所作为。

旧城改造是一个广阔天地,古建馆的广大业务工作者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大风大浪中锻炼队伍,使这支队伍成为全局系统内大胆肯干,勇于探索,敢于吃螃蟹,全身心投入到文物事业中去的急先锋。

(作者为北京古建馆保管征集部馆员)

圆明园遗址



《圆明园》遗址的 大墙、园门、沿墙水闸 勘察设计报告

侯兆年

一、围墙

1. 各园建墙年代

圆明园大墙是有统一规划的建筑,现存雷氏大墙图和说帖,详细记录了大墙外

围长度和规模。圆明园墙外围长度为 2004 丈 3 尺,折合 6413.7 米^①。造墙年代说帖未记,但均在大规模造园同时建墙,皇帝正式驻园前建成。史载雍正三年(1725)圆明园成立健全的保卫系统^②,同年圆明园各殿匾名表辑成^③,正大光明办公区建成,雍正正式进驻圆明园办公^④。因此大墙建成年代应在雍正三年之前不远。

乾隆十一年(1746),长春园全面动工。乾隆十二年,做成长春园匾86面^⑤,沈源奉旨绘长春园全图一张^⑥,说明此时大墙已建成。据遗址实测图计算,长春园大墙长度为3754米。

乾隆三十四年(1769),春和园收为御园并改名绮春园,并作御笔“绮春园”匾挂^⑦,由圆明园派员管理,并于第二年添建宫门^⑧。绮春园原是赐园,由几个小园组成,各自有院墙。收为御园后,理应于添建宫门时将园墙接补完毕,绮春园大墙至少在乾隆三十五年前建成。据现存史料,绮春园外墙长1156丈7尺2寸,合3701.5米^⑨。

圆明三园在扣除各园之间的夹墙,绕圆明三园一周外围墙长为11170延长米,即11公里多。

1860年后,仅有英法联军焚烧大宫门、东大门的记载,没有拆墙记录。同治年间仅初砌一段^⑩,未见有大规模修墙记录,说明大墙因坚固和不易燃烧可保留较久。大规模拆墙是清王朝灭亡后,全园无人管理,军阀军队拆墙盗卖,教堂也大量盗运大墙砖。本世纪三十年代,将北大墙、西大墙全部拆毁^⑪。以后几十年人们不断拆毁,到现在仅余残墙200多米,都残破不堪,多为农户院墙才得以幸存,成为圆明园大墙遗址。

2. 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三园墙布局形式

据现存雷氏大墙图和遗址图可知,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三园建园年代不同,各园大墙都自成系统,将三园分割成独立园林。圆明园与长春园由明春门、绿油门和蕊珠门连接。绮春园因是清皇族和后妃的住园,因此相对独立,无正式门与其他两园连接,仅留臣工出入的小门,如茜园门通长春园,秀清门通圆明园。圆明三园内又有许多独立小园,由于建立年代不同和安全要求,小园之间也有围墙相隔,各自独立。全园河渠湖泊彼此沟通,将全园连成一体。

圆明园大墙,据雷氏图示,仅南面宫门两边单墙,西墙、北墙、东墙均为复墙,两墙之间的夹道约12.6米宽,供八旗禁军巡逻,以防外人越墙。北面紫碧山房和鱼跃鸢飞景区各有围墙相隔,这道墙与北大墙平

行并横贯东西,成为北面第三道大墙。

长春园南墙为单墙,东墙、西墙、北墙均为复墙。北面西洋楼景区用一条与北墙平行,横贯东西的围墙相隔,又成为长春园的第三条围墙。

绮春园,由于成为御园较晚,又是皇室住所,地处两园之南,有圆明、长春两园成为北面屏障,因此绮春园四周均为单墙。绮春园由若干建于不同时代的小园组成,小园之间有围墙相隔,全园没有统一的建设布局,因此绮春园大墙曲折多角,很不规整。

3. 大墙作法,材料组成的考证与现状

根据史料记载,圆明三园大墙均为虎皮石墙^⑫。由于地势低洼,多年积水,加之大墙为取直,不免要穿过河塘沼泽,为保证在各种地形条件下大墙基础坚固,大墙基础第一步是向地下打柏木钉,作用如同今天打地桩。柏木含油,浸在水中百年不腐。一般旱地每见方一丈用144根,河身水槽每见方一丈用196根^⑬。柏木地钉分为一丈、八尺、五尺,头上砍尖,用木锤打入地下^⑭。在柏木钉上筑打三合土,三合土配料为白灰、沙子、砖面、江米汤、白矾,比例严格^⑮,三合土基础至今坚固。在三合土基础上砌虎皮石墙,粘合剂为白灰及少量黄土和麻刀^⑯,在墙石缝间用青灰作梗^⑰。

大墙作法有两种,一种是宫门两边大墙,作法讲究,形式为带冰盘檐、筒瓦顶、圈方的看面墙^⑱。另外多为虎皮石墙,墙顶二面一层拨檐砖,两坡顶抹青灰^⑲。

遗址现状调查与史料一致。在北大墙找到一个大墙三合土基础断面,经测厚1米,宽2米,三合土十分坚固。在正觉寺山门西边留有18米长的残看面墙,与史料记载一致。在101中学西墙留有一段虎皮石残墙,灰梗清晰,与史料记载一致。在正觉寺东墙残留一段带顶残墙,为二面一层拨檐沙滚砖,上抹青灰两坡顶,与史料记载一致。

4. 大墙遗址现状调查

为保护圆明三园,1985年国家投资40

万元复建了长春园北墙和东墙及绮春园东墙,并复建了绮春园宫门作为圆明园正门。其中长春园北墙是原外墙基础复建,东墙外墙基压在马路下,是内墙基复建。绮春园使用原墙基础。现新修大墙为虎皮石墙,平均高2.8米,下宽0.8米,上宽0.6米,青灰梗,顶为二面拨檐砖青灰两坡。经多年日晒雨淋,与旧墙十分相象。

现从新建宫门向西沿原墙基础分段调查报告:

第1段从绮春园新建宫门向西到正觉寺东墙110米。这段为1985年复建墙,墙高3米,厚0.8米,二面拨檐砖两坡灰顶,并在宫门西留一两砖垛工作门。1985年新修大墙到此为止。

第2段正觉寺山门前区山门东为长城锅炉安装厂,西为长城金属加工厂。寺山门仍保留,山门东段留一段5米看面墙,其余全毁,基址上为厂房和车库。山门西留有一段八米长看面墙,筒瓦冰盘檐,墙体瓦面损坏严重。现工厂将厂墙从山门向南推9.5米,正觉寺墙全压在工厂仓库下。

第3段从正觉寺大墙基础向西南延伸300余米向西拐止。这段大墙全无,墙基址上是沿马路的商店和单位计有海淀干鲜果品公司,成都绿仙阁酒家等16个单位^②。

第4段基址西为上段拐角,东到东北义园向北拐共280余米。北墙东段基址上是京侨大学、西苑医院精神伤残儿门诊部、洁秀洗染店。西段是101中学大门,大门两边用原墙基础复建虎皮石墙作为校院墙。

第5段为南北墙,南为101中学复建墙,北为一片农田,长300余米。这段墙大部分无存,仅墙基础南端有一房以原墙为房后墙,保留了20米残墙,为虎皮石砌,素麻刀青灰梗,墙顶无存。从此向北大墙全无,原墙基石全部挖走,但基础因土质不同,轮廓清晰可见。园内因挖湖堆山,墙拆后仍留有1.4米的内外高差,墙拆后堆土边缘清晰,估计破坏时间不长。

第6段从遗址图看,这是一段东西130余米墙。由于开山造田,原墙基址大部分破坏。但到基址西部因一农家以大墙作院墙保留22米虎皮石墙,残高2米,厚0.8米,

成为这段遗址的标志。

第7段基址从运料门到西爽村门,南北走向170余米。这段基址残墙保留最多。基址南段是圆明园149号住户,使用原墙作院墙得以保留16.8米残墙,残高2米。运料门在此残墙处,基址大部分压在住宅下。沿墙基址向北有一大墙向东拐角基址暴露村中土路上,边缘清晰,测宽为0.84。沿基址向北是一段保留较完整的南北大墙,残墙长约80米,高2.4米,因作为101中学的院墙才得以保存。大墙上皮平直,拨檐砖与青灰全无,但从平直上皮可看出是拨檐砖处,因此墙高尺寸可靠,加上两坡顶大墙高应为3米。

第8段按遗址图这里是西爽村门遗址,但门与墙基址全部压在农户宅下。

第9段东西向大墙基址,长250余米。作为101中学院墙得以部分保存,但残破不堪。残墙长约150米,墙外住户以此墙为院墙。

第10段为南北向大墙基址,长150余米,留有残破原墙70—80米,多作为民宅院墙保留下来。

第11段遗址图上为东西大墙,长约90余米。现墙基压在一条水泥马路下。绮春园墙基址在此向北接上圆明园大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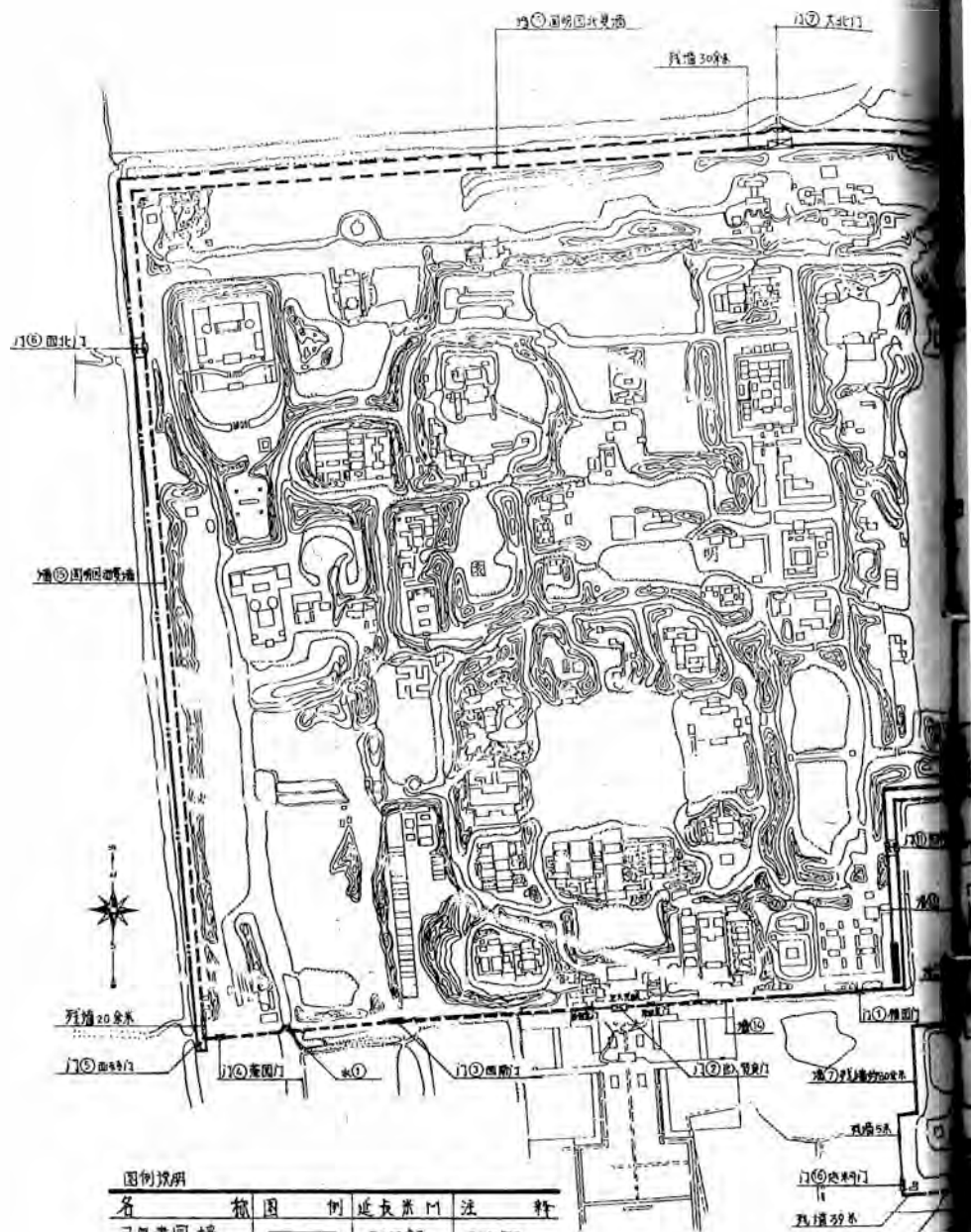
第12段是圆明园东西向复墙,东到秀清村门,西接东楼门拐角,长600余米。

此段复墙内墙地基完好,地面残留一米高残墙作为马路挡土墙使用,测得墙厚0.9米,距马路4.4米。复墙外墙地基全部压在马路下。

第13段是圆明园南北复墙,北接东楼门拐角,南接福园门拐角,长300米。

此段墙基均压在村宅下,无法进行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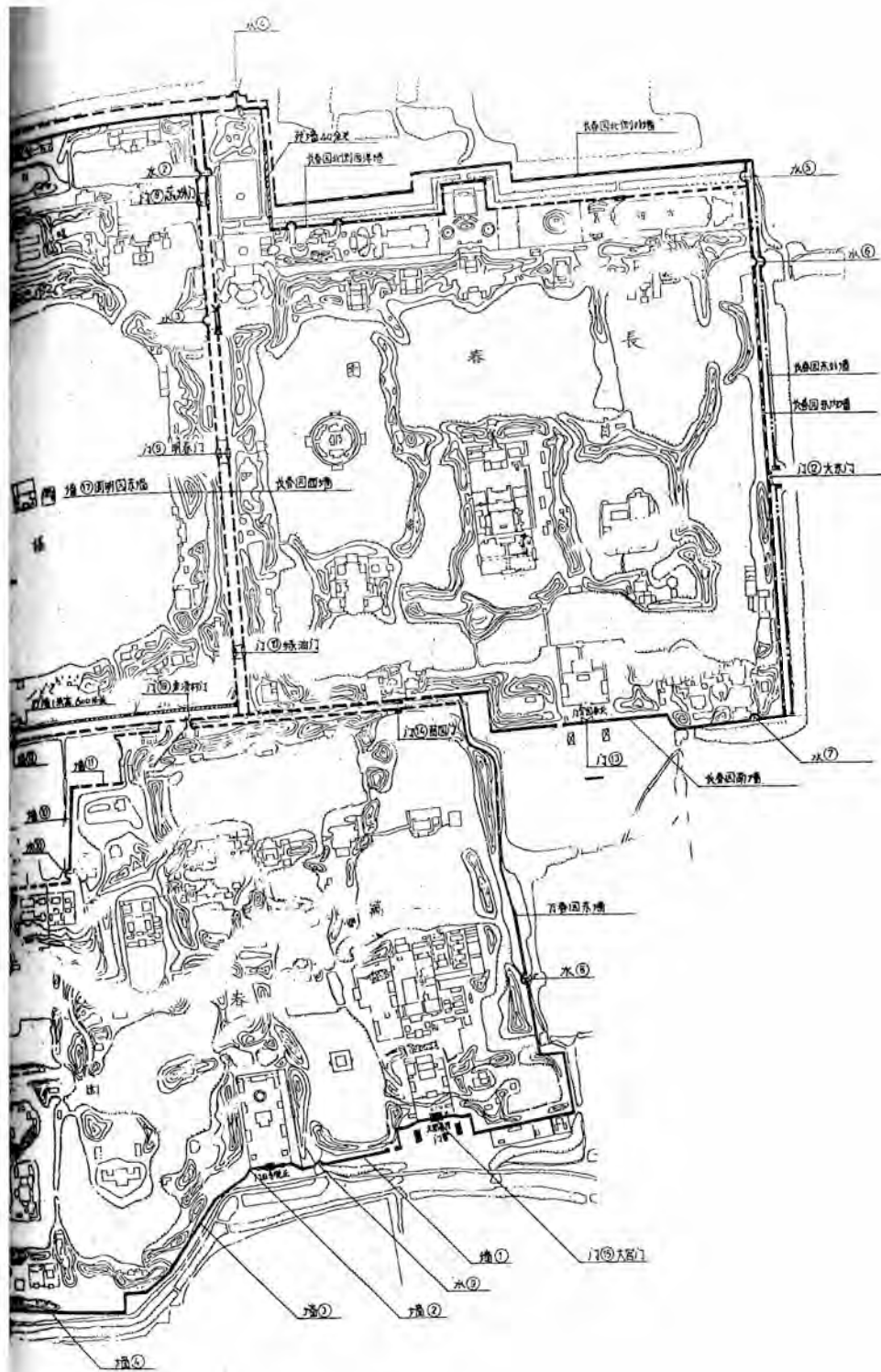
第14段为圆明园南墙遗址,是东西向单墙,东为福园门,西到藻园门,大墙穿过出入贤良门和西南门遗址,长1000余米。现状大墙遗址东半部为一村落,间有农户以原墙作院墙,得以保存部分残墙。大宫门区全部被破坏,现在是一片水田。出入贤良门遗址为一片洼地,基址被破坏。大墙遗址西半部残墙全无,地基仍完好,大部分没有



图例说明

名	图例	近处米	注	释
已复建国墙	——	3400余米	日5年复建	
增建残垣	——	10000余米	元增建	
残垣地基	——	200余米	平均高2米	
压在现在山麓原址	——	1800余米	有残垣即复建	
压在现在山麓原址	——	2000余米	复建困难	
水闸、水门遗址	——	4处	遗址不详	
宫门、随墙门遗址	——	17处	遗址有详	
已复建宫门或原有门	——	2处	八角门、正德山门	

圆明园遗址



现状平面图 1:4000

房屋压盖,现为农田。此墙遗址西为藻园门遗址,现压在西苑建材仓库下。

第15段围墙是圆明园西墙遗址,两边与南北墙相连的复墙,长1200余米。复墙外墙基址压在西苑至农大的马路下,内墙基址现为路边绿化带,保存完好,没有大量房屋压盖。内墙基址南部留有一段长22米,宽0.74米,残高1.3米的残墙。

第16段基址是圆明园北墙基址,为东西向复墙,东段遗址与万花阵85年建墙相接,西边到362路小清河站与西墙基址相连,全长1700余米。这段大墙外墙基础完好,基础上为一条焦渣土路,路面间有露出外墙基础,边缘清晰。内墙基础在圆明园绿化带里,保存完好,无房压盖,两基础间距14米,绿化树浓密。内墙基础延伸到大北门有一段30米长内墙作一民宅后墙保留下来。外墙基础被农民挖的排水沟挖断,形成一清晰基础断面。测得为宽2米,厚1米三合土基础,非常坚固,可为复建墙基础设计依据。

第17段基址是圆明园与长春园两条并行南北大墙,东墙为长春园墙,西墙为圆明园墙。这两条大墙基础完好,地上均留有半米高残墙作为保护马路的挡土墙,为复建提供了可靠依据。

5. 此次修复大墙方案

此次修复大墙,以修复圆明园本园大墙为主。同时修复绮春园西墙和南墙,最后同85年复建大墙相接,使园之外墙连为一体,将圆明三园围成一园,统一管理起来。根据史料和现场勘察,大墙基础大部分未被破坏,很很坚固,可作为复建大墙基础。破坏部分可参照原基础处理方法复建。

绮春园为单墙基础,从正觉寺西墙沿原基础进行复建。对保留的残墙,经过勘察非常坚固,原则上不动,保留现状。复建时用红机砖砌一层与复建墙相区别,残墙两头用红机砖砌一层与复建墙分割,以作出与复建墙明显不同的标志,绮春园墙在秀清村门处与圆明园内墙连接。

圆明园大墙从秀清村门处沿内墙基础向西复建,因外墙基压在马路下,再沿内墙

基向南复建到圆明园南墙。圆明园南墙按原墙基础复建,在出入贤良门和进水闸处分别作遗址保护。圆明园西墙沿内墙基础复建,因外墙基础压在市政干线下,复建有困难。西墙南端有长22米残墙,仅高1.3米,在残墙上皮用一层红机砖砌一分割线,上复建虎皮石墙,使残墙与复建墙分别一目了然。圆明园北墙为复墙均复建,北大门处有一条长30米,高2.8米残墙。保护这段残墙用红机砖砌一层分割线,两头用红机砖砌出分割标志以示区别。北大门因遗址挖掘有困难,暂作遗址保护。北大墙沿基址向东复建同85年复建大墙连接。

二、沿墙门及水闸

圆明三园各自独立,每园有大小不同、功能不一的门,现分别报告调查结果。

1. 圆明园沿墙共有门10个,从东向西依次是:(1)福园门,(2)出入贤良门,(3)西南门,(4)藻园门,(5)西北门,(6)大北门,(7)蕊珠门,(8)明春门,(9)绿油门,(10)东楼门。

福园门(门1)位于圆明园东墙角,建于嘉庆十四年(1809)^②。是当时一个作用重要的门,因距大宫门最近,大宫门为礼仪门,出入多有不便,因此福园门成为去办公区的主要通道,连外国人均要出入此门^③。1860年福园门未被焚,但门扇被砸坏^④。同治十三年(1874)年重修,据重修史料记载,福园门沿墙有一座门罩,两边值房四间^⑤,同雷氏平面图相符。现基础压在民房下无法清理。根据史料和雷氏平面图所绘基础,参考同时代园林门罩形式,此次仅复建沿墙门罩,拟建形式为清式硬山筒瓦两坡顶门罩。

出入贤良门(门2),又称圆明园二宫门,位于圆明园南墙正中,建于雍正三年(1725)^⑥,咸丰十年(1860)被英法联军焚毁^⑦。同治十二年(1873)八月初盖。补盖出入贤良门面阔五间,两边朝房各五间,东西各设一门罩供臣工出入,详细尺寸全有记载^⑧。现在此门无存,基础破坏严重,原门基石全部挖走,在基址处形成一片洼地,另一

部分基础压在民房下无法清理。由于遗址破坏严重,无法得到原门基尺寸,此次不准备复原此门。为保护原门遗址,圆明园大墙复建到此处时断开,作遗址保护,为今后留下明显标记。

西南门(门3)位于大宫门以西,是出入“山高水长”的门,也是官员和臣工主要出入的门^②。1860年未被焚,但被砸坏门扇^③。同治十三年重修,据清工程资料记载,沿墙也有一个门罩,两边八间值房^④。现地基全部破坏,原西南门基础处为一片低洼农田。此次拟据史料复建一清式硬山筒瓦门罩。

藻园门(门4)地处圆明园西南角,1860年未被焚但被砸坏门扇^⑤。光绪二十四年修。大门形制据史料记载是一个下肩虎皮石,上肩大城砖,筒瓦带过木硬山门罩。现遗址压在西苑建村仓库下,无法清理。拟按光绪二十四年(1898)雷氏档案记载形制复原为清式硬山筒瓦门罩。

藻园门以西有两个门,史料称“西砖门”(门5),是八旗禁军出入西墙复墙巡道的门,现位置在南墙西头外,遗址压在工厂下无法清理,此次建墙也不涉及,因此不做考证。

西北门(饽饽门)地处圆明园西北角(门6),是入园农夫进出的门^⑥,1860年未被焚,但被砸坏^⑦。门的形制据乾隆五十七年(1792)修缮记录为一悬山大木筒瓦门罩^⑧,现基址压在市政干线上无法挖掘,大墙通过时作遗址保护。

大北门位于圆明园正北(门7)是圆明园北大门,1860年未焚但被破坏。从雷氏图谱中可看出为内墙门为两层,下为虎皮石砌城台,东西两侧马道,上层为面阔五间的门楼,外墙为向北突出八字墙中为一三间大门。从彩绘本圆明园四十景图中鱼跃鸢飞景可看出内墙北大门是两层门楼,下为虎皮石城台。从《御制圆明园图咏》(黑白版)中可看出虎皮石城台上为五间卷棚歇山筒瓦门楼,前后出廊,两本图谱细部出入正好绘出北大门原貌,与雷氏所绘平面图吻合。现北大门遗址破坏严重,原遗址现存1.2米厚三合土基础,边缘不清。现存三个柱础已移位,柱础测得:鼓径460毫米、边

长700毫米、厚360毫米。外墙门雷氏平面图为三间大门,但现在基址全部破坏,无法清理,此次不在复建之列,因此拟计划大墙在此断开,作遗址保护。

蕊珠门位于圆明园东北角蕊珠宫东(门8),通长春园西洋楼区,雷氏图示为两园墙各一门罩,1985年复建长春园大墙时,通向长春园的门罩没复原,大墙从基址上穿过。1993年6月对在圆明园墙的蕊珠门进行清理,清理一完整门罩基础,阶条石,部分踏跺垂带,散水仍完好,测得长5.1米,宽2.5米。门罩形制可从郎世宁所绘长春园西洋铜板画二十图《万花阵花园》图中可看出跨长春园墙上的蕊珠门为一硬山筒瓦卷棚门罩,两边与虎皮墙相连。因铜版画是西洋楼竣工图,建筑形象可信。现拟以遗址地基尺寸为依据,以《万花阵花园》图为形制,在原基址复建一硬山筒瓦门罩。

明春门(门9)位于圆明园与长春园交界处,横跨圆明园东墙和长春园西墙,是两园主要通道。建于乾隆十三年(1748),(见雷氏档乾隆十三年七月传旨做御笔“明春门”匾额)。原建明春门形制见道光二十四年(1844)拆改文件和北京图书馆藏雷氏图可知,门楼为三卷楼九间,两边有踏跺。同治十三年修北门之前彻底拆改,门基础挖出道路垫平。经寻找幸得北京图书馆藏同治十三年(1874)重修明春门的雷氏工程图,可知明春门形制。改后明春门为两园墙上各一门罩,两门在一条轴线上。雷氏图说帖记载了两门详细尺寸^⑨。1993年6月5日两门基础清理出,台基埋头石完好,虎皮石台基边缘清晰,但阶条石被挖走。经测每门台明长5.15米,宽3.2米,两门相距12.6米,同雷氏图相符。从体量看可为筒瓦歇山带冰盘门罩一间。此次以遗址为基础复建两门罩。

绿油门(门10)位于圆明园东墙南,通向长春园。现长春园门基址上建一办公小院,无法清理。雷氏平面图为两园墙各一门罩,从功能分析后应比明春门小。此次可按蕊珠门形式复建两个硬山筒瓦门罩。

东楼门(门11)位于圆明园东南,福园门东。嘉庆元年(1796)《和珅等奏销算西峰

秀色等处员工银两摺》记：“福园门内东边粘修随墙门口一座，挑换木植，拆砌墙顶、门腿，以及油饰等项……”。可认为东楼门为一随墙门。现基址上是农舍，无法清理。拟按史料复建一清硬山筒随墙门罩。

2. 长春园沿墙门有六个，蕊珠门、明春门、绿油门是三个通圆明园的门，形制两园一样，刚才已涉及。另外还有大东门、长春园宫门、茜园门。因1985年修东大墙时无力修复，大墙从遗址穿过，此次修复也不涉及，但也认真作了调查，报告如下。

大东门(门12)位于长春园东墙，1860年英法联军焚毁，据咸丰十年(1860)内务府大臣明善奏本：“大东门于八月二十三日焚烧。”《日下旧闻考》辑《长春园册》：“由鉴园北山径折而东为东宫门，楼宇上下各七楹，东向。南北朝房各三楹”。据雷氏平面图所示大东门为七间门楼，坐西朝东，内墙与门楼相连，外墙在门楼南北两边与内墙相连封口，门楼两边各三间值房，与《长春园册》所载相同。现状长春园外墙基础压市政干路上，大东门基址压在1985年复原长春园内墙下。1985年砌长春园东内墙时在东大门基址留一缺口准备复原，未办成。现缺口作与1985年复建墙明显不同的石料封堵以示区别，待条件成熟后清基复建。

长春园宫门(门13)位于长春园南墙，澹怀堂南，与澹怀堂共用一门。据清《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记：“长春园当差园役人等，俱由澹怀堂右门出入”。长春园宫门两边各有左右门一，可认为长春园宫门与澹怀堂门为一门。建成年代为乾隆十二年(1747)。据雷氏档案记载，乾隆十二年(1747)正月传旨做御笔“澹怀堂”匾额，于当年六月十五日做成。同年六月传旨做御笔“长春园”匾，九月十六日挂讫。因此判定长春园宫门建成年代为乾隆十二年(1747)。1860年未被焚。建筑形制据《日下旧闻考》《长春园册》记：“长春园宫门五楹，东西朝房各五楹”。与现存雷氏平面图一致。现存基址压在1985年新建大墙附近。1988年为开亚运会修长春园南马路时，因考虑原马路压了长春园宫门基址，新路向南移100米，让出基址。现长春园宫门基址

上为一停车场和旧马路，无法清理。此次修复不涉及。

茜园门(门14)位于长春园西南角，是通向绮春园的小门。原基址全部破坏，仅留一小石桥以确定两门位置。据雷氏图示茜园门是长春园、绮春园两园墙各一随墙门罩。茜园门在1985年修东墙时已围进圆明园，此次修复不涉及。

3. 绮春园有四个门，绮春园宫门、运料门、西爽村门、秀清门。绮春园宫门1988年复建。现分别报告：

绮春园宫门(门15)位于绮春园南，现恢复成为圆明园正门。建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⑨，后经过多次添建重修才成为今天规模^⑩。1860年未焚，但遭破坏^⑪。同治十三年(1874)重修时，此门毁坏不大，仅揭瓦、换檐椽和飞椽。据当时工程资料，绮春园宫门为五间八檩卷棚歇山顶，两边各一门罩^⑫。民国年间，香山慈幼院计划在成府建香山中学，便从颐和园事务所之润贝勒手中，将绮春园宫门全部低价买下，拆至成府香山中学地基内存放，后因故未建，而绮春园宫门全组建筑和大片栢林全部消失。此宫门1988年在原基址复建。

运料门(门16)位于绮春园西墙，1860年未被焚，但门扇被破坏^⑬。调查随访得知，此门因一农户使用保留至七十年代，后拆除将大门城砖盖民房用去，现民房所用砖上砖款可见《信康大城砖》《运河窑细泥》字样。基址附近可见两块阶条石，但大部分压在民房下无法清理。幸得一照片可知为一硬山卷棚筒瓦门罩，两扇穿带大门。此次按此照片在原基址复建一清硬山卷棚筒瓦门罩。

西爽村门(门17)位于绮春园西北，据《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记：“嘉庆十三年(1808)军机大臣奉旨：西爽村著仍称绮春园宫门。嗣后一切称谓书写，俱不得再有西爽村门字样”。西爽村门位于绮春园西，又称西宫门。又据《则例》记：“绮春园当差园役人等，点名后俱由绮春园西宫门出入”，可知是个园役当差人出入的小门。现门基址全压在民房下，无法清理。雷氏图示为一随墙门罩。此次拟在原基址复建一清

式硬山卷筒瓦门罩。

秀清村门(门18)是绮春园北门,因通向圆明园秀清村而得名。雍正八年(1730)《内务府造办各处作成活计清档》首次出现“秀清村”字样,估计门建造年代与此不远。从雷氏平面图可看为两个门罩,分别跨在圆明园、绮春园围墙上。《圆明园图咏》别有洞天图(秀清村后挂“别有洞天”匾)中绘秀清村门为一随墙门罩,筒瓦悬山大本木下有槛墙。现地基上为马路,无法清理,此次修墙将门围在园内,不作修复。

4. 圆明园水闸共有三座,据雷氏《圆明园河湖水系图》所示,圆明园水源来自玉泉山,流入圆明园,流出长春园。为一个进水闸,二个出水闸。进水闸(水1)位于藻园东,现遗址完全破坏,只能看出原水系轮廓。因原水系已完全废弃,此闸失去作用。本次修复大墙待挖掘后作设计。出水闸(水3)为五孔闸,现仅余二孔并使用。此次修复大墙暂作遗址保护,另一出水闸为蕊珠门北的一孔闸(水2),已废。基址被破坏,泊岸石与闸口石堆在一起。因水系已废,不复建此闸,大墙穿过时亦作遗址保护。

长春园现有水闸六座。万花阵西一孔闸,已废,1985年修墙时用水泥过梁从基址上穿过(水2)。万花阵北一孔闸(水4),现完好1985年修长春园墙时,墙穿过做闸石归安。现法墙北闸(水5)遗址全埋在墙下。西洋楼东七孔闸(水6),现作用已废,遗址破坏严重,原水系轮廓还存,在原基址处可见堆放的泊岸石和三合土基础。1985年修东墙时为保护遗址,大墙在此断开,用铁栅穿过七孔闸遗址。长春园南如园闸(水7),基址无存,1985年砌长春园南墙时遗址完全破坏,无法复原,现大墙从基址穿过。

绮春园有三个闸,进水闸、二孔闸和如乐轩闸。进水闸(水9)在正觉寺东,原闸在修1985年大墙做闸石归安,现一水泥过梁穿过原闸,上砌大墙。此闸现为圆明园公园入水口,仍使用。敷春堂东二孔闸(水8),现仍使用,1985年修大墙时做归安,现大墙按原貌从闸上过梁石砌过。如乐轩闸(水10),此处水系已废,原遗址处为一村庄无法清理遗址,此次在修墙时待挖掘后再作设计。

①据现存北京图书馆雷氏圆明园图说帖记:“北面大墙长五百二十八丈九尺,西面大墙长三百七十五丈,南面大墙长六百十五丈六尺,东面大墙长四百九十四丈八尺”。

②崇贤《圆明园营志详考》记雍正二年“本年设立圆明园八旗,管领3232人,专司旗卫圆明园之责”。雍正三年“本年增设包衣三旗,管领131人,归圆明园八旗印房统领,亦负圆明园护卫之责”。

③杨乃济辑《圆明园大事记》记“方裕谨辑《圆明园各殿座匾名表》”。

④《清实录》:“朕在圆明园与宫中无异,凡应办之事,照常办理”本年雍正御制《圆明园记》:“即位三年,……此圆明园之规模当已大备;宫门区、正大光明、勤政亲贤各景皆已建成”。

⑤⑥乾隆十二年《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活计清档》。

⑦乾隆三十四年《活计清档》。

⑧乾隆三十五年《活计清档》。

⑨雷氏《绮春园大墙诸旗尺丈图》。

⑩同治十三年《发放工程银两咨文》:“补砌圆明园北面大墙,长三十丈。”

⑪杨乃济辑《大事记》1921年“十月,十六师军人数百人,大车数十辆,拆毁北大墙,饽饽门(西北门)大墙,盗运砖块”。1922年“九月,十三师军人拆毁西大墙,盗运砖块私行售卖”。1923年“五月,西山天平沟教堂派人拆毁西大墙砖块,用大车盗运”。

⑫《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圆明园等园坍塌虎皮石大墙内,除新砌大墙著原承砌人员赔偿外,其余大墙派员及时成砌”。

⑬清抄本《圆明园工程则例》“地脚刨槽下柏木地丁,如旱槽每见方一丈用地丁一百四十四根,河身水槽每见方一丈用地丁一百九十六根”。

⑭清《圆明园工程则例》“下长一丈柏木地丁每根工价银三分,下长八尺……”。“锤下长一丈柏木地丁每根工价银一分”。“以上柏木地丁砍尖,每丁一百五十四根用木匠一工”。

⑮清《圆明园工程则例》“三合土墙每丈用白灰六百斤,沙子三百斤,砖面三百斤,江米八合,白矾十二两八钱”。

⑯清《圆明园营造则例》“虎皮石墙高二尺五寸见方一丈用白灰一千八百六十斤,黄土一分二厘五毛,麻刀十二斤八两”。

⑰光绪二十四年《圆明园内观澜堂找补大墙平垫山道单》藻园门“两山外原有虎皮石大墙两段,外皮下肩找补灰梗”。

⑬雷氏同治十三年四月十二日档案：“此大墙着改修看面墙、圈方、黄心、冰盘檐、筒瓦顶，照万春园宫门墙两边式样”。

⑭乾隆四十五年《英廉等奏销算韶景轩等处工程银两折》：“绮春园，内成砌坍塌墙垣五段，凑长十八丈八尺五寸，二面抹饰拨檐沙滚砖一层，顶抹青灰”。

⑮压大墙基址的各单位有：海淀干鲜果品公司、海澄汽车配件商店、北京振大旅游鞋有限公司、中国青年科技发展中心技术信息部、海淀京苑建材商店、惠乐酒家、飞云公司、飞云公司五金建材批发商场、成都绿仙阁酒家、文军实业公司、云峰建材、恒通汽车配件。

⑯据嘉庆十五年内务府堂呈稿记，嘉庆十四年：“绮春园添建宫门、勤政殿、烟雨楼、涵秋馆、茂悦精舍以及圆明园内舍卫城、方壶胜境、福园门、小马圈等处殿宇”。

⑰《钦定总管内务府则例》记：“年例同乐园办理庆丰图，本处并外项执事人员俱点各后由福园门出入。晾船水手，网户人等，令该管达他带领由福园门出入。茶膳房官员带领人役点各后由右门及福园门出入。如意馆匠作及西洋人等，由福园门出入”。

⑱见《明善奏查得圆明园内外被抢被焚情形折》。

⑲大门形制据同治十三年清《发放工程银两咨文》：“福园门门罩一座，板房二间，值房四间，粘修”。

⑳杨乃济辑《圆明园大事记》册《起居注册》。

㉑英人著《1860年在中国的战争》、《咸丰十年明善奏查得圆明园内外被抢被焚情形折》。

㉒同治十三年清内务府《已做活计做法清册》记尺寸如下：

出入贤良门一座五间补盖；内明间面阔一丈二尺，四次、尽间各面阔一丈一尺，前进深一丈六尺，后钻金廊深七尺，通进深二丈三尺。檐柱高一丈二尺，径一尺一寸。南北八檩卷棚歇山顶，大木齐。台基面阔六丈一尺六寸，进深二丈八尺六寸，高二尺一寸五分，仅踏跺未安。屋顶头停齐，未调脊尺瓦。两山顺山朝房二座十间补盖；各面阔一丈，进身一丈二尺。檐柱高九尺，径七寸，五檩外卷棚挑山顶，脊瓦一部齐。左、右门罩二座，清理台基，运出渣土。

㉓据《钦定总管内务府则例》记：“西厂子预备烟火技艺筵宴”外藩并执事人员，俱由西南门出入。太医院官员并懋勤政（殿）匠役人等，俱由西南门出入。”

㉔《咸丰十年明善奏查得圆明园内外被抢被焚情形折》。

㉕同治十三年《发放工程银两咨文》记：“西南门门罩一间揭，门楼一座拆修头停，值房、灰棚八间，并院墙门口二座拆修”。

㉖据雷氏档案光绪二十四年《圆明园内观澜堂找补大墙平垫山道单》记：“藻园门一座，门腿下肩原砌虎皮石找补灰梗，上身大砖磨饰见新，头停满刷脱掇节，周围过木外皮油饰红土油。两山外原有虎皮石大墙两段，外皮下肩找补灰梗”。

㉗同前《明善奏本》

㉘《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嘉庆六年三月奏准圆明园内外出入规定：“园内应进供桌泉水井喇嘛、种地庄头、农夫俱点名后由西北门出入”。

㉙建筑形制据乾隆五十七年《和珅奏销算方壶胜境等处员工银两折》记：“西北门门罩一座一间，拆头停，大木挑华拔正、挑换枋、垫、椽子、满换望板、傅缝板、连檐、瓦口、戢木，拆砌槛墙”。

㉚明春门说帖拟改修门楼二座各台基面阔一丈六尺一寸，进深一丈，门腿高一丈二尺三寸五分，台明高一尺四寸。门里口高七尺三寸，宽七尺二寸。拟添修甬路。拟添盖更房二座各二间各面八尺各进深一丈各柱高七尺五寸台明高一尺。

㉛雷氏档案乾隆三十五年“传旨做御笔《绮春园》匾挂记”。

㉜据《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嘉庆十四年呈准，绮春园新建宫门修理完竣”。又清内务府《呈堂稿底》：“道光十四年绮春园添建宫门”。

㉝《明善奏本》同上。

㉞同治十三年《各座已做活计做法清册》：万春园（绮春园）“大宫门一座五间揭，内明间面阔一丈二尺，二次间各面阔一丈一尺，二尽间各面阔一丈，进深一丈八尺，外后廊深八尺，檐柱高一丈二尺，径一尺，八檩卷棚歇山顶，查已挑换檐缘五成，飞椽七成，头停已妥，瓦片换新七成。左右门罩二座揭，看墙凑长二十三丈八寸，随门口二座，粘修齐”。

㉟《明善奏本》同上。

（作者为北京古代建筑研究所书记、副所长）

也谈——

《重建龙泉大历禅寺之碑》

——的年代

言之

《北京文博》96 第三期刊登了杨亦武氏《重建龙泉大历禅寺考》一文,对房山区龙泉大历禅寺的创建年代、创建人以及重建年代作了详尽的考析,条理分明;言之成理。解决了寺的创建年代和创建人的问题。对寺的重建和立碑年代虽也论证清楚,但是资料似嫌不足,仍须扩大探索面,以确证寺之重建和碑之树立年代的无误。兹仅据杨氏文章所附排印的碑文提出个人一些看法。

一、从碑文所载背景来推测其时代

碑文有关事件的记述,比较隐晦,纪年只用干支,不涉朝代,极易造成不同的理解,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碑文载:“适值干戈四起,廊庑一灰,唯存正殿一所。及天皇圣命创运以来,圣德圣明,中兴祖道,复我禅风,由乃龙溪老人于庚寅年退圆明之后……。”

此段文字杨氏文已作了详细分析,提出了海陵王末年和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年)以后的历史背景均和“干戈四起”有相似之处,而杨氏文摒弃后者而认定是海陵王正隆六年(1161年)以后的历史情况。也就得出了龙泉大历禅寺的重建年代应在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年)的结论。而笔者则以为金代末期的时代背景与“干戈

四起”更为吻合。

金朝末年,统治阶级内外交困,朝廷日益衰微,当蒙古大军入侵,两次围攻中都,金宣宗失去抵抗信心,被迫于贞祐二年(1214年)南迁汴京(开封)。中都于次年沦陷于蒙古铁蹄之下,成吉思汗侵略重点西移,大军西向,中都只留部分兵力。河北广大土地陷于混乱状态,地主武装割据自保,百姓离散,为求生存则纷纷聚众起义。此种局面,当时的文人元好问在《临淄县令完颜公神道碑》(《遗山文集》卷二十八)有这样的描述:“贞祐二年,受代有期,而中夏被兵,盗贼充斥,互为支党,众至数十万,攻下郡邑,官军不能制。”这岂不是碑文中“兵戈四起”的鲜明写照。

蒙古占领中都后,战线南移,在蒙古统治的势力范围内,中都地区是相对的稳定,始能佛教复兴,重建寺庙。碑文中的“天皇圣命创运以来”自是指成吉思汗奉天开创新的朝运以来。“中兴祖道、复我禅风”。若理解为中兴佛祖之道,复我禅宗之风。则顺理成章,“中兴”一词与金世宗也就无可联系了。

二、纪年的分析

以干支纪年也是此一时期的特征。中都地区即沦为蒙古所统治,自不能再奉金

朝之正朔,而蒙古此时既未建国号也无年号。此一时期应自成吉思汗十年(1215年)亦即金贞祐三年中都城破开始,至忽必烈中统建元(1260年)结束。此一特定时期前后有45年之久。此一时期无论碑刻、志石和其它记述,均以干支纪年。蒙古白话碑也是以干支纪年或干支下缀以属性,如癸未羊儿年等。汉文碑则只用干支,如庆寿寺的海云和尚道行碑(现存法源寺),建于乙卯年(1255年)即蒙古宪宗五年;发现于海云和尚塔基的石函内,有碑形小墓志,记其卒于丁巳年(蒙哥七年,1257年)。金中都沦陷至忽必烈建元中统以前的这一时期内均以干支纪年,而之前之后均冠以年号,如贞祐二年、中统元年等。金、元文集中多如是记载。

从上述可知《重建龙泉大历禅寺之碑》中记载的干支,即应在此一时期。龙溪老人庚寅退隐圆明之年应是窝阔台二年(1230年)。寺庙竣工于乙未,应为窝阔台七年(1235年),亦即金灭亡之第二年。碑立于丁酉为窝阔台九年(1237年)。

三、人名的探索

1. 龙溪老人 碑文中所载僧人,不见经传,其事迹一时难以查找,幸包世轩同志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在其所写《门头沟伽蓝名僧记》(见北京市文研所编印的《北京文物与考古》)一文中有龙溪老人的塔铭,铭刻发现于门头沟区沿河城乡政府东北的山坡上。兹把塔铭有关部分摘录如下:“《德兴府矾山县圣泉柏山寺故通悟大师玄公塔铭并序》:师讳祖玄,通悟乃师号也,亦号龙溪老人。俗姓杨,祖居本土人士也……值兵革之际……及其甫定,蒙本府官众请师住持法云等寺。师乃复完殿宇、重新佛像,未及完备,间有乡中官众韩公、曹公辈递相谓曰:兵革之后,师居于他所,实为愧也;况乡中古刹已煨烬,乃彷徨而不忍见。今欲复完舍通悟大师之德力无有能者。乃修书状再三请师。师以乡间之故难以他辞,乃居于此。重新诸圣之法像,再糺白莲之社众,朱窝、结石、大明等寺(皆在门头沟西部深山

区——包世轩原文注)复得修完者,皆师之德力也,迄今人皆称之。戊申春(蒙古定宗三年、1248年)蒙授紫衣师号,……师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至乙卯(1255年)三月二十七日遗颂辞其大众而终。……荼毗日得舍利许多,其圆明不让隋珠,弟子理公辈分为二分,一分奉归大明,一分奉归于此。理公等托本县僧官玮公求之于进士王庭珪为之记。嗣法弟子道理等于丁巳年(1257年)三月二十七日建塔”。

塔铭所载“德兴府矾山县”,金置,辽时矾山县属奉圣州,元以后即废。矾山县位置在今涿鹿县东南一带,与当时宛平县接壤。今门头沟区西部、西南部(包括房山区北部山区)。多属其管辖范围。也是龙溪老人于金末兵革之后的主要活动场所。他在此修复了很多的寺院,塔铭虽未涉及修复“龙泉大历禅寺”,但和该寺修复时间并不抵触。龙溪老人因业绩蒙授紫衣师号是在戊申年(1248年),和龙泉大历禅寺碑文对照,他于庚寅年(1230年)退居圆明时年46岁,此后即复修龙泉大历禅寺,乙未(1235年)竣工,丁酉(1237年)立碑。碑之落款诸僧并无老人之名,可知老人并未再主持该寺。而此后当如塔铭所述,应本乡官众再三邀请下回矾山县主持并修复大明诸寺了。同一时期,同一地域,当不会再有第二龙溪老人。

2. 太夫人徒单氏 徒单氏是金王朝之后族,与皇族通婚,但不是凡徒单氏女均须嫁完颜氏,正如金之后妃不全是徒单氏一样。以太夫人为皇帝之母辈,似较牵强。太夫人之称,始于西汉,《汉书本纪》文帝七年有如淳关于太夫人的注解,其言:“列侯之妻称夫人,列侯死,子复为列侯,(其母)乃得称太夫人,子不为列侯,不得称也。”此后各代对此无定制,凡官僚豪绅,均可称其母为太夫人。金代随丈夫和儿子的爵位而封赠母、妻为夫人,均冠以郡、国之名,如寿国公夫人、彭城郡公夫人等。太夫人之称,乃由子贵而受封赠为夫人或称太夫人,也有未受封赠因子贵而他人尊称太夫人等。碑文中的太夫人徒单氏显然是尚无封号,只因子贵而称其太夫人。不排除碑文落款中元帅黄德震即系其子。

3. 广平郡公夫人和太原郡夫人均应是有金朝封号的夫人,但其品位不同。《金史·百官志》吏部条下:“郡公母、妻封郡公夫人;郡侯母、妻封郡君(承安二年更为郡侯夫人)”。太原郡夫人即郡侯夫人。改朝换代后仍称其前朝原来封号,是表示对其门阀地位的尊重,元人著作中不乏其例。如徒单公履(至元初曾任翰林侍讲学士)之母于金代封广平郡夫人,元代时徒单公履的同僚,仍尊称其母为广平郡夫人(见《秋涧大全集》卷二十一广平郡夫人祭文)。由此知,有金代封号并不说明其人仍处于金代。

4. 宣抚使王楫 宣抚使在金代指章宗泰和六年(1206年)曾设陕西宣抚使。蒙古大军南侵后,随着占领区的扩大,宣抚使的任命较为普遍。王楫即在兵败投降后,成吉思汗授予宣抚使的名义。《元史》卷一五三有王楫传,楫作楫。《长春真人西游记》、《秋涧大全集》等书也有王楫的记载,皆写作楫。由其字“巨川”可知同为一人,只是写法不同。据《元史》本传和《秋涧大全集》卷四四“国朝奉使”条,知王楫于甲戌年(蒙古成吉思汗九年,1214年)授宣抚使兼行尚书六部事,戊子年(拖雷监国之年,1228年)“奉监国公主命领省中都。”癸巳(窝阔台五年,1233年)以宣抚御史大夫出任国信大使持国书使宋议和,前后凡五往。癸卯秋(窝阔台后乃马真称制第二年,1243年)北还时,卒于途中,年60,归葬于燕(今北京地区)。王楫即活动于蒙古建元前的一段时期内,除参与征讨外且多在今北京地区,因而他死后也“归葬于燕”。龙泉大历禅寺碑文上的宣抚使王楫和此王楫无疑同为一人。也即证实了重建寺庙和立碑的确切年代。

5. 宣差大使刘合任 宣差使是受皇帝之命去完成某一项任务临时任命的官职。成吉思汗在位时期内,常有宣差的任命。碑文落款之宣差大使刘合任,名颇生僻,疑有误。和宣抚使王楫同时期并同在燕京的另有一宣差使刘仲禄,同姓不同名。此刘仲禄曾受成吉思汗的差遣,专程至山东东莱,邀请长春真人丘处机远赴西域和成吉思汗会

晤。刘仲禄因此功得封于善地——燕京,并在此落籍。“旧城”内曾有其祠堂和故宅(见《析津志辑佚》祠庙)。丘处机会见成吉思汗回归燕地,刘仲禄和王楫先后邀请丘处机常住大天长观(见《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此刘仲禄是否即刘合任,尚无确凿证据将其统而为一,待验原碑或拓片以及有新的线索后,始能知其为一人抑是另一人。此只不过将疑问提出而已。

四、“燕京”的佐证

石晋拱手将幽州献给辽后,辽升幽州为陪都,称南京,又称燕京。金人灭辽后,只称幽州为燕京。直至金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定都燕京,以“燕为列国之名,不当为京师号,遂改为中都”(《金史·地理志》)。有金一代,只称中都。蒙古成吉思汗十年(1215年)破金中都后,因已非京师,改称燕京,又设燕京路,总管大兴府。至忽必烈至元元年(1264年)八月,诏改燕京为中都。至元四年在原中都城东北另筑新城,至元九年(1272年)改号大都。由此知,“燕京”名称的使用,金灭辽后至建中都后用之(不含宋燕山府的短暂时期);金中都城破后至蒙古忽必烈至元元年八年前用之。《龙泉大历禅寺碑》中的“燕京十方圆明禅寺”即称“燕京”,自应是蒙古统治时期的“燕京”。因若是金代时则只能称“中都”十方圆明寺。由《房山石经题记汇编》金代题记可知,金初天会、皇统年间的题记称“燕京某寺”,而建中都后则改称“中都某寺”了。是很明显的分界线。“十方圆明禅寺”所称“燕京”的时代,既排除了是金初的燕京,则只能是属于蒙古统治时期的“燕京”。由此也可确定“龙泉大历禅寺”建碑时间的“丁酉”,是蒙古太宗(窝阔台)九年(1237年)。

从以上几个方面,均可证明龙泉大历禅寺碑的建立时间。此碑的再现,无疑对研究万佛堂孔水洞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也为研究金代碑刻形制提供了实物资料。

(北京市文物局退休人员)



张泰恩像

北京作为首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作为文物修复这一行业来说,也是全国人数最多,技术最全面,门类最齐全,水平最高的文物修复技术中心,目前北京从事专职各类文物修复的技术人员在近百人之中,他们均分散在中央和地方各文博单位中,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文物修复技术大多也是从北京学去的。

文物的修复与复制技术,可以说是从文物的问世也就相应地产生了,因为文物制做、修复、复制的技术是相同的。现在看有些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就是当时铸造时有缺残并由当时修补上的。至于青铜器复制,战国时期就已出现,《韩非子》载:“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贗往,齐人曰‘贗也’,鲁人曰‘真也’……。”可见春秋战国时就出现了伪造的青铜器。自春秋战国至晚清,不少铜器经过修复和技术加工,其中伪造的铜器也大量存在,所以有“十彝九伪”之说。宋代文献记载“肇新宋器”之说,上仿制以崇古,下仿造以图利,说明宋代仿制、伪造之盛。铜器仿造有多种多样形式,仿造方法与复制方法在技术上是—样的。也就是说,有伪造铜器的存在,也就有修复技术的存在。它与金石学发展有密切关系。但是1840年以前北京的文物修复行业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行业。大量青铜器在皇宫中珍藏,这些铜器的修复属于皇家造办处负责,民间则由社会上新铜作坊敷衍了事。

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的历史文物被大量掠夺,“文物”成了高级商品,古代青铜器成了古玩商人发财的热门货,但是出土的古代青铜器大多是破碎的,有些残缺不全,有一大部分还要进行去锈处理,于是在古玩商人们授意唆使下,文物修复这个专门行业应运而生,所以说文物修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行业。

各类文物修复技术基本相同,(不含纸质文物)历代由于重视青铜器的研究,而且古玩商最赚钱的也是青铜器,就修复技术上说最难修的也是青铜器,所以说从这个行业初创开始就是以发展青铜器修复技术为主兼修其它各类文物。

北京文物修复的

起源与发展

贾文忠

北京青铜器修复行业的创始人是位清官中于姓太监，此人嘴歪，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歪嘴于”于太监以修复古代青铜器为业，是清宫造办处中手艺人八大怪之一，这是光绪廿年至辛亥革命（1894—1911年）间的事情。“歪嘴于”出宫后住在天安门广场西边的前府胡同庙内，（现入大会堂位置）以修复青铜器为生，前后收了七个徒弟，其中两个徒弟，一个姓郭，就是后来的“老古铜郭”；一个姓张，名叫张泰恩（河北省冀县良心庄），是于师傅的最小徒弟，在师门排行第七。大约在辛亥革命前后，“歪嘴于”与世长辞，张泰恩给发了丧并继承了他老师的衣钵，把原来的字号“万龙合”改成了“万隆和”古铜局，专门修理古代青铜器。此时正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大肆侵略，中国的历史文化大量被掠夺盗卖的时代。铜器修复行业随着古玩商人的“金石路子”和“洋庄”生意的兴起而发展起来。大约“五四”前后，万隆和迁至崇文门外东晓市大街营业，并收张泰恩亲侄张文普为徒弟，张文普，号济卿，人称“小古铜张”。从“五四”前后到抗日战争以后不久，约二十年间，万隆和共收了十一位徒弟，其中四个徒弟没有学成，被淘汰；学成并各有特点的七位是：张文普、王德山、张子英、张书林、贡茂林、赵同仁、刘俊声，这是“古铜张派”第二代传人。他们在修复行业中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张文普、贡茂林、王德山三人在三十年代初，出师自立，又各自收了若干名徒弟，有孟海泉、李会生、赵振茂（故宫博物院）高英、杨政填（中国历史博物馆）王喜瑞、贾玉波（北京市美术公司）王存计（辽宁省博物馆）刘增堃（河北省博物馆）王荣达（上海博物馆）王长清（河南省博物馆）是为“古铜张派”第三代传人，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博单位修复文物的老专家。这些第三代“古铜张派”传人几十年来又将技术

传授给了全国各地的修复工作者，现在全国大多数文博单位中的修复人员均为“古铜张派”传人。

近现代北京地区文物修复、复制的发展主要以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市美术公司、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等单位的修复工作为主。

中国历史博物馆 1952 年设立文物修整室，1958 年调集北京地区各单位几十位修复人员集中在午门朝房为新建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从全国调来的文物进行修复、复制，主要用于中国通史陈列展览中。该馆主要设有青铜修复、书画装裱、古画复制、文物保护等科室。

故宫博物院 1953 年开始设文物修复组，先后设铜器、漆器、镶嵌、糊匣、装裱、临摹书画、照像复制、木器、钟表等修复工作，1959 年改为文物修复复制工厂，1988 年 10 月又组建成科技部，设 6 个科室 80 多人，能修复八大类文物几十个品种。多年来为故宫及各省市修复了大批珍宝。

北京市美术公司，文物修复人员最多，门类最全，以解放前从事古玩修复的手艺人为基础，1954 年公私合营，改为北京特艺公司文物加工部，后归属北京市文物商店，大跃进时又归属北京市美术公司，60、70 年代中国历史博物馆大部分通史展览文物都是请这些师傅修复的。故宫博物院、出国文展，社科院考古所及北京地区出土各类文物也请这些师傅修复，美术公司设铜器修复、陶器复制、书画装裱、陶瓷修复等车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物修复室自 1951 年建所时成立，主要负责全国重大考古出土文物的修复工作，如 68 年发掘满城汉墓、76 年发掘妇好墓，及马王堆汉墓、南越王墓等文物的修复。

（作者为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委员会秘书长）

北京地区出土的元代青白瓷

刘秀中

元朝(公元1271—1368年)在统一中国后,蒙古统治阶级在受中原和江南地区的高度发展农业经济的影响下,开始了重视农业的发展,采取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元代的手工业也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一定发展。瓷器的生产也因此而发展起来,它的制瓷工艺技术水平在我国制瓷史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下面介绍几件北京地区出土的元代青白瓷。

青白釉瓷匜,是1974年春在北京市昌平区元墓出土。器物的高4.6CM,口径13.3CM,底径8.1CM。匜为古代盥洗用具,是仿青铜器制式,有陶与瓷制。瓷匜始于东汉后期,盛行于元朝,南、北各地窑场均有烧造,以景德镇窑的产量最大,质量最好。其形体为圆状浅腹,平底,芒口,在口沿有一个3.5CM的长方槽形短流,流的底下有似流云式半环形装饰。内底刻弦纹一周。胎土淘洗的精细,胎质坚密,瓷化程度高,色白细腻,修胎讲究,形体规整,薄而坚硬,厚薄均匀,呈半透明状。釉汁细润纯净,呈青白色,器物的转折处积釉中微微闪青绿的色泽,施釉均匀,器面光洁晶莹。造型美观别致,烧制工艺精良,为元代青白瓷中的珍品。(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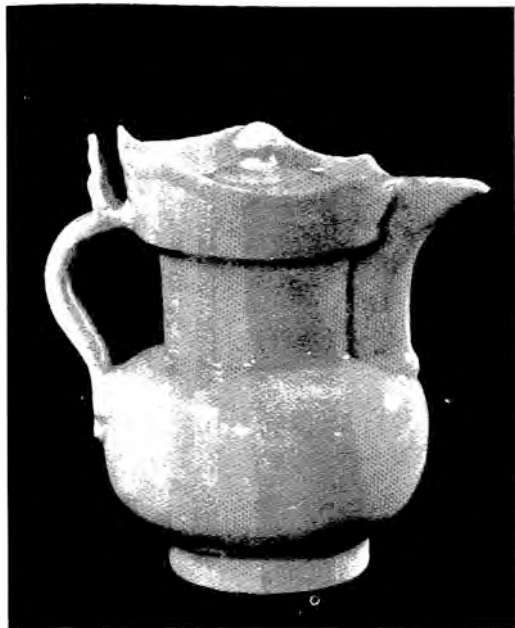
图一)

青白釉瓷僧帽壶,是1965年在北京市海淀区一座明墓出土。器物的通高19.7CM,口径12.7CM,底径7CM,流长4.3CM。壶呈束颈,鼓圆腹,圈足。壶口外沿向外撇,形似僧冠状,口内壁有一半圆式系,子口内折沿上,盖平置,珠形钮,盖边有长1.9CM向前伸出的舌头恰好与壶流相吻合。扁平柄,两端作如意,一头附在腹上,另一头在壶口外沿上翘起,形体新颖别致。胎白精细,胎体浑厚,修胎精致,转折处的线条柔和,有曲线美的效果。釉质细腻滋润,釉色是白中闪青,青中有白,为典型的青白釉。施釉精细,器面光泽柔润。造型敦



图一

实,古朴典雅,别具风格,具有元代少数民族的风貌特征,也是元代新创产品,是一件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宝贵资料。就目前所知,国内仅此一件,所以说是一件难得的珍贵文物。(见图二)



图二

青白釉瓷把杯,是1974年昌平县元墓出土。杯高3.1CM,口径7.5CM,底径3.2CM。此杯为饮茶器具,最初见于西晋,后历代均有烧制,但这种造型的把杯还是颇为罕见的。器呈大撇口,斜壁稍有弧度,芒口,平底,口沿下贴塑一“丁”字形把手。胎骨细致坚硬,白而纯净,胎体修饰的极薄呈半透明状,形体规整,并有明显的螺旋纹痕迹,是鉴别元代瓷器的主要特点之一。釉斗细润,青亮透彻,器面淡雅丽洁。造型小巧玲珑,构思巧妙,形体新颖美观,烧制工艺精细,为元代早期作品。(见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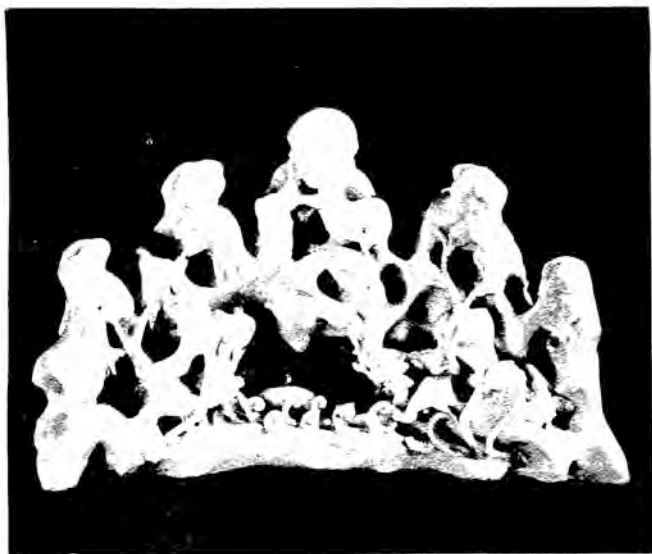
青白釉瓷笔架,1964年在北京市新街口一带元大都遗址出土。高11CM,长18CM,宽7CM。笔架为文具用器,瓷笔架创烧于宋代。这件器物是采用镂雕的技巧手法,塑造成一座高低不一起伏的五峰山状,山峰下有海涛汹涌,波浪起伏,山根有茁壮



图三

生长藤蔓与青竹,顺着山崖向上伸延。主峰之巅处白云烘托出一轮圆月。胎釉精细,设计严谨,构思的巧妙,使装饰与造型的雕塑融合为一体,充分发挥了装饰的艺术效果,犹如壮观的山峰屹立在大自然之中。笔架的形体浑厚质朴,不仅美观实用,而且还是一件精巧的工艺品。这种造型的青白瓷器还是少见的,它充分体现了景德镇制瓷匠师们的高超智慧与艺术才能。(见图四)

青白瓷玉壶春瓶,高28.2CM,口径7.7CM,足径9CM。此瓶是1963年在北京崇文区龙潭湖元代墓葬出土。玉壶春瓶为陈设器皿,创烧于宋代,盛行于元代。是由诗句“玉壶先春”而得名。瓶为侈口,细长颈,颈下逐渐侈延,下腹丰满圆润,“近底部向内敛,矮圈足稍外敞。主题纹饰为“寿比南山”与“福如东海”的吉祥语,以覆钟纹、回纹、仰垂如意云头、梅花纹作陪衬。多层次装饰显得华美,在制作工艺技法上,是采用细泥条在胚体上按规定的图案轮廓线盘旋粘贴,再于泥条上刻划横向线段而成,这种缀珠纹的装饰技能,充分地突出图案立体感的艺术效果。这件器物的纹饰设计的合理,构图巧妙,布局协调,线条规整精细,图案清晰。胎质精细,形体厚薄均匀规整,釉汁细致,纯净滋润,器面晶莹润泽。烧制工艺精湛,造型古朴典雅,美观大方,为青白瓷中的佼佼者。缀珠纹盛行于元代,也是元朝青白瓷的特殊装饰,它已成为断代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件器物是研究元青白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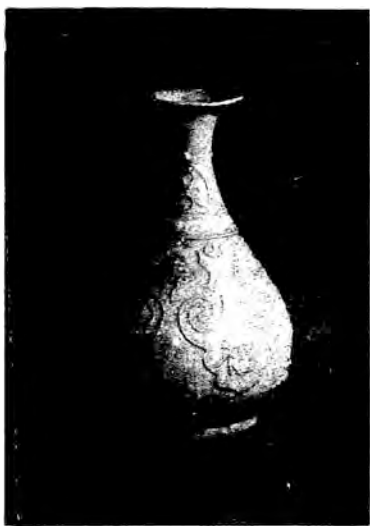


图四

已列为国家一级文物及珍贵文物收藏。

总之，青白瓷无论是胎质的洁白细腻，还是釉色的纯正温润似玉，以及造型的丰富多彩、艺术手法的精巧等都给人们以美的享受。过去曾有人在赞颂五代柴窑瓷器时称“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其实元代的青白瓷的特点，也正是吻合了这一特色。这也充分体现了元代烧制青白瓷达到的高超的工艺技术水平。元青白瓷不仅深受国内人们的喜爱，而且还作为商品远销国外。据文献资料记载，在菲律宾的古遗址中及朝鲜新安海底中国元朝沉船中都有青白瓷的发现。产品也大量输送到日本与东南亚各国，最远曾抵达到东非海岸。这一切都说明元代青白瓷不仅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而且对世界物质文化的发展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馆员）



图五

的装饰题材与技巧的宝贵的实物资料。（见图五）

从上述几件器物的胎、釉、造型、装饰技巧的特征看，均属于元代景德镇窑所烧制，现收藏于首都博物馆，也是北京地区出土与传世诸多青白瓷中出类拔萃的器物，代表了元代的时代风格，经有关专家鉴定

北京第一次文物国际拍卖

王金鲁

今天,举行国际国内文物拍卖会已经司空见惯,文物拍卖公司相继成立,拍卖成交额与日俱增,文物拍卖已成为促进民间收藏、活跃文物流通的一条重要渠道。而五年前,文物拍卖,特别是文物国际拍卖,仍是一个禁区,打开这个禁区,取得社会各界对文物拍卖的共识,却经历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在1992年“中国黄金旅游年”,市外经部门为配合旅游年活动,筹划举办一次国际拍卖会。他们建议这次拍卖增加文物拍卖的内容,以吸引国外游客和海外人士来华旅游。市文物局接到外经部门的建议,经过研究,认为这是一个难题,但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权衡利弊,值得一试。

文物商业多年来一直实行由文物部门统一经营,文物外销执行“少出高汇,细水长流”的方针,文物商品的价格基本上是计划价格,销售方式也十分单一,主要靠店堂出售。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市场需要,文物商店虽多次组织海外展销、代销、寄售,但仍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文物商品价格与市场经济脱节,文物购销差价过大,收购日益困难,民间文物又不能直接进入流通,以致影响了文物市场的发展。

拍卖,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买卖方式,它具有更大的公开性与竞争性,能实现拍卖物的较高经济价值。此前,不断有人建议进行文物拍卖的尝试,北京也试着举办过一些小型的文物拍卖会(实际上卖的是旧货,而且只限国内顾客购买),取得一些经验,但是始终未能迈出国际拍卖这一步。这次市文物局所以同意文物商品参加国际拍

卖会,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探索文物销售的新方式,开辟文物流通的新渠道。据此,市文物局向国家文物局和市政府写了请示报告,并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及市政府的支持。市政府还专门成立了拍卖活动领导小组,要求文物、文化、外经、海关等部门密切配合,积极慎重地办好这次拍卖会。

文物国际拍卖主要对象是境外客商和游客,参拍的文物必须是允许出境的,这样首先就涉及到参拍文物商品的范围问题。按文物鉴定出境管理办法的规定,可以出境的商品仅限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后的非珍贵文物,这些文物都是大路货,缺乏吸引力。为了提高拍卖文物的档次,文物局一方面在可销售的文物中尽量选择一些品质比较好的;另一方面又经申报,特许批准一部分超年代的文物商品。这样参拍的文物商品总量定为1281件,其中属于超年限特许出境的223件,限内允许出境的1058件,这就形成了我们国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文物拍卖。

举办文物国际拍卖的第2个问题是,参拍的单位和个人问题。文物法规规定,非文物部门不得经营文物,个人收藏的文物不得私自出售给非文物部门,这样在拍卖会征集文物商品时又遇到由谁提供的问题。为了严格按文物法办事,市文物局确定参拍单位为局属文物商店和经文物行政部门批准的有权经营外销文物的商店,如友谊商店、华夏工艺品商店等。对个人则坚持不许直接拿文物到拍卖会上去拍卖,而是采取由文物商店收购,或委托文物商店去参拍。由于这次文物拍卖是第一次国际拍

卖,大多数收藏者都在观望,真正通过文物商店去参拍的是极少数,而且参拍文物没有价值较高的,多是试探性的。

鉴于这次文物国际拍卖首次在首都举行,规模大、影响广。市文物局与外经委商定,专门请来了香港的拍卖师胡文桢先生主槌。根据胡先生建议,还从香港吸收了少量高值珠宝文物参加拍卖,并依照海关法的有关规定,办理了暂时进出境的手续。

拍卖会的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引起海内外人士的极大兴趣与关注,霍英东先生表示愿无偿提供贵宾楼饭店作拍卖会会场,香港、台湾许多收藏者也纷纷表示来京参拍。尽管这次拍卖会的门票是美元出售,价格较高,国内收藏者、文物界人士及个体经营者仍踊跃参加。拍卖会于1992年10月在中国青年交流中心举行四天,天天座无虚席,前来参拍的香港、澳门、台湾、日本、韩国、东南亚及欧美等境外客人300多人。拍卖会成交文物商品共398件,成交总金额85.89万美元(大约相当文物商店同年销售额的40%),成交的商品都超过了底价,有的超过几倍,甚至几十倍。北京文物商店参拍的一把战国铜剑(特许文物)在店堂销售只能卖到1600美元,这次以1万美元成交,增值6倍多。另一件特许文物西周青铜爵杯,底价6500元,经过竞拍,最后以2.8万美元成交,增值4倍多。拍卖中有一件清末民初的大理石六扇屏,为一般文物,国内一些文物经销部门都有类似文物出售,店堂销售价为200美元,这次拍卖竟以8000美元成交,增值40倍。这些都在当时引起轰动。

但是,这次拍卖也存在许多缺点和不足。文物国际拍卖不仅在北京就是在全国都是第一次,不论国内还是海外的宣传不断升温。海外一些新闻机构宣传说,这次拍

卖标志着中国文物出境政策的“松动”;有的宣传这次拍卖的上千件文物中有许多是“国宝”,以致使海外许多客人抱有很高的期望值,但是到京才知道大部分拍卖品不过是店堂销售的文物“大搬家”,不免有些失望。由于这次拍卖的文物档次、品位都比较低,成交商品数额仅占总参拍数的近1/3,总金额不过80多万美元(不足今天拍卖会一件文物的成交金额,如‘96翰海春季拍卖会宋画张先的《十咏图》就以1800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拍出,相当210多万美元),这也使人们对这次文物拍卖是否成功产生疑惑。拍卖会后在文物界引起较大波动,一时间议论纷纭,也产生不少误解。有的认为上千件文物进入拍卖会,如同把文物当萝卜、白菜成堆出售,大大贬低了中国文物的价值。有的指责文物拍卖与文物法规规定相悖;有的攻击北京文物国际拍卖是“一场失败”、“有损我们文化大国的声誉”,等等。以致文物局长在北京电台热线办公时,文物拍卖也成为热门话题。有的听众打电话给电台,表示赞成、支持文物拍卖;有的询问下次拍卖何时举行;有的要求吸收民间藏品参加拍卖;也有的对文物拍卖是否违反文物法规、政策规定提出质疑;有的担心拍卖是否会造成珍贵文物流出境外。

这次拍卖会后,市文物局接到上百封群众来信,要求将自己所存的文物提供拍卖,不少人希望能够把拍卖继续办下去。拍卖会在外省市也引起了一些连锁反应,一些省市相继要求举行文物拍卖。为此国家文物局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在国务院未正式审批国家文物局有关文物拍卖的意见之前,一律暂停文物拍卖活动。市文物局表示将严格遵守通知的要求,暂时停止北京的文物拍卖活动。但是这次文物国际拍卖带来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作者为北京市政府顾问委员会顾问,
市政协城建委员会副主任)

市文物局资料信息中心

藏北京地区出土墓志拓片目录(五)

周钺妻朱寿宁圻志并盖

首题“秀府顺义郡主圻志” 17行 行22字 60×60

盖篆书题“秀府顺义郡主圻志” 3行 行3至2字不等 60×60

明嘉靖元年(1522)十一月十八日“葬于顺天府宛平县香山乡狼山之原”

楷书 无撰书人

覃泰墓志并盖

首题“大明故镇国将军锦衣卫指挥使掌南镇抚司事覃公墓志铭” 33行 行34字 76×77

盖篆书题“大明故镇国将军锦衣卫指挥使掌南镇抚司事覃公墓志铭” 5行 行5字 76×77

明嘉靖二年(1523)四月二十六日“葬于阜成门外四里园”

孙清撰 高岱楷书 华英篆盖

1954年于海淀区魏公村出土

孙洪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御马监太监孙公墓志铭” 34行 行40字 73×73

盖篆书题“明故御马监太监孙公墓志铭” 4行 行3字 73×73

明嘉靖二年(1523)五月二十一日葬“京城西南弘法寺之东”

李时撰 孙杲楷书 张坤篆盖

1952年于宣武门外郝井台出土

夏涌墓志铭

首题“明锦衣卫镇抚夏公墓志铭” 26行 行29字 52×52

明嘉靖二年(1523)卒

刘玘撰 任鼎楷书并篆盖 萧鼎刻

于陶然亭自新路出土

李坚妻茹氏墓志

首题“明故节寿李母茹孺人墓志铭”

33行 行40字 57×57

明嘉靖三年(1524)二月二十四日“墓在都城宣武关外白纸坊梳妆台”

茹鸣玉撰 茹鸣凤楷书 茹鸣金篆盖

1954年于广安门外白纸坊出土

周俊及妻宋氏墓志

首题“明故宣义郎周君暨配宋氏合葬墓志铭” 27行 行29字 61×61

明嘉靖三年(1524)二月二十六日“葬于城南八里庄”

李廷相撰 柴义楷书 郑绅篆盖

1957年于广渠门外沙土口村出土

董猷墓志

首题“明故逸菴处士董君墓志铭” 25行 行30字 60×60

明嘉靖三年(1524)九月二十九日“墓在城南东皋村祖塋之右”

李廷相撰 岳梁楷书 郑绅篆盖

楷书 无撰书人

钱承宗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安昌伯谥荣僖钱公墓志铭” 42行 行47字 77×77

盖篆书题“明故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安昌伯谥荣僖钱公墓志铭” 5行 行5字 77×77

明嘉靖五年(1526)四月初九日葬 七年迁葬于宛平县玉河乡凤凰山之原”

费宏撰 廖纪楷书 秦金篆盖

于西直门外四道口砖厂出土

李质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神宫监太监李公墓志铭”

34行 行36字 56×55

盖篆书题“明故神宫监太监李公墓志铭” 4行 行3字 57×56

明嘉靖五年(1526)十二月十三日“葬于宛平县香山乡门头村广仁寺”

齐之驎撰 黄重楷书 王桓篆盖

1957年于海淀区松塘出土

杜旻妻陈氏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封孺人陈氏墓志铭” 29行 行35字 63×63

盖篆书题“明故敕封孺人陈氏之墓” 4行 行3至1字不等 63×63

明嘉靖六年(1527)十月二十六日“葬于阜成门西池水村”

顾鼎臣撰 杨志学楷书 崔杰篆盖

1956年于海淀区蔡公庄出土

杜甫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神宫监右少监杜公墓志铭” 29行 行32字 56×57

盖篆书题“明故神宫监右少监杜公之墓” 4行 行3字 56×57

明嘉靖六年(1527)十一月十日“葬于顺天府宛平县阜成关外四里园”

王时中撰 高岱楷书 郭勋篆盖

1956年于阜成门外甘家口出土

张晟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昭信校尉羽林卫百户张公墓志铭” 24行 行28字 54×54

盖篆书题“明故昭信校尉羽林卫百户张公墓志铭” 4行 行4字 55×55

明嘉靖七年(1128)十月二十九日葬于“崇文门外西郊亭”

张玠撰 苑韶楷书 王世隆篆盖

1958年于朝阳区高碑店唐槐乡出土

刘达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西园刘公墓志铭” 39行

行 46 字 63×63

盖篆书题“明故西园刘公之墓” 3 行

行 3 至 2 字不等 65×64

明嘉靖八年(1529)八月九日“葬都城西畏吾村”

赵永撰 张璠楷书 魏璠篆盖

陈应循墓志并盖

首题“皇明封清微冲静葆和凝素崇玄悟法真修养默演范真人虚白陈公墓志铭”

44 行 行 49 字 69×69

盖篆书题“皇明封清微冲静葆和凝素崇玄悟法真修养默演范真人虚白陈公墓志铭” 6 行 行 5 字 60×69

明嘉靖九年(1530)二月十一日葬“城西畏吾村营建寿藏……奉真人冠剑瘞于寿丘”

邵元节撰 仝钺楷书 张伟篆盖

钱承宗妻王氏墓志并盖

首题“封安昌伯夫人王氏墓志铭” 30 行 行 36 字 78×79 周围刻卷云纹

盖篆书题“诰封安昌伯夫人王氏之墓” 4 行 行 3 至 2 字不等 78×79 周围刻卷云纹

明嘉靖九年(1530)六月二十六日“祔葬于都城西香山乡之原合安昌公之兆”

徐缙撰 张延龄楷书 陈懿篆盖

于西直门外四道口砖厂出土

陈伟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恩荣官质菴陈君墓志铭” 30 行 行 35 字 60×60

盖篆书题“明故恩荣官质菴陈君墓志铭” 4 行 行 3 字 60×60

明嘉靖九年(1530)九月十二日“葬于都城西黑山之原”

蔡需撰 廖云龙楷书 蔡子举篆盖

于石景山八宝山出土

刘京及妻王氏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明威将军锦衣卫指挥佥事刘君暨配王氏合葬墓志铭” 29 行 行 35 字 61×61

盖篆书题“明故明威将军锦衣卫指挥佥事刘君暨配王氏合葬之墓” 6 行 行 4 至 3 字不等 61×61

明嘉靖九年(1530)十一月十六日“合葬于西直门外畏吾村”

刘文宪撰 费渊楷书 曹堂篆盖

钱承宗副室刘氏墓志

首题“明故戚畹钱母刘氏墓志铭” 28 行 行 32 字 63×63 周围刻卷云纹

盖篆书题“明故戚畹钱母刘氏墓志铭” 4 行 行 3 至 2 字不等 63×63

明嘉靖十年(1531)二月二十九日“葬都城西香山乡赐莹合葬王夫人之次”

李廷相撰 裴骞楷书 张湘篆盖

于西直门外四道口砖厂出土

苏瑾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司设监太监苏公墓志铭” 29 行 行 32 字 61×61

盖篆书题“明故司设监太监苏公墓志铭” 4 行 行 3 字 62×62

明嘉靖十一年(1532)三月十二日“窆于宣武关外白云观之后”

欧阳铎撰 简霄楷书 薛翰篆盖

1956 年于西便门外白云观出土

张嶽妻何氏墓志并盖

首题“皇明戚畹锦衣卫勳卫张君配宜人何氏墓志铭” 28 行 行 36 字 64×63

盖篆书题“皇明戚畹锦衣卫勳卫张君配宜人何氏之墓” 5 行 行 4 至 2 字不等 65×64

明嘉靖十一年(1532)九月二十五日葬于“卢沟桥西连三岗定兴王之侧”

孙衿撰 陈鐔楷书 吕璋篆盖

1958年于丰台区赵辛店吕村出土 志
石左上角残缺

黄玺及妻王氏合葬墓志并盖

首题“明昭勇将军黄公淑人王氏合葬墓志铭” 32行 行39字 63×62

盖篆书题“明昭勇将军黄公淑人王氏合葬墓志铭” 4行 行4字 63×62

明嘉靖十一年(1532)十月二十二日
“葬于通州小民屯”

郑绅撰 朱鑑楷书 王佐篆盖

于通县城关公社岳庄村永顺七队出土

张轸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御马监太监张公墓志铭”
25行 行30字 76×76

盖篆书题“明故御马监太监张公墓志铭” 4行 行3字 76×76

明嘉靖十二年(1533)一月“葬于宛平县香山乡万安山之阳” 4行 行3字 76×76

口景祥撰 邵文恩楷书 岑业篆盖

1965年于海淀区门头村出土

陈芮及妻支氏墓志并盖

首题“陈母太淑人支氏合葬墓志铭”
29行 行32字 61×61

盖篆书题:“明封太淑人锦衣陈母支氏合葬之墓” 4行 行4~3字不等 61×61

明嘉靖十二年(1533)六月二十六日葬于“都城西四里园”

蔡子举撰 王通中楷书 陈耀篆盖

张钦妻顾氏墓志并盖

首题“明诰封明威将军锦衣卫指挥佥事张公配淑人顾氏墓志铭” 34行 行39字 70×72

盖篆书题“明诰封明威将军锦衣卫指

挥佥事张公配淑人顾氏之墓” 5行 行5至3字 71×71

明嘉靖十三年(1534)二月二十九日
“葬于卢沟桥西连三岗”

孙衿撰 杜枏楷书 陈鐔篆盖

1958年于丰台区赵辛店吕村出土

静妃岳氏圹志并盖

首题“宪庙和惠静妃圹志” 19行 行25字 62×61

盖篆书题“大明宪庙和惠静妃岳氏圹志” 4行 行3字 62×61

明嘉靖十三年(1534)九月十三日“葬于金山”

1963年于海淀区镶白旗董四墓出土

曹玺及妻杜氏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云骑尉留守右卫百户曹公配安人杜氏合葬墓志铭” 29行 行35字 62×62

盖篆书题“明故云骑尉留守右卫百户曹公配安人杜氏合葬墓志铭” 5行 行5~3字不等 63×62

明嘉靖十三年(1534)十月二十七日葬

张翰撰 郑绅楷书 杨志学篆盖

1956年于宣武门外郝井台出土

李云崕真人墓志并盖

首题“皇明封冲虚守一抱朴安恬修真悟法履和凝素敷教真人景严李公墓志铭” 37行 行39字 74×73

盖篆书题“皇明封冲虚守一抱朴安恬修真悟法履和凝素敷教真人景严李公墓志铭” 6行 行5字 74×73

明嘉靖十四年(1535)九月三日“葬于畏吾村”

龚治撰 蒋传楷书并篆盖

陈颖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御马监太监陈公墓志铭”

21行 行27字 63×62

盖篆书题“明故御马监太监陈公墓志铭” 4行 行3字 62×62

明嘉靖十五年(1536)五月七日“葬香山乡门头村延寿菴后”

冯惠撰并楷书及篆盖

于海淀区香山乡门头村出土

周钺及妻顺义郡主 合葬墓志并盖

首题“皇明中奉大夫仪宾一山周公合葬顺义郡主墓志铭” 30行 行32字 56×56

盖篆书题“明故诰封中奉大夫仪宾周公墓志铭” 4行 行4~3字不等 56×56

明嘉靖十六年(1537)四月三日“合葬狼山之原”

孙衿撰并楷书 庞仲庸篆盖

于门头沟区三家店中街出土

王玉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神宫监太监王公墓志” 22行 行25字 59×59

盖篆书题“明故神宫监太监王公之墓” 4行 行3~2字不等 59×59

明嘉靖十七年(1538)四月初六“葬于宛平县香山乡万安山至定菴之原”

楷书 无撰书人

1955年于碧云寺出土

孙彬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内官监太监孙公墓志铭” 28行 行28字 60×60

盖篆书题“明故内官监太监孙公墓志铭” 4行 行3字 61×61

明嘉靖十七年(1538)四月十八日葬于“宣武关外弘法寺”

刘栋撰 周文烛楷书 梁继璠篆盖

1953年于宣武门外郝井台出土

孙昂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神宫监右少监孙公墓志铭”

18行 行25字 55×55

盖篆书题“明故神宫监右少监孙公墓志铭” 4行 行3字 55×55

明嘉靖十七年(1538)九月二十七日“葬都城之西永宁菴葬焉”

楷书 无撰书人

1965年于海淀区香山乡门头村出土

王刚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恩荣定边卫指挥金事纯菴王公墓志铭” 25行 行31字 61×61

盖篆书题“明故恩荣定边卫指挥纯菴王公墓志铭” 4行 行4字 61×61

明嘉靖十九年(1540)二月二十一日“葬新城西门外”

胡经撰 郭希颜楷书 张璠篆盖

朱敬墓志并盖

首题“大明文林郎锦衣卫经历一斋朱君墓志铭” 29行 行35字 63×63

盖篆书题“明徵仕郎中书舍人朱君之墓” 4行 行3字 63×63

明嘉靖十九年(1540)四月十二日“葬于阜成关外七源村”

蔡昂撰 费渊楷书 郑绅篆盖

1957年于海淀区百万庄二里沟出土

张潋墓志并盖

首题“明承德郎顺天府判沉斋张君墓志铭” 27行 行32字 60×60

盖篆书题“明承德郎顺天府通判沉斋张君墓志铭” 4行 行4字 61×59

明嘉靖十九年(1540)六月卒

赵时春撰 蒋淦楷书并篆盖

1966年于小红门公社出土

张念墓志并盖

首题“皇明尚膳监太监乐山张公寿藏墓志铭” 34行 行40字 49×49

盖篆书题“皇明尚膳监太监乐山张公寿藏墓志铭” 4行 行4字 49×49

明嘉靖十九年(1540)仲秋九日葬“都城之西北去二十余里许府之顺天县之宛平香山乡门头村之右”

王荻撰 张子衷楷书 王景篆盖

于海淀区四季青公社门头村大队出土

韩锡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内官监太监韩公墓志铭” 25行 行34字 56×56

盖篆书题“明故内官监太监韩公墓志铭” 4行 行3字 55×55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七日“葬在南城弘法禅林”

毕鸾撰 杨镗楷书并篆盖

1953年于宣武门外郝井台出土

杜旻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太中大夫河东陕西都转运盐使司远使杜公墓志铭” 38行 行44字 63×63

盖篆书题“明故太中大夫河东陕西都转运盐使司远使杜公之墓” 5行 行5~2字不等 63×63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二十日“葬于阜成门外池水村”

张文宪撰 高澄楷书 谢九仪篆盖

1956年于海淀区蔡公庄出土

卫守忠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钦授锦衣卫勋卫西坡卫君圻志” 16字 行26字 65×67

盖篆书题“明故钦授锦衣卫勋卫西坡卫君圻志” 4行 行4~3字不等 65×

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四月十日“葬于阜成门西翠屏山祖茔”

楷书 无撰书人

1956年于海淀区半壁店出土

许绅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掌太医院事谥恭僖许公墓志铭” 45行 行48字 69×69

盖篆书题“明故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掌太医院事谥恭僖许公墓志铭” 6行 行5~2字不等 69×69

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八月二十二日“葬于都城南七里祖茔”

张文宪撰 陈时楷书 陈鐔篆盖

1963年于丰台区大红门花椒树村出土

丁恭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御用监太监丁公墓志铭” 22行 行19字 61×61

盖篆书题“明故御用监太监丁公墓志铭” 4行 行3字 62×62

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葬于“宛平县香山乡广恩之侧”

楷书 无篆书人

1956年于西直门外小园胡同出土 志石左上角残

仁和大长公主圻志并盖

首题“明仁和大长公主圻志” 22行 行26字 81×81 周围刻云凤纹

盖篆书题“大明仁和大长公主圻志” 4行 行3~1字不等 周围刻云凤纹

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六月九日“葬顺天府大兴县下马社榨子口之原”

楷书 无篆书人

1969年于小红门公社肖村大队出土

李汝思墓志并盖

志无首题 24行 行24字 55×55

盖篆书题：“大明故义官李君墓志铭”

4行 行3~1字不等 59×59

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七月二十四日葬“圻在都城西四里园祖塋之侧”

李可畏撰并楷书

于二里沟机械科学院内出土

萧平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尚膳监太监肖公墓志铭”

25行 行32字 56×56

盖篆书题“明故尚膳监太监肖公墓志铭” 4行 行3字 56×56

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十一月二十五日葬于“宣武关外白纸坊庵旁于弘法寺”

郭凤撰 张明师楷书并篆盖

1953年于宣武门外郝井台出土

甄湧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敕封文林郎巢县知县松泉甄公墓志铭” 33行 行45字 62×63

盖篆书题“明故敕封文林郎巢县知县松泉甄公墓志铭” 5行 行4~2字不等 62×61

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十一月五日葬

翟奎撰 吴期楷书并篆盖 张鸾鹄

1958年于广渠门外磨坊村出土

蔡芳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引礼舍人慎轩蔡君墓志铭”

27行 行31字 62×62

盖篆书题“明故引礼舍人慎轩蔡君之墓” 4行 行3字 62×62

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正月二十四日葬于“城东安德乡祖塋”

郑绅撰 郭瓚楷书 唐国相篆盖

1956年于朝阳区酒仙桥出土 志石右下角和左上角残缺

方锐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安平侯赠太保谥荣靖方公墓志铭” 32行 行42字 84×85 周围刻云纹

盖篆书题“明故安平侯赠太保谥荣靖方公墓志铭” 4行 行4字 87×86 周围刻云纹

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三月二十七日“葬公于朝阳关车营”

严嵩撰 费宋楷书 崔元篆盖

1953年于朝阳区东大桥出土

宋兴墓志并盖

首题“大明故东厂总督前司礼内官监太监宋公墓志铭” 28行 行48字 66×65

盖篆书题“大明故东厂总督前司礼内官监太监宋公墓志铭” 4行 行4字 66×68

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月三日“葬于宣武关西弘法寺之左”

谢少南撰 张电楷书 陆炳篆盖

1953年于宣武门外郝井台出土

永康大长公主圻志并盖

首题“永康大长公主圻志” 26行 行31字 80×86 周围刻云凤纹

盖篆书题“永康大长公主圻志” 3行 行3字 88×86 周围刻云凤纹

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四月二十八日葬于“大兴县下马社榨子口”

楷书 无撰书人

(孔繁云、王大成整理,孔繁云执笔)

北京市文物局

1997 年一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

1 月 1 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最先报导王府井东方广场施工工地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随后《北京晚报》、《北京日报》、《中国文化报》等多家报纸接连刊登文章对此事进行报道。

1 月 3 日

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及国家局局属博物馆的领导到东便门“爱北京城、捐城墙砖”捐砖现场参加劳动。北京市副市长林文漪也参加了劳动。

1 月 4 日

我局与市园林局联合检查元大都土城遗址附近的违章工程。该违章工程系市园林局绿化处一大队三中队与投资方希秦文化信息传播广告公司未申报擅自在土城遗址上施工,两局当即勒令其停工,听候处理。

1 月 7 日

我局文物研究所落实通县古船勘探发掘的前期准备工作。

我局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古动物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召开东方广场现场考古工作协调会,确定考古发掘有关事宜。

1 月 8 日

北海团城修缮工程通过我局验收。

1 月 9 日

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局长等到东方广场古人类遗址视察。同日,市委副书记李志坚也视察了该处。

1 月 11 日

我局召开“爱北京城,捐城墙砖”活动表彰大会。北京市副市长林文漪、市政协副主席张廉云、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专家单士元、张开济等出席。会上向捐砖者颁发了证书。

下午,北京市副市长林文漪视察首都博物馆、东岳庙两处古建修缮工程工地。

1 月 14 日

我局陪同市外办友好城市处有关同志参观了正阳门、文物公司、首都博物馆并就“北京民俗展”、“鼻烟壶展”、“北京文物精华展”等外展项目进行了商谈。

1 月 16 日

全国文物局长会议在北京召开。我局单霁翔局长、孔繁峙副局长参加了会议。

1 月 17 日

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物局长会议代表视察了湖广会馆并观看京剧演出,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参加了这次活动。

1 月 18 日

位于琉璃厂西街的我市第一家民办博物馆——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我局及相关单位的领导、专家出席了开幕式。

1月21日

我局对天安门地区端门电路改造工程进行技术交底。

我局组织召开“北京市文物拍卖工作会议”。国内贸易部、国家文物局、北京海关、各拍卖公司的代表近三十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总结了96年文物拍卖工作的总体情况,并就《拍卖法》的实施提出了要求。

1月22日

我局机关全体职工开展献爱心活动,集资慰问市塑料集团系统困难职工。

1月22日~23日

我局与市博物馆学会联合举办了博物馆知识系列讲座,博物馆学专家吕济民、王宏钧等分别介绍了中国博物馆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博物馆的发展趋势。

1月23日

西堂子胡同25号四合院修缮工程通过我局验收。

1月24日

北京燕山出版社《京味文学丛书》编委会成立并组织座谈会。

1月30日

“一九九七年北京地区博物馆通用年票”正式对社会发售。此次通票共包括博物馆55座,基本沿袭去年的使用方法。

1月31日

古建馆《中国古代建筑大观》陈列大纲专家审查会召开。

2月1日

我市第二座民办博物馆——位于朝内豆瓣胡同25号的何扬·吴茜现代绘画馆正式开馆。

根据市委宣传部的部署,我局组织大钟寺、广济寺、雍和宫、法源寺、广化寺等单位在除夕零点鸣钟,增加春节气氛。

2月5日

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来我局看望全体职工并拜年。

2月6日晚

除夕夜,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龙新民、北京市副市长林文漪视察大钟寺文物古建

安全并宣布'97文物安全年工程启动。凌晨,大钟寺敲响新年钟声,北京数千名市民参加了这一活动。

2月15日

东方广场古人类遗址的考古发掘暂时告一段落。重点发掘200多平方米,共出土标本600余件,其中石制品200件、哺乳动物化石、骨件300件、用火遗迹3处。

2月19日

我局与市政管委、市建委、市危改办联合发出《关于在本市城市开发建设及危旧房改造工程中注意保护、收集明清城砖的紧急通知》。

我局协助文研所落实延庆县古崖居洞穴考古勘探发掘工作。

2月20日

位于崇文门内小报房胡同的北京邮政博物馆对外开放。

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视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并审查改陈方案。

2月25日

我局召开八达岭瓮城复建论证会。国家文物局专家罗哲文、杜仙洲等出席论证会。

在我国访问的葡萄牙总统若热·桑帕约及夫人率葡萄牙政府代表团一行40余人参观了首都博物馆。

2月27日

经过筛选,有64篇论文入选参加“北京古典文物研究论文奖”的评议。

2月

我局完成北京市1996年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工作中所承担的自然保护区覆盖率指标中文物、园林单位情况统计工作。

老舍故居的搬迁工作取得一定进展,在市政府及有关单位的配合下,已确定了搬迁房源。

3月2日

我市实行每月第一个星期日对市民免费参观。3月2日为第一个接待日,市民踊跃前来参观。

3月5日

文物公司向辽金城垣遗址博物馆捐赠100余件文物列入馆藏。

3月6日~7日

我局在西山大觉寺召开97年区县文化文物局会议。总结了96年的文物工作并对97年的工作做了安排。会后向各区县赠送了微型摄像机。

3月10日

在市政府北楼举行了西班牙依莎集团总裁向北京市市长贾庆林赠送阿尔瓦圣经的仪式。哈齐维尔总裁介绍了阿尔瓦圣经的悠久历史及这部复制品的珍贵价值。我局局长单霁翔出席了赠送仪式,这部阿尔瓦圣经由我局收藏。

我局调查了八达岭高速路涉及关沟文物景点保护问题并向首规委上报意见,得到妥善处理。

3月11日

我局协助朝阳区文化文物局查处市住宅总公司擅自违法部分拆除观音寺一事。

我局召开老干部工作会议。

下午,北京市副市长林文漪听取我局、海淀区政府关于圆明园正觉寺保护及整治情况汇报。

3月14日

市外办部署由我局与园林局共同承建埃及世界公园北京园工程。

3月15日

北京市副市长林文漪视察了艺术博物馆、徐悲鸿纪念馆。

3月18日

我局对全市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巡视检查工作全面开始。

3月19日

依照我局《博物馆馆容、馆貌管理工作守则》,对局属部分博物馆大钟寺、艺博、石

刻馆等进行了检查。

3月20日

我局与市教委联合举办第六届“我爱北京、我爱博物馆”征文比赛,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征集优秀作品。

我局组织顺天府学大门复建工程进行技术交底。

3月24日

我局组织循郡王府修缮工程进行技术交底。

3月25日

我局组织景山五亭修缮工程进行技术交底。

徐悲鸿纪念馆《中日书画名家纪念馆藏品联展》开幕。

3月26日

我局联合市外办友好城市处共同邀请部分欧洲国家驻华使馆官员参观我局准备推出的三个外展项目。

3月26日~27日

我局在西山大觉寺召开“97年北京市文物局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龙新民到会并做重要讲话。

3月28日

我局参加首规委陕甘宁天然气进京路线方案审查会,就考古勘探经费提出紧急意见并有望落实。

截至三月中旬,我局顺利完成了炎黄艺术馆借展文物的移交工作,共接收文物3487件,全部档案资料移交资料中心保存。

一季度

我局为北京市的30余家文物代销单位办理了许可证登记、核发工作,又继续为古玩城新增的100余位商户办理了文物监管物品经营许可证业务。

(北京市文物局办公室干部王辅宇)

局属博物馆一季度参观人数一览表

单位简称	总人数	成人数	学生人数	外宾人数
西周馆	1301	1097	202	2
徐悲鸿纪念馆	18900	7700	9800	1400
大葆台	8648	1251	265	7132
辽金馆	1044	559	482	3
智化寺	1389	1289	15	85
古建馆	805	620	150	35
大觉寺	6572	5959	575	38
大钟寺	19226	14795	3449	982
首都博物馆	89418	30517	24797	34104
团城	2260	2212	48	0
白塔寺	2873	2433	194	246
正阳门	55130	49600	5400	130
德胜门	6390	5973	386	31
艺术博物馆	17693	16911	742	40
石刻馆	6966	4340	2084	542
总 计	238615	145256	48589	44770

本表由博物馆处提供

(京)新登字 20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文博 1997 年第 2 辑/张展主编.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6

ISBN 7-5402-0836-8

I. 北… II. 张… III. 历史文物-北京-期刊 IV. K872.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3822 号

北京文博(1997 * 2)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6.25 印张 140 千字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10.00 元

北京新增七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续一)

南堂位于西城区前门西大街，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由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创建，清顺治七年（1650）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在原址扩建为大堂。现存建筑为清光绪三十年（1904）重建。大堂为哥特式拱券形建筑。正面砖雕花纹精美，



门窗俱镶彩色玻璃。建筑面积约1300平方米，附属建筑约400平方米。大堂的祭台和讲经台亦有精美装饰。堂为砖木结构，意大利文艺复兴式风格，为北京地区最古老、规模最大的天主教堂。



觉生寺俗称大钟寺。位于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建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该寺坐北朝南。现存主要建筑有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后殿、藏经楼、大钟楼与东西翼楼。大钟楼是寺内独具特色的核心建筑，它矗立在一座巨大的青石砌成的台基上，整个钟楼上圆下方，象征“天圆地方”。寺内存有明永乐年间



铸造的大钟，通高6.75米，直径3.3米，重46.5吨，钟内外共铸佛经梵文17种计22.7万多字，传为明代书法家沈度手笔。永乐大钟有“世界钟王”之称，是我国古代先进的冶炼铸造技术的标志，在声学、合金学方面具有很高水平。

（卢迎红文 李澄摄影）



ISBN 7-5402-0836-8



9 787540 208363 >

ISBN7—5402—0836—8

定价:10.00 元